

玉環文史資料

9

（在外地玉環人專輯）



玉环文史资料

第九辑

(在外地玉环人专辑)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八月

提供人才科技信息
为玉环两个文明建设
作贡献
胡宣义

中共玉环县委书记胡宣义题词

借鑑歷史
廣交朋友
脈務當今
功及後代

周莹上

愛我故鄉

甲戌初夏

柯培根學刻



乃故鄉有美部門
系七及刻制九款
印年於以面念

篆刻 柯培根

目 录

(本文作者按姓氏笔划)

浙江省人民政府特邀顾问——

- 丁世祥……………本刊辑(1)
- 岩石矿物分析测试专家——王长发……………本刊辑(4)
- 我的学术生涯……………王林祥(6)
- 从十六岁到六十岁……………尤俊章(19)
- 我这四十年……………尤俊意(27)
- 我的自传……………叶 鹏(31)
- 著名女作家——叶文玲小传……………本刊辑(36)
- 我的传略……………叶本法(39)
- 书画、美术教育家——叶尚青年谱……………可人辑(43)
- 年青的工学博士——庄 平……………本刊辑(52)
- 著名哲学家——刘 嵘……………本刊辑(56)
- 胸外科专家刘欲团教授访问记……………平 平(62)
- 自我介绍……………华乃文(65)
- 我的自传……………朱之川(70)
- 中国画坛怪才、青年画家——朱仁民……………朱仁巴辑(78)

我的回忆	朱泽枫 (81)
和汽车打交道的人——吕光泽	本刊辑 (84)
病理学家、教授——李义清	本刊辑 (87)
为了全军战士的健康	
——记陈必松副主任医师	本刊辑 (90)
向世界先进水平冲击的人	
——记化工部第一胶片厂高工陈必源	化工部第一 (92) 胶片厂科协
与恶疾抗争的人	转载《政协委员风采》 (100)
——记寓言作家陈必铨	作者 李光云
我的经历和点滴体会	肖秋生 (104)
笨鸟先飞	肖惊生 (109)
冶金化学战线上的排头兵——苏维福	本刊辑 (116)
我的回顾	李晓姣 (118)
五十年中的点点滴滴	张子佩 (123)
浙江省著名女律师——张燕征	本刊辑 (132)
女发明家——林 静	庄德华 (135)
微电子高级工程师——林明祥	本刊辑 (137)
老教授 林循经	张一芳供稿 (139)
设计战线上的一位老兵——罗天智	本刊辑 (142)
我的简历	季菊铨 (148)
我的自传	郑达坤 (151)
学海无涯苦作舟 我的自传	郑祖武 (154)
“治鼠大王”赵日良	吉林省黄泥河林业局供稿 (158)

我的回忆	赵日槐 (161)
化工设计战线上的高级工程师——胡德慧	本刊辑 (164)
刑法学家——高铭暄	于 宛 (165)
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徐元植	《玉环史志通讯》 (170)
默默耕耘在文物考古战线	
——记温州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徐定水	本刊辑 (173)
一窗昏晓送流年	郭一民 (176)
我的简历	郭心晖 (180)
我走过的路	黄岳云 (184)
董南才同志的戎马生涯	本刊辑 (193)
不像自传的自传	董楚平 (195)
我的自传	董舒林 (198)
我的回顾	董服伺 (201)
勤奋是人生的永恒	董新篁 (207)
环保专家——童晓书	本刊辑 (213)
航天测控技术专家——熊陈琳	本刊辑 (217)
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特邀委员、编辑部名单	(223)
征稿启事	(224)
封一	中共玉环县委书记胡宣义题词
封二	本辑50位作者签名集锦
封三	书 法 周 莹
封四	篆 刻 柯培根

前言

玉环文史资料第九辑《在外地玉环人专辑》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本辑收录的50位玉环籍知名人士，只是我县在外地各条战线中有突出贡献人士中的一部份，其余部份，有待我们继续征集出版。

这50位玉环籍专家学者，分别散居在天山南北、大河上下，北迄黑龙江，西南至滇粤边陲，有驻足通都大邑，也有寄身远疆荒漠，足迹遍布全国，各自从事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法律、考古、医学、文学、书画、翻译等各种职业，他们所学专业不同，岗位不一，但都有一颗拳拳赤心，现在他们有的已成为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有的已被编入国内外多部名人辞典，名扬国内外。

这些材料，不仅为我县提供了大量的多方面人才和科技信息，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清新有益的精神食粮，使我县文史库更添光辉，使我县的改革开放与两个文明建设，以更快速度向前发展。这就是我们编辑部同仁愿之所在。

本辑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史志办、档案馆、县教委、广播、电视等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县委胡宣义书记还亲自为本辑题词，在此一并敬致谢忱。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才识浅陋、关顾不及，疏误及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作者、读者不吝教正。

玉环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4年8月12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特邀顾问

- 丁世祥 -



丁世祥，1924年5月出生于玉环县的渔村——黄门一个渔民家里，少年时念书，帮助家里劳动，后在里黄乡小学教过书。1940年去龙泉县，六、七月间，经中共地下党员郭世桢、杨文介绍参加革命工作。为党组织传递信件、抄写资料、护送革命同志和参加抗日救国等工作与活动。1942年，日寇侵占象山时，丁在象山、三门县创办抗日救亡刊物，组织和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43年，从外地返回玉环，在楚门镇北监盐场工作。期间，同中共玉环地下党接上关系，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及其他进步活动。1944年8月，经中共乐清县委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被任命为楚门地区特派员，接收了原来与乐清县委保持单线联系的党员。在1944年底、45年初日寇侵犯玉环坎门、楚门等地时，组织和发动知识青年和学生，配合友军抗击日本侵略者。1945年5月，担任玉环地区特派员，恢复了港南地区失去联系的党员关系，党的活动在全县得以重新开展，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10月，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纵队海上大队挺进乐清湾后，兼任中共海上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武装斗争，创建、巩固海上根据地。在国共和

谈阶段，领导玉环地下党员，认真学习形势，提高认识，并对全县党的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1947年5月，任玉环区委书记，兼任玉环区队政治指导员。统一领导武装斗争和海上根据地、玉环境内的工作。先后二次组织玉环党组织骨干开展整风活动。1947年11月，派玉环区队和工作人员到温岭境内开辟工作。年底，玉环区队改为括苍支队第三中队。玉环组建武工组，兼任武工组组长，配合地区工作人员，在温玉交界的农村活动，领导全县（包括温西、温南）的群众运动和党的工作。通过在农村开展的“六抗一反”斗争，在玉环和温西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农联会、盐工会等，在城镇领导青年学生开展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三反斗争”。由于积极开展群众运动，在对敌斗争中建党，党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到1948年底，全县党支部达56个，党员472人。同时，配合括苍游击队，多次歼灭玉温境内国民党反动武装，拔除了一批敌人据点，粉碎敌人多次清乡，收缴了大批武器，还为部队和党组织输送了100余名知识青年，并筹集了大量的经费。1948年7月，率游击队员深入敌占的楚门镇，缴获国民党银行的法币46亿元。1948年8月，兼任括苍中心县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同年秋，兼任玉环县行政筹备委员会主任。1949年4月7日，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配合括苍支队解放了玉环县（玉环县是浙南第一个解放的县）。4月，任括苍中心县委委员、玉环县委书记兼民主政府县长。5月，温岭解放后，兼温岭县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主任，接管温岭工作。6月下旬，返回玉环。建国后继续担任中共玉环县委书记兼人民政府县长。领导玉环人民开展剿匪、反霸土改和恢复经济等工作。

解放初期，逃往东南沿海岛屿的蒋介石残部活动猖獗，当时玉环对敌斗争形势非常严峻。1950年11月20日，“江浙人民反共突击队”吕渭祥部700余人，偷袭县城，丁率一个排的县武装部队，坚守峦岩山头，打退顽匪多次进攻，坚持了一天的战斗，直到解放军支援部队渡过漩门港进行反击，打垮敌人，取得了胜利。1953年10月，调任中共温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宣传部工作。1954年3月任中共温州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55年5月任温州市人民政府市长，1958年3月调省工作。丁在温州市工作期间，正值“一五”时期，温州市在三年经济恢复基础上，经济发展取得了每年两位数递增的快速、持续的发展。自1958年初，调省工作后，一直从事基本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工作，先后担任过省基建局副局长、局长，省建委副主任、主任，省计经委顾问、省人民政府重点建设特邀顾问等职，并兼任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省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金温铁路领导小组副组长、沪杭甬高速公路筹建领导小组组长等职，直接参与本省经济建设和铁路、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建设的领导工作。现在主要担任省人民政府重点建设特邀顾问和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省建筑业协会会长、省国土经济研究会会长等职，从事我省经济建设的咨询顾问等工作。同时参与省党史、老区扶贫、老龄等工作。

（本刊辑）



岩石矿物分析测试专家

—王长发

王长发1928年，出生在我县清港镇。1953年大学毕业后，肩负建设国家的光荣使命，独自踏上了内古白云鄂博大草原的征途(即现在包头钢铁公司铁矿石稀有元素的矿区)，来到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北国少数民族地区。地质尖兵，起到眼睛作用(当时称地质勘探队是经济建设的尖兵，而化验测试则是尖兵的眼睛)与苏联专家一起，探索每块矿石的奥秘。那时的草原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汽车驰骋在渺无人烟、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与内蒙古草原野生动物群——黄羊竞相赛跑，还要提防土匪的截劫。到了基地以后，住的是蒙古包，吃的是攸面(即北方的燕麦面)，喝的是从数十公里远拉来的清泉水。

从五十年代中期转入地矿部华北测试中心(张家口中心实验室)以后，一直从事实验室科学研究工作，为揭开矿石的微观世界尽自己微力。先后曾

担任过基层、中层的技术或行政领导达20多年。研究或拟订了数十个矿种40多个元素的分析方法，组织或参与了大批国内外(援外任务的样品)的外检或仲裁分析。

六十年代初期，对稀有金属提纯、放射性同位素应用进行攻关研究。目前又转入非金属现代化工领域高技术研究。

四十多年来的实验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不少科研成果：其中有20多篇有关现代分析测试研究论文在《分析化学》、《黄金》、《理化检验》、《岩矿测试》等全国性专业刊物上发表，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好评，接到欧美、南非等国学术界专业会议的邀请，并被列入国际权威性的文摘刊物。许多论文摘要储入了一些国家的计算机数据库。有两篇论文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86年的《硅酸盐单矿物全分析方法》(合著)，1988年的《导数分光光度法在岩矿分析方法》(合著)，1988年的《导数分光光度法在岩矿分析中的应用研究》(独著)。他的名字及业绩被选编入《中国工程师名人大全》及《中国工程师大辞典》。

从五十年代起就指导大、中专毕业生实习和结业论文设计。数十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中、初级科研人材，有的已成为国家建设的高级科技人材和骨干力量，还精心培育了自己的女儿，15岁考入国内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清华大学，26岁攻下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现受聘于美国纽约理工大学任教。

(本刊辑)



我的学术生涯

● 王林祥

去年初夏,《玉环文史资料》的编辑同志到我家来,嘱我写一点有关自己学术生涯的文章。此事我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原因是觉得自己学术方面建树甚少,写这样的文章似乎为时尚早。后来转而一想:所谓“生涯”,无非是指从事某种职业的生活,并非都要什么大学问家才有资格来谈;同时还记得两年前文史资料曾发表过一篇介绍我的文章(此事前前后后我一无所知,文章自然也没有经我过目),文中有些材料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似乎也有更正一下的必要。这样一想,原先的顾虑也就随之打消了。

我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研究工作纯粹出于偶然。在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期间,我倒是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的。58年夏天毕业,我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杭州大学中文系工作。当时杭大中文系一共只有六位同志:总支书记系主任、两位讲师、两位助教。由于文艺理论是一年级新生所学的主课,我也就被分配承担文艺理论的教学和辅导工作。大约两个月后,省委决定将浙师并入杭大,浙师虽然是老大学(是52年院系调整时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全部、理学院部分以及之江大学四个单位合并而成),实力雄厚,但由于

文艺理论是解放后新开设的课程,比之于其他专业来,师资力量就薄弱得多了;加上57年“反右”以后人事的变更,继续留任文艺理论教学的也只不过是一位讲师,而两校合并之后中文系本科一年级新生竟多达360余人,还有许多函授生遍布全省各地和邻近各省,而当时新成立的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即现在浙江师大之前身)因为一时物色不到文艺理论教师,也要求杭大教师前去兼任。根据这样的形势,我自然也就没有理由提出要更改专业,我终身的职业和研究方向也这样决定了。

光阴如箭,在忙忙碌碌的教学工作中一晃就过去了三、四年。渐渐地,对于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地进行文艺理论讲授开始感到有些不满足了。于是就想到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很有必要把这几年在教学和辅导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一番梳理,然后一个一个地加以研究。这想法颇得到当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林淡秋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于是,我就从典型问题入手,开始了我学术生涯中的艰难跋涉。

我之所以从典型问题入手研究,固然由于问题本身的重要,但一半也是偶然因素的促成。因为正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蔡仪同志的论文《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刊《文学评论》1962年6期),他的基本观点是把典型人物的阶级性和典型人物的典型性区分开来,认为作为一个具体的典型人物,自然都属于一定的阶级,都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但是作为典型人物的典型性,往往只是他性格中的核心部分,不一定都具有阶级性。他提出的问题自然是可以考虑的,但我总觉得在他整个论述的过程中,都把性格核心从人物性格中孤立出来,把它的内容抽象化了,这样

看待问题是缺少辩证的观点的。因而，我就利用一天时间写了一篇六千字的文章寄给《文学评论》，与蔡仪同志进行商榷。文章寄出之后也就不当作回事了。因为《文学评论》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也是最有权威性的文学研究的学术刊物，我哪里会妄想在这上头发表文章？！回顾当时的写作动机，无非是因为骨鲠于喉，不吐不快罢了。

文章寄出约两三个月，稿子被退回来了，这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使我感到意外的倒是就是我这样一篇即兴写成的很不成熟的文章，《文学评论》倒“曾考虑发表”过，并用红笔在稿子上作了技术加工和画了版式。尽管后来“经过领导同志作最后决定时，认为文章对蔡仪同志的批评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决定不发”（转引自编辑部的来信下同），但还是把文章转给蔡仪同志看了，并以8页信纸的篇幅，向我转述了蔡仪同志答辩的要点。这件事使我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研究能力所达到的水平，所以它不仅没有使我感到懊丧，倒反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勇气。于是，我就利用63年暑假期间写了一篇2万字的《对于阿Q典型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的长文，又寄给《文学评论》，到了十一月下旬，我收到了编辑部的来信，说：“对阿Q典型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我看过之后，觉得文中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曾准备于本刊第六期上发表”，“后来因第六期有别的重要文章（按：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文章），不得不将您的文章暂时抽一下，留待明年第一期再发。现在离明年第一期发稿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将您的原稿先寄回，您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再经思考和研究，补充修改得更完善一些”。由于我那时一直认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妨碍理论界达到对典型

正确认识的症结所在，因此，在修改过程中把原先批评蔡仪同志文章中的某些观点补充了进去。因为文章所论的是关于阿Q典型的研究，所以批评的具体论点不是蔡仪同志的“性格核心说”，而是何其芳同志在《论阿Q》中所提出的“共名”说。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两人的说法虽然不一，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着眼于典型本身，后者着眼于典型的社会意义来说而已。

没有想到修改稿寄出两个月左右，又被编辑部退回来了，退稿的理由仍然是“领导终审未能通过”。我知道这位领导就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何其芳同志，尽管何其芳同志是一位很有成就并且在文艺界和学术界都享有很高威望的作家和学者，但这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的学阀式的作风，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反感；加上去年11月《文学评论》编辑部发稿的通知寄到系里时，不知怎的由于信封破损，里面的“秘密”也被一些教师发现了，并很快地传遍了全系，在系里颇引起一些轰动。因为当时全系教师中，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的除了被胡乔木同志誉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先生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而现在《文学评论》又说是不发，这实在太使我难堪。我一时想不通就写了一封信给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唐棣华同志（黄克诚将军的夫人），提了两点意见：一、何其芳同志利用职权、压制批评，在《文学评论》上搞学阀式的统治；二、《文学评论》处理稿件出尔反尔，是不严肃的，而且一贯如此。信发出不久，我就收到《文学评论》副主编毛星同志的回信，他向我详细地说明了处理这两篇稿子的经过，承认他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并向我表示：“如能把文

中的那些有缺点的地方修改得妥善一些，仍可以把稿子再寄给我们。”我也就按照他的意思把稿子再寄了回去，后来就在《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上以王元骧署名而发表了。

不想文章一发，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忌。当时一位正在文学研究所进修的、与我同届毕业的搞现代文学教师，就加油添醋、罗织罪名写信到中文系总支告状，说我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不择手段，强迫《文学评论》发我的文章。这实在是天大的笑话！我那里来这么大的力量，竟支配得了《文学评论》？！只要稍有分析头脑的人，都不难对这种诬告作出正确的判断的。奇怪的是就是这些诬告材料却被个别总支领导视为至宝，认为又有“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材料可以向上汇报，以显示自己的工作成绩了，并立即组织有些教师来“审查”我的文章，据说还曾考虑要开会批我。我当时年少气盛，一怒之下就去信把投寄到《文艺报》和《上海文学》的两篇稿子都要了回来，心里发誓这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不久由于“四清”运动开始，中文系全体师生都分别下到诸暨和萧山参加运动一年，回校后又旋即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漩涡，所以，毋须发誓也不允许你再去写作，原先要整我的考虑自然也不了了之。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原先书呆子十足的我，对于世道人心，似乎也看清了不少。所以，回想当年由于那篇文章引起的风波，实在不过是一场闹剧！人活着总得要干一些事情的，而对我来说，力所能及的也无非是教书和写作。由于个别人的眼红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实在是很不值得的！我决心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样，到了“文革”后期，禁锢有所放松、智育重新抬头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又拿起笔来，为学校的函授刊物写一些中学语文课文分析和文学基础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当时还作为内部教材结集出版过，并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但由此又遭到系里有些人的忌恨，并借“揭、批、查”来对我进行阴谋陷害。这件事最后虽然以他们惨败告终，不过在与之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也确实使我花去了很大的精力。因而直到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之后，我才得以重新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已经中断了十餘年的研究工作。记得当时翻阅一些“文革”以前写的文稿，连自己都感到非常新鲜，就象进入到一个前所未闻的学术世界，这说明十餘年间已使业务荒废到何等程度！

当时虽然已恢复了研究工作，但思考的问题基本上是“文革”以前延续下来的。代表那一时期研究面貌的是《论典型化》（发表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一文。虽然这篇文章发表后曾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被全文收入《1981年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76—198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于“1976—1985年《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获奖的共8篇，其中文学理论（有别于评论）文章有两篇，另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钱中文同志的），浙江省社联授于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但我自己却并不满意，主要是感到学究气太重而现实感不足。因为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文艺理论总是随着时代的脚步，在批判各种错误的观点、回答现实和理论所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唯其这样，理论才显示出它的生命和活力，这也是建立具有时代特色的我国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条基本途径。但到底应该如何入手？当时也颇有些举棋不定。正在这时，我因工作需要偶尔接触到了一些“文革”后新编或修订再版的文学概论教材，这些教材尽管以“新编”、“新论”命名，但就其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六十年代的东西，不但视角十分偏隘，而且特别使我感到不满意的是几乎完全没有跳出以往研究中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窠臼，如只讲客观不讲主观，只讲再现不讲表现，只讲反映不讲创造，只讲认识不讲情感，……而文学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点，在我看来，就在于它是通过作家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来反映生活的。情感不同于认识，它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事物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同一对象，经由不同作家写来，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面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不仅是对生活的再现、反映，而且同时也是表现和创造。这思想我在写《对于阿Q典型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时就已经萌生了（文中也初步涉及），经过20年的思考这认识不但没有转变，反而更加坚定。所以在82年底我就写了篇题为《情感：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的文章，发表在83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这篇文章自己虽然感到并没有把问题谈透，但却被学术界看作是“对文学艺术特征作出深入探讨的一篇较早的论著”，这表明我的意见是得到学术界的赞同和认可的，因此我就想以“审美反映”为逻辑起点，来重编一部教材，把这一基本观点在每一环节中都贯彻下去。恰巧这时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前来向我组稿，我就把这想法向他说了，立即得到了他的赞同和支持，这部教材后来以《文学原理》命名，于1989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同行们的普遍关注。早在

本书出版之前，于198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0所院校的同行专家参加的“全国高校第三届文艺学研讨会筹备会”上，大家看了此书的小样之后，就对它发生很大的兴趣，并列为向研讨会推荐的三部有特色的教材之首向国家教委提出（后因北京发生风波，此会没有开成）。在本书出版后不久，由国家教委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杂志上又发表书评，认为本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又广泛地吸取新知，对文艺问题作出了科学而系统的论述，是“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的新成果”，并考虑向全国高校推荐。

这本书出版后虽然广泛地得到同行的赞许，有些同志甚至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编得最好的一部文艺理论教材”，而我自己却始终对它有清醒的认识。因为这本书是我从1985年9月至1986年6月间因教学需要边教边写而成的，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生活环境和 work 环境的恶劣，再加上1973年在校防空工地劳动造成的爆震性耳聋所带来的剧烈的耳鸣以及由于工作繁重所导致的心律失常，往往弄得你不能安心也无法安心进行学习和工作。在这样没有充分学术准备的情况下所写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很难达到完美的境地的。特别是自1985年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一些“新潮文论家”如刘再复等人，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所把持的刊物，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热潮”，首先是所谓“方法热”，然后是所谓“观念热”，一时间确实搞得许多人晕头转向、六神无主，似乎在我国传播了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已经过时了。这些新潮文论虽然有它一定合理的成分，但总的来看，基本上是从二十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

艺理论中贩卖过来的，而且多半是生吞活剥、东拼西凑的东西。而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一时间竟然引起这样强烈的轰动效应，这自然与我过去思想的封闭、视野的狭窄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在阐释上所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分不开的。而这些新潮文论家的“批判”的矛头所向的，也正是被以往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家”以及他自己所肆意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使我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入人心，就必须有能力对现实的挑战作出自己坚定而响亮的回答！为此，我们除了继续彻底批判和清除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来面目之外，还应该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和时代的要求，广泛地吸取人类文化一切优秀的成果而创造性地加以发展，这样我们的理论才会真正具有时代的特色！说来又很凑巧，正在这个时候（1987年9月），我收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闵开德同志的来信，说由国家教委高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发起，将于11月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全国高校文艺学研讨会”，要我参加并在大会上发言，我就根据自己的想法，针对近年来在文艺理论界轰动一时的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等文中的某些观点，写了《反映论原理与文学本质问题》一文提交给大会，想不到在大会上宣读之后，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家教委社科中心主任武兆令同志，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陆梅林同志，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李淮同志，《求是》文教部主任（现《人民日报》编委兼文教部主任）丁振海同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吕德申同志等等，都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有两个刊物

都要求发表这篇论文。学术界也认为此文对“审美反映说”进行了系统而坚实的论证，文章既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理，同时又从反映的心理内容、心理层次、心理机制、心理形式、心理特点和心理结构与功能，如选择作用、建构作用，诸多层面，阐明了审美反映的丰厚蕴含，俨然成为一个严谨的理论系统，这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坚定和增添了我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自这之后，我又写了《反映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哲学基础》、《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艺术的认识性与审美性》、《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论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文学与语言》、《论艺术创作中的意识与无意识》、《文艺内容与形式之我见》、《西方三大文学观念批判》等19篇约35万字的文章，分别发表在《求是》、《人民日报》、《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理论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等刊物上，这些文章从我对文艺是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吸收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研究的新成果，对文艺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以“内容扎实、学风严谨、材料丰富、说理透彻、立论稳健又不乏新意”而得到文艺理论界同行的普遍赞许。其中《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一文还被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授予“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优秀论文奖”。这是继1985年“《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评奖以来有文学理论文章参加的第二次全国性的评奖，在22篇获奖论文中，文学方面的论文也只占两篇，另一篇是当时的

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的。前年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同志听了外界对我文章的评价，特请科研处处长等数次与我商谈，要我把这些文章选编成册交杭州大学出版社作为“杭州大学学术丛书”的第一本出版。

我虽然写了一些东西，并得到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和文艺理论界同行们的肯定和赞誉，但我自己明白：由于“文革”前后十几年的荒废，自己的水平与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相距甚远的。就目前来说，尽管在文艺理论界也有我的一席之地，但也不是我有什么天分，倒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几分关系。我生性淡泊、不慕名利，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学业，总是一往情深、乐此不疲，从不三心两意、见异思迁，更不把学术当作猎取个人名利的手段。所以，学术之外的东西我一概无意追求。名利、地位等在我看来都是一些累赘，何况现在文艺界如同商界，只要学会钻营拍马，什么名利、地位也都可以捞到，这又能说值得了几个钱？！一个学者总是要靠自己的著作在学术界安身立命的，把大量精力花在学术之外实在是不值得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学术能力丧失信心的表现！所以我常常以“若要追求真理，就得甘于寂寞”，“学问领域自有乐趣”，“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来告诫学生、勉励自己。这就是数十年来，能使我不受形势变化的干扰，专心致志地忠实于真理的探求，从不随风使舵、见机行事，或屈服于某种压力，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的原因。也可能正是由于这样，中宣部和国家教委才对我特别垂青，聘我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文学组成员和国家教委《高校理论战线》编委。这些虽然不是什么显赫的职务，但是在强手林立的学术界和

教育界，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会特地找到浙江、找到象杭大这样的地方大学里来的！

回顾往昔，总不免要想到将来。再过两年，我就要进入耳顺之年了，想必以后工作的时间已不会太长。所以我想对于今后的研究大致有一个打算是必要的。我初步想到这样三个方面：一、继续对文艺理论上一些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二、把前几年出版的《文学原理》作一次全面的修订，使之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臻完善；三、将现存的《美学原理》的讲稿整理出来，并结合这项工作写一些有关美学方面的文章。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学，再加上这几年会议很多，这些计划也未必能有时间保证完成。我现在把它向家乡人民汇报，也希望能及时得到家乡父老兄弟的鞭策和督促。

这篇文章原先计划是想写三、五千字的，信笔写来，又是将近一万！在写的过程中，也时常想到，象这样琐碎的个人小事，占去《玉环文史资料》这么多的宝贵篇幅，似乎太不应该！但后来转面一想：人是社会的存在，在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中，虽会是这样那样地反映他生存的社会现实。就我这些平凡而又平凡的学术生涯来看，也不是多少可以窥测到我国文艺理论界，乃至社会现实的一个侧影吗？就把我的经历作为一个小小的“窗口”提供给家乡人民吧！想到这里，我也似乎就心安理得了！

1992年春节陆续写成

附记：本文完稿不久，国家教委领导来杭与我商谈，要我承担普通高校中文专业，《文学概论》教材的主编工作，这是“8·5”期间全国统编的一部重点教材，也是属于中文专业的唯一的一本，我自知学力、体力都难以胜任，所以再三推辞，但教委有关领导的意思还是希望我担任，这个任务如果接受下来，三、五年之内我就难得有自己支配的时间，文中所谈的研究计划，多半可能也要落空了。

从十六岁到六十岁

● 尤俊章



我于1933年12月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世居浙江省玉环县坎门镇教场头东头(今第九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已到花甲之年，的确，人已老矣！但少时的情景，家乡的山水、鱼鲜、浪涛永远难以忘怀。回忆起来，不胜感慨。

服务家乡十载

1949年7月经占恭文、陈道生两同志介绍，我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在首任玉环县人民政府税务处(后改税务局)主任叶守雄先生率领下，参加了接管旧玉环县税务处的工作，以后又调到坎门区和三盘区(即今洞头县)税务所工作。1951年至1959年3月，先后在玉环县委秘书处(包括土改指挥部、组织部、宣传部、县委党校)等单位工作，历任会计、干事、秘书、县委党校副校长等职务。1959年3月玉环县撤销，一批科局长级以上干部被温州地委组织部分配到各县的教育系统工作。其中包括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叶茂善同志、副县长徐教洲、陈敬贵同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张玉堂同志

等。我与方彬同志（原玉环县府办公室主任）被分配到乐清县工作，方任乐清师范学校副校长，我任雁荡中学副校长。从此离开了玉环，离开了家乡，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直到目前即将离休。

在家乡工作十年，其中头七年，是祖国和玉环家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大发展时期。那时，党风正民风好，到处生气勃勃，人民精神振奋。以后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受“左”的路线影响，“大跃进”把玉环县也“跃”掉了，使玉环的工作受到损失，实在可惜！三年后，才重新恢复了玉环县。当时在外县各中学工作的同志也大部分被调回玉环工作了。我也曾要求调回家乡工作，但由于乐清县委不让走，所以仍然留在乐清工作。那时，组织纪律的观念很强，“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哪里需要哪安家”、“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这些观念在我的头脑中是比较牢固的。因此也就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一直在乐清工作了三十五年。

教坛三十五年

在乐清从事教育工作35年，历任雁荡中学、白象中学、乐清师范学校、乐清中学等校的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等职。其中虽有几年担任县委党校的理论教育和县文教局的教育行政领导工作，但也属于教育岗位。35年中，曾先后二次调入乐清中学工作，时间长达16年。当时，受命于艰难之际。第一次在“文革”中，重建被“砸烂”了的乐中，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第二次是在1985年，奉命再次调入乐清中学，担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面临着学校领导班子不团结，人心涣散，工作被动落后的局面。我根据上级指示，以“忠

诚党的教育事业”作为宗旨，忍辱负重，努力搞好团结，处处以身作则；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作为治学之道，本着重点中学“双重任务，重在质量”、“立足于方针，着眼于人才，着手于打基础”的原则，努力做到：德育为首位，教学为中心，德智体全面发展。经过全校师生的不懈努力，目前，乐清中学的校风好、学风浓，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温州地区声望与质量较高的一所浙江省重点中学。

35年的历程，风风雨雨，艰难曲折，尝尽了酸咸苦辣。因为在过去的各种运动中，教育领域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知识分子一直被当作革命的对象，作为一个普通中学的负责人，一直生活在尴尬、难堪的日子里，真是欲干不能，欲罢不行，那种处境是可想而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教育工作获得了春天。“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四化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教育需要教师”，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因此，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但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教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遇到了许多新的困难，诚然，这毕竟是前进中的困难，我相信，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工程，教育事业一定会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三点肤浅体会

从16岁参加革命工作，到60岁即将离休。在将近45年的路程中，虽历尽风霜雨雪，但也平平凡凡，既没有什么“特殊遭遇”，更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当然，在党的领导与教育下，也尽了自己最大的

努力，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天职，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应尽的义务。但是，群众和组织上给予我不少荣誉和奖励。县一级的：除多次被评为先进外，1983年起连续担任数届乐清县政协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乐清县委委员，温州市党代会代表，乐清县中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被聘为乐清县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地市一级的：1965年被评为温州地区优秀党支部书记；1988年被浙江省教育委员会评为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1990年被中共温州市委授予“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1992年被评为温州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点成绩。如《谈学校德育工作》的论文，获得1990年温州市教育论文一等奖，1992年撰写的《社会实践是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论文，获得温州市教育科学研究课题一等奖；《谈农业责任制的现象与本质》、《克服糊涂观念，加强中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摆正德育地位，加强德育工作》、《怎样组建家长协会》、《组织中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活动的几点体会》等篇论文在《政治教育》、《人民教育》、《上海农业经济》、《温州论坛》等杂志发表，有的论文还被国内权威刊物——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选录。并且还担任了《中学生写作艺术例话》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编委，承担部分章节的编写，《语文小报十周年作品选》（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一书的顾问；是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会员、浙江省哲学学会会员，曾被选为温州市哲学学会理事。还被编选入《全国中小学教师与医务工作者名典》。也许有人会问：你怎样从一个小学毕业生锻炼成为中学高级教师呢？我

的体会很多，主要的有三点：

一，党的培养与教育。入伍近45年，党组织多次送我到省、地党校培训。很是巧合，三次入浙江省委党校理论培训班学习，三次入温州地委党校学习，三次入浙江教育学院学习。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心理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文化科学知识。这三三得九的教育培训深造，使我得到很大的进步与提高，尤其在政治理论和教育理论方面。几十年来之所以有较坚定的理想与信念、较健康淳朴的思想与作风，与上述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因此，党的恩情，终生难忘。

二，热爱事业。干一行爱一行就会专一行。我对教育事业无限热爱，其根源有三：一是家庭影响。我的父亲是旧社会的一名比较进步的小学教师，在家乡坎门等地颇有威望，其思想作风，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热爱教育工作，这也算是“遗传因素”；二是老师教导。解放前我就读的坎门小学的几位老师，对我的关怀、教育与培养，使我刻骨铭心、永不忘怀。特别是当时几位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如张人勋、杨模、叶木兴、吴爵渊、陈道生等等，他们对我的谆谆教导，给我阅读了许多进步报刊书籍，灌输了许多进步思想，使我懂得了许多痛恨旧社会、追求民主解放的道理，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学习小组和坎门地下儿童团等等，给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人生观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我在文化知识上获得很大进步，小学毕业的成绩获得第一名，所以我对这些老师的培养教育是感恩戴德、永记不忘，深感教育工作的伟大；三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亲身体会。干教育工作，地位低、待遇差、工作累。“教师最累，学生最苦，校

长最忙”、“选择了教师职业,也就是选择了正直与清贫”,但是,当教师虽然在物质上“清贫”,而在精神上却很“充实、富有”,因为始终生活在一群生龙活虎般的青年学生中。所以,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的确意义非常重大。教育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学校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教师是决定祖国和人类命运的崇高职业。人们对教育工作有许多美称:“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工程师”等等。教师既教书又育人,努力发扬“春蚕”、“红烛”的精神。“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栋梁”。一批批青少年得到培养教育,不断茁壮成长,奋战在全国各地和各条战线,令人非常欣慰!

由于热爱教育工作,就会努力钻研业务,努力做好工作,感到越干越有学问,越干越有奔头,越干越有希望。所以也由外行逐渐变成“内外”,从而取得一点成绩。

三,刻苦勤奋,努力拼搏。可想而知,一个仅有小学毕业水平的人,要担任一所完全中学甚至省重点中学校长的重任,那是多么困难!记得1959年初到雁荡中学,我在行政上是副校长,党内是支部书记,还要担任高一级的12节政治课,忙得不亦乐乎。因此,我只得咬紧牙关,努力拼搏,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依靠平时学得的文化、理论基础,再加上苦干苦钻,终于闯过了第一关,取得了好成绩。以后,我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低,不懂业务苦,于是就下决心尽力改变这种“先天”不足,从“后天”补上去。我平时不吸烟、不喝酒,唯一爱好是看书阅报,一天没看书报就觉得心里不舒服。这样就促使我勤奋学习。在六十年代初期,在那困难时

期,在那不断的“运动”中,在那“干劲冲天”的日子里,我坚持参加温州师范学院的大专函授。自己平时已学习了不少文科的知识,也有一定的写作水平(1955—1956年在玉环县委宣传部工作时,我写的通讯报道有几十篇被《浙南大众报》、《浙江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刊登,有几篇文艺小作被省级报刊发表)的情况出发,选择了中文专业。在几年函授学习和平时学习中,最大的困难有二个:一是工学矛盾。既要做好大量的繁杂的行政与教学工作,又要挤出时间自学。那时,的确是“时间就是生命”。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发挥“挤”劲。白天工作,晚上自学,“三更灯火五更鸡”,经常“挑灯夜战”、“闻鸡起舞”;休息时间、零星时间充分利用,“聚零为整”,抓住分分秒秒,看书学习,“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二是在学习中最大的困难是《古典文学》与《古代汉语》,因为在这方面,原来的基础较差。因此更得苦读苦钻,学习雷锋的“钻”劲,翻查字典、资料,请教语文老师。深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滴水穿石,不是力量大,而是功夫深;成绩优良,不是天资高,而是辛勤学”的道理。这一年的周末晚上与星期天,都未回家,独自关在学校单身宿舍里苦苦攻读,终于“啃”下了王力编著的四部头的《古代汉语》以及《古典文学》这二门课。那时,我的心情是多么兴奋!当然,在这35年中,由于我担任学校校长、书记,又兼任高中政治课,所以自学的重点仍是围绕着政治理论、教育理论、党的建设与时事政策,以利于做好工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当年十六岁,参加革命,我是个小学生,今天六十岁,即将离开

岗位，仍是一个小学生。今后，我要努力做到“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永远做人民大众的小学生。



我 这 四 十 年

● 尤俊意

我1938年12月出生于玉环县坎门镇。1951年毕业于坎门中心小学，1952年在玉环县立环山小学附中班学习，1954年夏毕业于玉环县立初级中学，1957年夏毕业于温州第一中学（浙江省立温州中学），同年秋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1958年9月随法律系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系学习，1961年夏毕业后在上海市崇明县的崇东中学、登瀛中学任教俄语、英语、政治、语文、历史、地理、音乐等课务，并长期担任外语教研组长。1980年参加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招收考试，录取后分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法理法史研究室从事法学基础理论专业研究工作。1983年被评为助理研究员，1987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92年晋升为研究员。1984年8月起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助理（1985至1987年兼任学术秘书室主任），1991年11月起至今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主任、院人才培训中心主任、社会科学进修学院副院长。1981年4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现任农工党上海市委学习与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农工党上海社科院直属支部主任委员，两届全国党代会代表。198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研究生部党总支书记。

主攻法理学，兼涉政治学、宪法学、统战理论等。现任上海市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市研究生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法理法史研究会副总干事，中国灾害防

御协会上海分会暨上海市灾害防御协会常务理事、海峡两岸法律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市旅游文化研究会理事；上海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法学研究中心秘书长，上海社科院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会科学系列暨上海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法学学科组（含社会学、宗教学、人口学）组员；上海市监察委员会特邀监察员；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讲师团成员，上海市干部法制教育讲师团成员等。

已发表个人、合作、集体的著作10多种，入编论文集多种，发表论文等文章200多篇，共约200万字。其中，个人著作《法律纵横谈》（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二届全国（1985—1988年）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选”二等奖；本人主编、两人合著《青年法学入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获上海市法学会优秀著作奖，列为上海市1987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主编和作者之一的《商业法知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获上海市供销合作社优秀教材奖。个人论文《关于法律体系的研究及其方法论》（载《上海市法学论文选》、《争鸣》1984年第3期）获上海市社联1979—1985年优秀学术成果奖；论文《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载《政治学论文集》、《改革和法制探索》）获上海市社联1986—1987年度优秀学术成果奖，获1988—1991年度上海市社联学会优秀工作者称号。参加集体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荣获上海市社联1988—1991年度荣誉性特等奖。论文《法治意识：精神文明的枢纽》（载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精

神文明和现代化的撞击》）获上海社科院1988—1990年度优秀论文奖；《关于人权的几个问题》（载《阵地》1992年第3期）获上海社科院1991—1992年度优秀论文奖；《请尊重我的合法权益》（载《解放日报》1989年2月26日）获《解放论坛》征文比赛优秀奖。参加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司法局组织撰写的《公民法律常识读本》作为上海市公民普法必读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三版，发行约350万册，又参加相应的电视普法讲座，向全市各级干部作普法讲座数十次，1989年底获上海市普及法律常识先进个人奖。

发表的论文具有较好的社会效果，先后有20次分别被新华社《内部参考资料》、全国人大法工委内部参考资料、中共中央统战部理论内刊、上海市委宣部部内参、《新华文摘》、《文摘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刊资料《法学》及其他专业杂志转载或摘载。在上海法学界和全国法理学界享有较好的声誉和较高的知名度，分别被载入《中国法学家辞典》（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中国当代中青年法学家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中国当代知名学者辞典》等。

在学术研究中能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求实精神，解放思想，敢于争鸣。比如：1978年率先提出“为修养恢复名誉”，被外电评为这是中国为刘少奇翻案的信号；80年代初率先提出“权利和自由的概念不宜并列使用”、“‘科学’的概念需要正名”、“‘权大于法’的提法不妥”等观点；1989年公开发表论文全面论述“动乱和暴乱中的若干法律问题”，主张“党内决不允许有反对派”，提出区分政治行为和学术行为的“法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学术的四条

界限”。还提出：打官司不能打关系；立法的滞后和超前均不可取，主张适时立法；我国走向法治的过程必是一个法治与人治相互交叉、互相结合、不断利用人治、克服人治的渐进历史过程；法的本质是社会居主导地位阶级的一般的、集中的、根本的和最高的意志升华为法规范的国家意志；提出协调法制同改革之间关系的若干原则，坚持不能冲破法律禁区，必须依法进行改革等的观点。

编者按：尤俊意同志已被美国人物传记协会列入《有影响的500名领导人人物》1994年卷中。

我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生于浙江省玉环县楚门镇，取名叶善教，并由法师赐名宝春。汉族，那时我家有农田五六十亩。父亲叶尧冥，一生经商，任源生南货行经理。同胞七人，我为长子，姐姐叶文之，大妹叶文青，二妹叶文玲，三妹叶文俐，大弟弟叶善训，二弟叶善园。

家出走，参加了浙南游击纵队，合家震动，这时我方知故乡山中有共产党存在。后来，我由高年级同学、地下党员罗地福、应理清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盟，传递过游击队的油印小报《浙南周报》。解放后热情参加宣传工作，主演《林冲夜奔》、《九件衣》等戏剧。当时国民党军队曾由披山岛反扑登陆，我们的宣传队正在乡间演出，小伙伴们都有很好的表现。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我由罗地福、应理清介绍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温州团干训练班学习。返校后任学生会主席，并以学生界代表资格，参加了玉环



我的 ● 自 传 叶 鹏

一九四〇年，我开始入东方小学读书。后转入楚门小学；于一九四六年毕业。同年考入省立温州中学，因年龄太小，语言不通，加之漂洋过海，诸多不便，一年后又返乡就读于玉环县立初级中学（今楚门中学）。一九四九年，在解放军渡江前，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解放了故乡。姐姐叶文之，解放前离

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

司不能打关系；
一九五一年春季，
总支组织委员。一九五
学语言文学系。历任
编。系党总支对我十分
起，在《复旦》、
报》等报刊上发表《关
稷南教授》、《论《阿

高中部，一直担任团
；我国走向法治
结合、不断利用
长、《红色信号》主
入党对象。从二年级
文汇报》、《解放日
的一点辩证——答罗
论陶渊明》等论文十

余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因为我曾不同意苏联专家的某个美学观点，并在同学们中间议论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性质等情况，被指为反苏，突然宣布我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了团籍。

一九五七年九月，我被分配到河南省人民广播电台任编辑。报到时，因我的右派身份，被河南省广播电台拒绝接受，退回省教育厅。十月间，由教育厅重新分配到洛阳地区，后被派往孟津县南麻屯初中任语文教师。

来河南不久，因当时家中弟妹多，经济拮据，无力偿还债务。父亲曾将土改时留给我家的一部分房子借予债主居住。对方不要利息，我家不收房租。后来，这件事被指为反攻倒算，父亲被捕。一九五九年底，孟津县开始整风反右，县里规定右派分子不能教语文课，一九五八年二月我被调往孟津海资小学教算术、图画等课。一九六一年十月，因我在劳动和工作中表现较好，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一九六二年二月调到孟津县小学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后该校取消，遂转入孟津二中，教语文课。

一九六三年七月，我与孙淑琴结婚。孙淑琴孟津人。一

九六〇年新乡师院生物系毕业，当时为孟津三中生物教师。婚后，我们有了一女——叶承露，二子——叶承曦、叶承晖。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因老右派被打入牛棚。十几年来我节衣缩食购买的一千多本图书，积累的三千多张卡片，撰写的《鲁迅小说研究》、《曹禺论》、《朱自清论》等五十多万字的论文，都散失了。一九六九年，教师被遣散回乡，我随妻子到她家乡孟津县白鹤乡山底村劳动。不久，又被“选”为教师，在山底小学任教。后白鹤高中成立，我被调往该校教语文。一九七一年，被调到孟津县教师训练班任教，一直到一九七七年。这期间，差不多跑遍了孟津县每个生产大队的学校，深入作教师辅导工作。几年间，担着风险，为服务孟津中学语文教学主编了近百万字的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于一九七七年四月调来洛阳师专。一九七七年元月，复旦大学党委撤销了我的错划右派的决定和开除团籍的处分，恢复了我的政治名誉。一九八〇年玉环县人民法院为我父亲反攻倒算一案平反，宣布无罪，并归还被没收的房产。政治地位的改善使我能够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我先后任中文系副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和洛阳师专校长。系统讲授了《写作》、《中国现代文学》、《马列文论》、《文学专题讲座》等四门课程，应邀在复旦大学、河南大学等省内外高等院校及省内各市县作了200多场学术报告，反响强烈。关于我的事迹曾被《光明日报》、《河南日报》、《高教园地》等多家报刊报道，并被誉为“完整的教师”。作为多年教学科研的总结，我主编出版了大专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河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写

作》(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受到专家好评,并被广泛采用。《中国现代文学》获省优秀教材奖。

即使在最困难的年月,我也没有放弃对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连续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论精神胜利法与典型阿Q》(《文学论丛》1983年第一期)《挽弓当挽强》(《文艺报》1983年第四期)《寻求与自己的素质相适应的题材》(《莽原》1984年第二期)、《文学须与人民的情绪同步》(《复旦大学学报》1986年第四期)等学术论文100余篇。先后获莽原文学奖,洛神文学奖等八次。1986年论文集《文学的风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获河南省高等教育领域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作协河南分会理事,河南省文联委员,河南省文学学会理事。洛阳市作家协会主席。

一九八三年出任洛阳师专校长十多年来,在端正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师资队伍建设和改善教学手段,优化育人环境,教学管理改革和后勤管理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学校的办学规模得到了较大发展,办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物理、中文、体育等专业的办学水平评估均名列全省第一;按照“主动改革、小步积累、不断完善”的方针,学校的后勤改革蜚声全国,先后有全国五百多所高校、中专来校学习后勤改革经验。一九八八年国家教委表彰洛阳师专“为基础教育培养师资,方向明确,成绩显著”,名列首批全国优秀师专的行列。我先后被评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河南省第五届常委,第六、第七届委员。我被命名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省管优秀专家,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最近在工作之余,我开始研究色彩文化,已发表文章五十余篇。

一九九四年元月



著名女作家

叶文玲小传

1942年11月4日生于浙江玉环县楚门镇。1958年发表处女作《我和雪梅》。至今已有四百万字20本作品集出版。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入典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录》。

小说《心香》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获《当代》荣誉奖；获奖小说还有《寂静的山谷》、《小溪九道湾》、《秋爽》、《拐角》、《浪漫的黄昏》等；散文获奖作品有《乌蓬摇梦到春江》、《奇品》、《茶之醉》、《月之望》等；小说结集有《无花果》、《心香》、《独特的歌》、《长塘镇风情》、《湍溪夜话》、《叶文玲小说选》、《冰上圆舞曲》、《浪漫的黄昏》等；散文集有《梦里寻你千百度》、《写在椰叶上的日记》、《艺术创造的视角》、《不了情》、《永远的诱惑》等。

1962年—1986年曾在河南生活工作。应邀先后出访过菲律宾、德国、日本、泰国。多篇作品被翻译到国外。

(本刊辑)

叶文玲主要著作：

小说——

《无花果》	(短篇集)	1980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心香》	(短篇集)	1991年	百花文艺出版社
《弯弯的金竹塘》	(中篇)	1981年	少年儿童出版社
《青灯》	(中篇)	1982年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溪九道弯》	(中篇)	1982年	百花文艺出版社
《父母官》	(中篇)	1983年	群众出版社
《长塘镇风情》	(中短篇集)	1983年	浙江文艺出版社
《独特的歌》	(中短篇集)	1983年	花城出版社
《湍溪夜话》	(中篇集)	1986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叶文玲小说选》	(中短篇集)	1987年	四川文艺出版社
《冰上圆舞曲》	(中短篇集)	1988年	黄河文艺出版社
《太阳的骄子》	(长篇)	1986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无梦谷》	(长篇)	1994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散文——

《梦里寻你千百度》	1982年	浙江文艺出版社
《写在椰叶上的日记》	1985年	百花文艺出版社
《艺术创造的视角》	1985年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不了情》	1991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永远的诱惑》	1994年	天津教育出版社
《有你不寂寞》	1994年	作家出版社

文集——

《叶文玲代表作》	1994年	河南人民出版社
----------	-------	---------

编者按：

叶文玲新作《无梦谷》46万字，于1994年10月出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基金会、浙江省作协联合召开的“叶文玲长篇小说《无梦谷》研讨会”10月20日在北京文采阁召开。首都文学界、评论界知名人士陈荒煤、王蒙、唐达成、宗璞、张锲、谢永旺、蒋和森、蔡葵、吴泰昌、雷达、陈骏涛、陈丹晨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记者等30余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委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向研讨会表示热烈祝贺。与会者从美学、社会学、文体学等多种角度对这部长篇小说作了研讨，一致认为，这是一部耐人咀嚼、让人思索、在检视历史的记忆中，再一次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精神磨难和人格力量，激起了人们对历史进行新的叩问和沉思。

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林晓峰、浙江文学院院长盛子潮以及叶文玲本人专程赴京参加了研讨会。



我的传略

● 叶本法

我于1927年出生于鸡冠山。抗日战争初期，就读于玉环县立中心小学（即环山小学）和楚门区立中心小学。两校环境优美，使人陶醉，师生间与同学间谊厚情长，使人羡慕，从而奠定了我做人的道理和奋进好学的基。1940年秋考入黄岩县立中学（当时也考取雁荡中学，友人劝我读黄中），该县的经济、文化冠于浙东各县，士绅们一贯高度重视培养后辈人才。正当浙台学子避难返里之际，良师荟萃于黄中，教书育人，律己律人。几届全省高中会考，黄中均名列前茅。我们在此环境中苦读了六年。1946年秋，全年级毕业同学50多人中，十分之九先后考入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少数同学奔赴浙南参加革命队伍。我在1946年秋考取国立江苏医学院，以及厦门大学海洋系预备班和复旦大学办的渔业技术学校，读了近两年后，于1948年秋蒋孟毅友劝我重入江苏医学院医本科。在读大学期间，正值人民解放军解放大江南，新旧社会对比和在党团的教育下，边学习，边投入学生护校、护厂的洪流中。忘我工作，乐在其中。1954年，医学院本科6年制毕业留校，历任南京医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之职，并前后兼任中国肝癌研究

协作组副组长、中国抗癌协会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省抗癌协会名誉理事、江苏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和淮安市人民政府肿瘤防治工作顾问、主任以及省高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题评审委员。

自1955年起至1970年，边教学，边投入到防治日本血吸虫病、丝虫病、疟疾、黑热病的四大寄生虫病和伤寒、痢疾、麻疹、白喉、百日咳、灰质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性肝炎（现即病毒性肝炎）以及结核等常见病的科学实践和防治中，使得学到的理论知识与现场实践相结合，验证了科学内容，丰富了实践经验，培养了独立处理防治工作的能力。并相继获得江苏省、南京市及学院的先进科学工作者奖励以及在全国性刊物上如《中华卫生学杂志》、《中华结核病杂志》、《流行病学杂志》、《健康报》和省刊、院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1961、1963年合作编写过《简明流行病学》和《传染性肝炎》等著作，以及若干小册子和科普读物。

1972年起，受省府委派参加专家组赴启东肝癌高发区进行肿瘤防治的调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曾前后组织南通地区、江苏省并参与全国进行1973—1975年各管辖范围内的肿瘤死亡调查研究。论文陆续发表于《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江苏省肿瘤死亡调查》等专集以及由全国肿瘤办主编的《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上。《启东肝癌防治研究》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1982年《长江口肝癌高发区肝癌与乙型肝炎关系》、《原发性肝癌理论流行病学研究》获省科技四等奖。1983年《中国肝癌地理分布与气候、黄曲霉素B₁关系》获省

科技三等奖，以及1984年《苏、浙、沪肝癌致病因素分析研究》获南通市科技二级奖。1979年参加全国同行合编、供全国医学院医疗学、儿科系、口腔系学生使用的《流行病学》教科书；1981年参加全国同行合编《流行病学》参考书巨著（上、中、下共三册）；1984年主编《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全国发行；1992年主审《兽医流行病学》教科书，使我国流行病学从传染病领域扩展到非传染病领域，迄至发展到人畜共患疾病和兽医学流行病学中去。在“七·五”与“八·五”期中，分别完成和即将完成攻关课题有《茶叶与肝癌》、《水网地区食管癌危险因素研究和亚硒酸盐干预试验》的研究。1987年我代表全国与省组团赴美参与《启东肝癌高发区现场亚硒酸盐实验流行病学研究》的课题讨论、设计和提出可行性方案。并参观了纽约图书馆、康乃尔大学医学研究中心、阿利桑那州立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和华盛顿美国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并交换了研究经验。他们的齐全图书和先进设备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使我们大开眼界；而我国在现场研究方面的基本条件和规模，亦使他们倾倒。学术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对世界性的科学发展，是有利的，也是有益的。

归纳起来，我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主要的成就是：1.为国家的肿瘤调查摸底和防治工作填补一些基础；2.积极参与肝癌病因的研究；3.在国内首先提出非传染病流行病学和肿瘤理论流行病学的概念，并列入教科书与参考书；4.发表论文百余篇和著作6部。尽管自己一生努力，在历史与科学的长河中仅是滴水珠，但能为人类的健康作微薄贡献，不负此生，亦是快事。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除家乡父老兄弟姊妹的关怀和培育之功外，从小学→中学→大学迤走上工作岗位至今，深受党的教导和老师、朋友、同学、同事们的帮助和鼓励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也深深感觉到一个人自己的艰苦奋斗、勤奋好学乃是基本条件，这也符合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根本哲理。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努力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各个地方，那里的教育基础好，科技人才多，那里的经济、文化就相应发展得快和好。黄岩如此，南通如此，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更是如此。古人云：“心田留一点、子种孙耕”。愿自己在人生的后期，能为故乡玉环的教育事业做点有益的贡献。



书画、美术教育家

叶尚青年谱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

是年，农历七月初五，出生在浙江省玉环县环山镇（现为城关镇）东岙里村，父亲叶邦法，农民。

1931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 一岁

“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二岁

诸闻韵潘天寿先生等五人在上海组成“白社”国画研究会。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三岁

王朝闻、卢鸿基、郭世桢考入杭州国立艺专。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四岁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五岁

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六岁

外祖父林学文在本村洪福寺办私塾，入塾就读。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七岁

转学东门三官堂王昌贵私塾读书。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八岁

转学东门短期小学就读，导师朱荷香。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九岁
转学县环山镇中心小学就读,对美术爱好甚笃。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十岁
习字作业选入校书法展览。陈能忠先生上课选读鲁迅《风波》、《孔乙己》等文章。
1941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 十一岁
刻有“抗战到底”隶书笔筒,参加校美展。被郭世桢先生发现爱涂鸦,受到鼓励。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十二岁
董仲升先生上美术课有国画示范作品,临摹不辍。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十三岁
参加全县小学歌咏比赛,唱《黄河大合唱》获团体第一名。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十四岁
小学毕业考入雁荡中学。潘天寿任杭州国立艺专校长。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十五岁
转学玉环简师就读,董仲升先生上语文和美术课,支持学画,借《芥子园画谱》为启蒙诱导。八月,抗战胜利。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十六岁
董仲升先生为级任导师,传播革命思想,推荐阅读进步书刊。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十七岁
七月,上山参加浙南游击纵队括苍山支队青训班学习。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十八岁
在支队部油印组誊写《括苍周报》也刻木刻、画漫画等。

1949年 己丑 十九岁
四月,玉环解放。五月,温州解放,在市军管会任秘书。调温州地委文工队任队长。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庚寅 二十岁
组织公演温州方言歌剧《王秀鸾》。调文成县团委任宣传部长。剪纸《参军》在《青年报》发表。调华东团校学习。
1951年 辛卯 二十一岁
漫画《麦克阿瑟三部曲》等作品在《华东画报》发表。下乡参加土改。浙江《农村青年》社任编辑。《小放牛》秧歌剧发表。
1952年 壬辰 二十二岁
摄影作品六幅刊登《华东农民》封面及封三、四上。
1953年 癸巳 二十三岁
组织团省委歌咏队参加省级机关歌咏比赛获第一名。
1954年 甲午 二十四岁
以调干生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就读。
1955年 乙未 二十五岁
参加全国大学生慰问团任秘书长。参加黄宾虹老师追悼大会。
1956年 丙申 二十六岁
十月,在外西湖有幸会见周恩来总理,并亲切握手交谈。
1957年 丁酉 二十七岁
担任学生会主席。赴山西永乐宫临摹壁画。参加反右运动。

1958年 戊戌 二十八岁

工笔画《接班人》编在《现代中国画选集》。评为“五好学生”。《社会主义好》等作品发表《江西日报》。

1959年 己亥 二十九岁

肖像画《方志敏烈士》编在《浙江美术选集》。毕业后留校任教。作品《烧地契》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后在《人民日报》、《中国画》等报刊发表，又为吉林等省博物馆收藏。

1960年 庚子 三十岁

协助带领毕业班赴敦煌实习。国庆节在天安门观众席观礼，荣幸地见到毛主席。参加系里领导工作。

1961年 辛丑 三十一岁

在潘天寿院长画室举行拜师会，拜潘先生为师并兼秘书，自此潜心于花鸟画求索。夏，随潘天寿先生去湖州等地写生。

1962年 壬寅 三十二岁

随潘天寿先生赴雁荡等地写生，为潘先生举办个人画展。

1963年 癸卯 三十三岁

一月，在美院陈列馆有幸接待朱德委员长。应山东省省长谭启龙之邀，随潘天寿先生赴济南等地参观、讲学。向组织提议为潘天寿先生晋升为一级教授。肺科医生诊断：右肺有一空洞，要住院；要开刀；不能结婚，使他愕然，只好住院治疗。

1964年 甲辰 三十四岁

住院时，被评为优秀疗养员，潘天寿先生来信鼓励：

“静心休养”，“身体不强健，就谈不上学问与事业”。

1965年 乙巳 三十五岁

制作抗美援朝宣传画。随潘天寿先生赴宁海参观、视察顾真结婚，潘天寿先生赠画二幅，藉表贺忱。

1966年 丙午 三十六岁

五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与省委联络组刘方等主持系里工作。

1967年 丁未 三十七岁

被红卫兵勒令“靠边站”，家中和办公室被查抄。

1968年 戊申 三十八岁

被工宣队分配做潘天寿问题的外调工作。女儿叶澜出生。

1969年 己酉 三十九岁

迁校嵊县三界。下乡桐庐俞赵大队参加劳动。

1970年 庚戌 四十岁

迁校桐庐杨浦，参加建校劳动。

1971年 辛亥 四十一岁

九月，潘天寿先生含冤病故。浙江美院迁回杭州。

1972年 壬子 四十二岁

作《永不生绣》在南京《东海民兵》发表。

1973年 癸丑 四十三岁

访王个移先生，王老特为赋诗并篆刻，提携后进。

1974年 甲寅 四十四岁

作《步调一致》参加省美术展览。担任人物画课。

1975年 乙卯 四十五岁

赴新疆伊犁等地举办美训班，作《全家兵》出版年画。

1976年 丙辰 四十六岁
父亲病故，偕师母、女儿回乡奔丧。赴井冈山等地深入生活，作《秋收暴动》参加省美展。

1977年 丁巳 四十七岁
继续担任人物画课。

1978年 戊午 四十八岁
撰《潘天寿艺术生涯》发表于《西泠艺丛》。参加潘天寿先生追悼会筹备组，写就“痛失人师”隶书四字，以表哀悼。

1979年 己未 四十九岁
由沈雁冰先生题字的《祝福组画》完成，参加省美展。《织网图》在日本、美国展出。继续任课。

1980年 庚申 五十岁
记录整理的潘天寿《中国画布局》发表。接待日本岐阜市长蒔田浩一行。秋，在西泠印社会见日本书法大师青山杉雨偕师母青山德子。《初夏》等作品在新加坡发表。与莫朴院长等一行去北京举办“潘天寿画展”。此后一直担任花鸟画课。

1981年 辛酉 五十一岁
应邀赴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博览会”，并举行小型个人画展。在美国旧金山作短暂访问。第二次会见青山杉雨先生。

1982年 壬戌 五十二岁
春，第三次会见青山先生。代表美院赴南京参加《潘天寿画展》开幕式。《鹤鸣图》在智利展出。

1983年 癸亥 五十三岁
《荷花翠鸟》在意大利展出。《姣姣渔姑》在全国各大

城市展出。在厦门举办个人画展。《山雨欲来》在法国展出。被评为院先进工作者。第四次会见青山先生。

1984年 甲子 五十四岁
《南极居民》参加省美展，被评为优秀作品。在浙江美院举办个人画展。参加台州地区文代会。《中国美术名作欣赏》、《潘天寿论画笔录》二书在上海出版。

1985年 乙丑 五十五岁
参加玉环县文代会。在中央电视台讲授花鸟画课六讲。《鹤鸣图》被由加蓬国家博物馆收藏。浙江美院聘为副教授，第五次会见青山先生。

1986年 丙寅 五十六岁
在上海举办两次个人画展，陆俨少、唐云诸老题词鼓励，作品分别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大洋之客》入选第一届当代中国花鸟画展。《花鸟画基础技法》一书出版。天津《迎春花》发表作品六幅。第六次会见青山先生。

1987年 丁卯 五十七岁
《风袅寒丝映水深》在日本参加中日水墨画展。《卷丹图》由北京图书馆收藏。《墨香飘四海》艺术生活电视片制成。《傲雪图》被美国印第安纳州艺术馆收藏。

1988年 戊辰 五十八岁
应邀赴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画展盛况和作品在《联合早报》等报登载。《西泠风荷》选入浙、港、台画展。浙江省老干部局聘为教授。主编《中国花鸟画演进概述》幻灯片制成。

1989年 己巳 五十九岁
《秋菊晚愈香》在台北市展出。台中市举办沙孟海、

张令杭、叶尚青等六人书画展。在深圳举行个人画展，画展盛况和作品在香港《晶报》等六家报刊上发表。

1990年

庚午 六十岁

《叶尚青水墨画展》在台中市举办，并有王伯敏先生评画一文。送女儿叶澜赴日本东京文化服装学院留学。编著的《中国美术名作欣赏》一书荣获《当代大学生丛书》金三角优秀图书奖。《风荷图》为杨开慧烈士纪念馆收藏。《晨曲》等作品发表在《福建日报》。作《双青图》参加全国水墨画展。浙江美院聘为国画教授。《芳馨图》捐赠中国修建万里长城委员会。

1991年

辛未 六十一岁

《叶尚青画集》在香港出版。中国新华书画院特聘画师。应邀赴韩国参加“中国商展”，并举行小型个人画展。离休。

1992年

壬申 六十二岁

《燕子声声里》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新加坡《墨澜社》聘为艺术顾问，《意笔花鸟画谱》一书出版。题画诗十首发表于美院学报。香港《新晚报》刊登《冷碧新秋水》等作品十一幅，并登载叶文玲评画一文。参加沙孟海先生追悼大会。

1993年

癸酉 六十三岁

青山杉雨先生逝世，作诗《缅怀咏》表示哀悼。《香茗图》登载《光明日报》。《疏影》获国际文化交流荣誉奖。传略编入《国际现代书画篆刻家大辞典》，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授予世界艺术家称号。为新加坡名画家赖瑞龙《画集》作序。

1994年

甲戌 六十四岁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鱼水图》，并登载叶文玲《大橡万年青》评论文章、《潘天寿论画笔录》重版。

（可人辑）



庄平，玉环县坎门镇人。1960年1月出生，于西安市，1966年9月开始接受小学教育，1971年7月随父母迁往贵州省遵义地区某军工工厂，1977年7月高中毕业。在“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名：北京航空学院）喷气推进系学习，主修航空发动机设计专业，1982年1月完成大学学业并且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学士学位论文题目为：
《高空加氧点火的
试验研究》。同年3
月考取本校同专业硕
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为航空叶轮机械原
理，于1984年6月毕
业并且获得工学硕士
学位，完成的硕士学
位论文为：《轴流压
气机扩大稳定工况方

年青的工学博士

庄平

法的试验研究》。同
年9月，经入学考试，
继续在本校同专业攻
读博士学位，研究方
向为航空叶轮机械非
定常流动，1987年7
月以全优通过博士论
文答辩，并且获得工
学博士学位，博士学
位论文题目为《轴流
压气机机匣处理试验
及数值研究》。

1987年10月根据本人的申请，经国家科委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进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工作。在博士后流动站期间，先后完成了《利用“涡量汇”机匣扩大压气机稳定工况范围》、《L2F-4000双焦点激光测速仪多入口数据采集与处理软件》以及《在吸气式小型风洞中利用双焦点激光测速仪进行单个翼型亚音速

和跨音速绕流的试验研究》等研究课题，其中，“涡量汇”机匣扩稳方法于1992年11月30日获得中国国防专利局发明专利，专利号为：89 1 09352.4。1989年10月完成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同时留本所航空压气机实验室工作并且通过副研究员任职资格被聘为副研究员。1990年1月北京工程热物理学会成立，被聘为该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被聘为青年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航空压气机实验室工作期间，除了继续从事航空压气机不稳定流动的研究工作外，为了适应我国的改革开放浪潮，面向社会、面向生产，先后承担并完成了辽宁省朝阳制药厂螺旋霉素发酵过程、螺旋霉素提炼过程、麦白霉素发酵过程工艺参数的计算机监测和自动控制软件、生产管理软件的制作与调试、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炼油厂、化工一厂的工业冷却水塔动态模拟装置的数据采集、自动控制及数据处理软件的编制和调试、以及台商投资的江苏省江阴龙灯农药厂灭多威生产线工艺参数的计算机监测、自动控制上、下位机软件制作和调试，即：一共完成了六大工程九个软件的开发工作。1993年2月由于工作需要，调到本所超跨音速压气机/透平叶栅风洞实验室工作，任该实验室副主任，主持透平叶栅风洞的重建、改建工作。同时被所里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这些年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重要的论文为：

- [1] Zhuang ping, Lu Ya-Jun, Li Bao-Ju, Feng Yu-chen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the Mechanism
 of Stall Margin Improvement of Casing Treatment*
 (机匣处理改善失速裕度的机理的试验研究)
 ASME-IGT-102 1985
- [2] 庄平, 陆亚钧 机匣处理对压气机性能和气流结构影响的试验研究
 《航空学报》第七卷 第四期 1986
- [3] P. Zhuang, Y. F. Li, P. Cui, Z. Y. Fang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the Flow
 Around a Single Aerofoil in Wind Tunnel
 Using L2F Velocimeter*
 (在风洞中利用L2F测速仪进行单个翼型绕流的试验研究)
- [4] Zhuang Ping, Wang BaoGuo, Li YouFu, Fang
 ZongYi, Chen NaiXing *Experimental Investiga
 tions on the Subsonic and Transonic Flow in a Wind
 Tunnel*
 (在风洞中进行亚音速和跨音速流动的试验研究)
 ISAIF 1990
- [5] 庄平, 陆亚钧, 崔济亚 轴流压气机机匣处理数值研究
 《航空学报》第十二卷 第三期 1991
- [6] Zhuang Ping, Lu Yajun, Tsui Chihya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Axial Flow
 Compressor Casing Treatment*

(轴流压气机机匣处理流场的数值计算)

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 Vol.4
 No.4 1991

- [7] 庄平, 李幼夫, 崔平, 房宗义
 利用双焦点激光测速仪测量小型风洞中单个叶型绕流的
 试验研究

《气动实验与测量控制》第六卷 第一期 1992

其中, 在《航空学报》中文版和英文版发表的两篇论文[5]
 和[6]于1992年被国外权威刊物《INTERNATIONAL
 AEROSPACE》摘录(A92-50216 Vol.32 No.21,
 A92-53381 Vol.32 No.22)。

最近, 他编写了名为:《利用Turbo C2.0开发TVGA
 1024×768×16扩充图形库函数》的书籍, 这本书大约有50
 万字, 预计在1994年与读者见面。

(本刊辑)

著名哲学家

- 刘 嵘 -



刘嵘(1920年5月5日—)，字欲庭，汉族，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陈屿乡（现改镇制）。他年青丧父，端赖其母兄的培养，得以完成中学学业，进大学学习。1947年7月，他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有幸得到系主任朱谦之教授的赏识和举荐，留校任助教。1950年9月，经学校荐送，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由苏联专家讲授和辅导，攻读马列主义基础专业研究生课程，撰写论文，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为其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1952年7月毕业返校后，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53年后，曾先后兼任教学研究科科长、哲学组组长等职。1960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后，先后兼任系副主任、系总支书记、系主任。1975年起兼任校党常委、副校长，分管文科工作。1984年，因年龄关系，免去系主任、常委、副校长等职。1985年又兼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所所长，一直至今。1985至1992年，还先后兼任广东社会科大学校长、广州市教育工会主席。

社会工作方面，曾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

员。现兼任广东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以及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

刘嵘长期“双肩挑”，从未间断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先后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列哲学著作选读、毛泽东思想著作、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等课。1978年起，招收和培养我国首批毛泽东哲学思想硕士研究生。1987年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合作培养我国第一位毛泽东哲学思想博士生。

刘嵘长期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早在1965年秋，就为哲学系学生作“关于毛泽东思想怎样一分为二”的报告。后在“文革”中，因此而遭受多次批斗。粉碎“四人帮”后，得到彻底纠正，广东省委选派刘嵘作为代表之一，参加全国理论务虚会议。此后，他又立志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工作，曾先后发表有关论文数十篇，其中主要有：

《略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再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评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几种模糊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灿烂明珠》、《学习〈矛盾论〉正确观察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等论文。还先后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1983年)、《反思和开拓的十年——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新篇章》(1987年)、《现实问题的思考》(主编1985年)、《人类历史的新航道》(双主编之一，1990年)等著作。新著《毛泽东哲学思想新篇——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于1993年10月出版。

刘嵘治学方法和经验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既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善于不断开拓创新。1978年受原教育部的委托，主持和组织全国二十多所高等院校的哲学教师。通过全国性三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编写和出版了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中山大学哲学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副主编）的教科书，为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学科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中，发表了一系列新见解：他认为，毛泽东哲学作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检验和发展科学体系。要正确认识和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和毛泽东个人哲学思想的联系和区别；前者是不包含错误的，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后者是不可能不包含错误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恰恰在于脱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轨道，背离了毛泽东自己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刘嵘还根据自己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心得，从毛泽东哲学思想自身体系出发，突破现行的“四大块”模式，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作了新的概括：（1）主观和客观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2）实事求是是对主观和客观这一基本问题简明而通俗的科学回答，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基本点。（3）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法、独立自主等一整套的、不同层次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都是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认识

中国的客观实际及其规律，达到主观和客观两者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上述见解，得到哲学界的重视和肯定。有关论文《略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再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和专著《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获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哲学专业自学考试委员会曾决定把该书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的教学参考书之一，并委托他编写《毛泽东哲学思想自学考试大纲》，经审稿会议修改后，公开出版。1992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尼·耐特，作为特邀编辑。主编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自中国的研究（1981—1989）年》，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一书第一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全文翻译出版。

二是刘嵘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探索现实斗争中的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中发展的，“运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时，不仅要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以及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著作，更重要的是要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现实斗争中特别是中国建设中的问题。他常说，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道。他主编的《现实问题的思考》一书就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高校学生提出的现实问题。受到好评而获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红旗》杂志发表专文评价，认为是“有益的尝试”。《反思和开拓的十年——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新篇章》一书，通过对十年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考察，阐明了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拨乱反正，拨林彪、

“四人帮”之乱，批评“两个凡是”、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历史地位；怎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行一系列的战略决策，走自己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而阐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没有“过时”，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建设的胜利旗帜。该书受到好评，并获广东省社会科学和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协会优秀学术著作三等奖。在新著《毛泽东哲学思想新篇——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吸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新成果，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阐述邓小平怎样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他还通过长期的研究，在《关于时代问题的反思》和《学习〈矛盾论〉正确观察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等论文中，学习和运用矛盾分析法，恢复和提出当今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时代”；并根据历史重大事件的发展，认为在这个时代的长过程中，经过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革命和战争阶段，主题是战争和革命，或者是战争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引起战争。自70年代初，开始走入第二个历史阶段，即和平与发展的历史阶段，其主题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因此，在观察当今世界范围的问题时，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根本矛盾的斗争，贯彻始终，又要看到这一根本矛盾斗争，主要是通过两个主题表现出来：既要看到对立之中有统一、有互助、合作的一面；又要看到统一中有对立，有斗争。不然，就会犯

“左”的或右的片面性错误。

三是刘嵘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他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既要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又要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所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应有之义。如他在1987年春，应广东省委、高教工委之邀，作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演讲。在1990年作了《〈矛盾论〉讲解》和《学习〈矛盾论〉正确观察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演讲》，并经过修改后均公开发表。在1990年，还主编了《人类历史的新航道》一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破立结合的方法，作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同时，除了有机会到美、加、日等国访问考察，到香港、澳门等地参观外，还结合研究和演讲，深入基层到台山、斗门、珠海、深圳、中山、江门等市县以及苏南、四川等地进行参观调查，从中吸取营养；并力图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一定规律性的认识。

刘嵘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方向、方法对头，教书育人，成绩显著。1989年，以他牵头的集体项目——《不断开拓创新建设教材，努力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生》获广东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89年，国家教委、人事部、中国教育工会授予刘嵘全国优秀教师奖章。1991年国务院发给政府特殊津贴。

现在，刘嵘正从事《中国建设哲学问题探索》的研究，培养博士生，争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

（本刊辑）



●胸外科专家●

刘欲团教授访问记

被誉为德高望重，年已古稀的刘欲团教授正从手术室里出来，他刚组织指挥抢救了一位重症伤员后，冲洗了澡，坐在休息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我的一生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应该做的为人民服务的医生而已”。他虽已高龄，但为了救活疑难病人，同志们仍不时来请教这位医术精湛，累续43年丰富经验的老医生。而他自己总是不遗余力，亲临现场指挥，甚至参加关键的手术步骤，常使病人从绝境中转危为安。

这位由玉环人民养大的同志是1936年毕业于玉环县陈岙小学，1938年考入由杭州迁来乐清县雁荡山的崇文初级中学。1942年考入当时浙江省最有名的省立联合高中。他回忆说：这所高中是由当时一批有骨气的、学术水平高的和不愿在铁蹄下生活的几所杭州高级中学的教师，内迁到浙江省丽水，原来又迁到山区青田南田。在生活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该校治学严谨，对学生使用淘汰制，对期末成绩总平均不超过65分者，一律毫不留情地予以退学，因此学生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学习，仍非常勤奋。刘说，他当时在这所学校受到严格的训练，为今后学业的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

虽然这所学校是高中，但有的课程是用英语讲授的，如数学中的几何、三角，自始至终用英语讲解。功课之紧，生活条件之差，不是体力强壮和能吃苦耐劳的人是无法支持的。

他高中毕业后，因为春季班，需等半年方可投考大学，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执教于玉环县环山小学。后考入当时的中正医学院(六年制)。当他读到医学五年级时，全国解放，解放军接管中正医学院，改名华中医学院，随后又改为第六军医大学及第三军医大学。解放军接管后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于是他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医。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实习时，被他的老师，当时的外科主任凌惠扬教授看中，从而走上外科医生的漫长道路。经历助教、讲师、副教授，于1983年提升为教授。他1980年任胸心外科主任以来，使本科的各级医生经过硕士研究生的培训，同时又输送几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到兄弟院校及部队医院，为部队培养高级医务人员作出贡献。几十年来，他埋头医、教、研工作，撰写与发表论文近40篇，参加六部专著的撰写，其中获军队科技进步奖11项，医疗成果奖7项，同时又多次完成艰巨的战地救护任务，从而于1992年获得政府的特殊津贴。

他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先，不怕牺牲，服从领导分配的各项任务。他几次率领医疗队或手术队，深入前线、部队为伤病员救伤治病。最重要的一次是1979年率领手术队深入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火线，头上炮声隆隆，手术台上却不动地闪动着手术刀。当时他救活了不少受伤不久的伤员，大大提高了救活率，减少了伤死率和并发症，特别是胸部火器穿透伤，其救活成功率远远超过抗美援朝的成绩，并摸索出一套胸部火器穿透伤的救治经验，为祖国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成绩

显著，由此而荣获一等功，并光荣地参加了1987年的第二届全军英模大会，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面对这些成绩，他总是谦虚地说，这是党教育的结果。

近几年来，他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人才断层的情况下，如何在提高全科人员素质的同时，挑选和培养好德才兼备的年青学术带头人。他认为一个跨世纪的，能在国际上接轨的胸心血管外科学术带头人，必须是能吃苦耐劳，基础理论扎实，学识渊博，外语优良，能团结人，有远大目光，胜不骄，败不馁的德才兼备干部。他说：“我们参予国际竞争，关键是振兴科技，而科技的振兴，关键是靠人才。说到底人才决定一切。”他终于在大家推荐下看准了一位年仅29岁的青年医生，他姓肖，人称“肖快刀”，外科手术既准确又迅速；观察病人细致，是他40多年来罕见的后起之秀。肖的其他条件也均符合他提出的条件，被人公认为学术带头人的接班人。目前肖医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并于今年提升为心外科副主任。

刘欲团教授经常感叹地说：“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难，做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更难。一个中国科学家，应该有骨气，不要因为那里有利可图就往那里钻，朝三暮四，到头来则一事无成。”

(平平)



自我介绍

● 华乃文

跟父亲学染布。

1940年由我同学帮助才得上温中初中。读了三年到1943年毕业。后来转考取了杭高、温高、临海医专和温师。最后我还得读最省钱温师。到1946年毕业。

穷家子弟求学此地步原该终止了，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是枯木逢春，得到二次深造机会，我终身难忘党对我的关怀与恩情。

第一次是1952年，我还在嘉兴专署工作，组织上通知到杭州补习，然后读大学学技术。就这样我到杭州浙大主办的

美不美山间水，亲不亲故乡人。

怀乡之情，人皆有之，我也如此，但年轻时总想出来闯，后来我闯了大半个中国，到头来还是家乡好，乡土人情珍贵呀！玉环政协文史资料嘱我写一篇自传，我文笔拙劣写不好，只好向家乡组织和乡亲们作一些自我介绍吧！

我是1922年4月初出生于玉环西青街，祖父人叫云屏先生，是个穷秀才，曾执教于环山书院。祖母董氏，父亲名叫业诗，开华维新染坊，母亲卓氏，全家主要靠染布度日。

我的学历情况：

我家清贫，无力支持我正常上学，因此我的学习时断时续，有时要亲友资助。后来全靠党组织培养才有今天。

我在环山小学毕业前就休学二次，

干部补习班报到，在班里我除了自己学还当互助小组长，帮助别人学习，三个月之后，班里考试个人填志愿，我的第一个志愿被录取了，我进上海交通大学。

在交大我读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修科，学制是二年，那时学习非常紧张，我还是学习组长，苦学了两年毕业了。

第二次是1958年6月，当时我在博山电机厂已算得上是个得力的技术员，组织上又通知我脱产学习俄文，年底到苏联去学习军用微特电机，并告诉我这是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回来要到906厂工作，共去三人，分设计、工艺、工装，时间一年半，如确有困难，可以申请延长到两年，我知道这在当时是保密的尖端技术，我们要努力完成它，此后我们学了五个月的俄文，就到北京办手续出国。

1959年初我在莫斯科红门的627#研究院，先学习伺眼电机和测速电机，我的主要导师是年轻副博士，他很热心地教我学伺眼电机和测速电机的原理和设计，并指导我自己动手设计一个伺眼测速机组，一直到样机做出测试完毕为止，他还介绍我给其他导师学习直流永磁等不同的微特电机，在红门时间只有10个月，但我的确增长不少知识，搞设计这些精密元件的人，他要考虑到别人都疏忽以为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都丝毫不能放过。

1959年11月按原计划我应到列宁格勒的506#研究院去学习自整角机和旋转变压器，由于中苏关系不好了，我就去不了，最后把我送到1#工厂学习，苏联的工厂不搞产品设计，到那里只能看到设计图纸一类的资料，这样我就苦了，我只能按我已有技术知识去理解这些设计，我到了1#工厂之后，虽然他们是906厂协作的对口厂，对我们还是非常热情，给我们学习创造许多方便条件，我也确实学到自整角机

和旋转变压器的一般设计知识，但在设计的深度上感到有些不足，所以我还是很感激他们的关怀，他们已经很尽力了，当时的环境我是寄人篱下，只能结束回国。

我的工作经历

1946年我在温师毕业后，在浙江玉环湖州等地方教了三年的书。

1949年5月，我投身革命，在湖嘉公学学习了三个月，9月份分配嘉兴专署，后来调到专署农场任单位会计，历时8个月。

1950年4月，我又调回专署，在工商科任办事员，科长祝岐田敦厚笃实，我在工商科除日常工作之外，主要做了二件事：第一在春茧收购时节，是我地区第一次抛出大量资金。上级怕物价上涨影响政府威信，当时，我主管国营企业组织五大公司，调拨物资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使物价稳定。第二件要做好可靠的工商管理基础而开展全地区的工商业总登记，我们科里举办工商登记干部学习班，招收学员组织学习政策，然后分二市试点，试点之后，抽调干部全面铺开。那时我带工作队到湖州蹲点，任副主任，工作三四个月，然后分配干部学员全面铺开到各县工作，时间差不多达一年之久。

1954年交大毕业后原是分配到北京一机部，我不想在部里工作，后来要求分配山东博山电机厂，我在电机厂先后任设计员、主任设计员。我在博山受到组织上无限关怀，工作上锻炼我，学习上照顾我，当时，我的科长董受申是山东省的电机权威，他和俞厂长都很帮助我，使我技术进步很快，政治上我也参加党的组织，我在博山主要作了三件事：第一

件是修改设计和反修废品，节约了几十吨的硅钢片和铜铝紧缺的材料；第二件我参加肃反工作处理十二起连年累积的未了案件，使这些老工人和技术干部放下包袱安心工作；第三件我参加了一机部组织中小型电机第二次统一设计，认识了高庆云工程师，学习了他带来的美国西屋公司的设计资料。使我在异步电机的设计方面迈出一大步。

1960年我从苏联回厂，就到四川成都的906厂。我在该厂历时近四年，任技术组长、工程师之职，906厂的主要领导老干部很多，宋厂长、俞总工程师都在博山蹲过，所以他们对我也比较了解，我在906厂主要是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在专家办公室处理专家遗留建议及技术问题。使我们工厂能维持正常生产（当时专家突然撤退，我们许多企业瘫痪了不能生产）更主要的是修改专家的建议使无接触自整角，从此稳定了精度顺利进行生产。因此，我在60年年底也就提升为工程师了。第二件事是我回到设计科任技术组长，大力开展自整角机旋转变压器和交直流伺眼电机的设计和生产，以满足国防的需要。第三件事是我在俞总的领导下参加63年国家科委主持的自动装置微特电机的协调会议，会议是聂总提议召开的，各兵种、各工业部（二机部除外）都参加，目的是平衡微特电的供需情况希望统一管理，会议历时半年多，我调查微电机生产和使用及配套单位，做出生产供应计划，做了微电机供应的三五规划、四五远景规划。

1964年6月，我奉四机部的指示来到880厂支援这新厂的技术工作，在此我一直工作到86年离休，在该厂我任产品研究代主任、工程师、副科长、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离休老干部（县团级）等职。880厂是十几个地方小厂合并成的，

所以地方的色彩比较浓厚，56年合营，到1958年已归属四机部，可是一直拿不出军品，我来厂即成立设计室，开始设计接触式自整角机、军用感应电机、伺眼电机等，2年多就试成20多个样品，投产的有十多个产品，有些就是后来该厂的吃饭产品，十年浩劫我也不例外，我的家庭吃了不少苦头，1976年我到设计科，1980年提为副总，此后我就做些管理工作。

1982年我被安徽阜阳地区中级技术职称评委会聘请为委员。

1983年我被电子工业部聘请为科技新成果评审组组长。

我的自行设计情况：

天下事难在不知，知者不难。56年我在博山电机厂，就继承A型电机的结构，我自行设计出绕线转子电机供生产使用，还按苏联的样本我们设计了许多工速电动机，当时博山电机是一机部发展新品的优秀厂。

1965年我接四机部的指示，根据十五所的需要自行设计给计算机使用的磁带电机十五所提出电机的机电时间常数又能大于0.3/秒，我测试结果这个电机的机电常数只有0.04/秒，不但十五所用了，科学院计算所也采用我设计的电机。

1938年3月,
(农历正月十六日)
我出生在玉环芦浦
分水小塘里一家贫
苦农民家里。父
亲把我起名叫朱馥
红;我弟起名叫朱
馥龙。我四岁左右
得了重病,出了牛
痘,我父母害怕,
又把我认了姓方的
义父,他家是“书”
字辈,所以我叫朱
书川。上小学时,
因我们家乡方言



我的自传

● 朱子川

“书”与“子”同音,小学校长把我的名字写成了朱子川,就这样沿用至今。

我父亲叫朱显居,母亲阮氏。他们成家后,自成一家,当时田无半分,地无半亩,生活十分贫困,全靠父亲为地主晒盐赚点薄钱过活。大约在我五岁时,我父亲因在盐坦受暴日烘

晒,继而又突然遭雷阵雨浇淋,得了急病,因无钱医治突然亡故。我母亲无法维持生活,先是给地主家当奶妈,后来又改嫁,于一九五七年亡故,年仅三十八岁。

我父母双亡后,由祖母、叔父抚养我和我的弟弟,祖孙三代四人,老的老,少的少,既无劳力,更无钱财,整天受饥挨饿,过着难以煎熬的生活。我从小就得放牛兼砍柴,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若不是一九四九年家乡获得解放,我早已是黄土埋死骨了。

上学念书,从小我就梦寐以求,看着有钱人家的小孩上学,我曾哭过多次,可是总不能实现。一九五一年我们村办起了夜校,我就兴高采烈地参加了。一九五二年上半年经朱

馥强、朱碧洞等去我家动员,我叔朱显葱应允了。这样,一心想求学的我,终于踏进了芦岙小学的门槛。因为当时我的年纪较大,所以就从小学第八册念起。在老师的精心教导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学习,一九五四年七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芦岙小学;同年八月我考入玉环中学(现在叫楚门中学,当时玉环只有一所中学,而且无高中班)。在初中时,由于学习成绩及其他方面均较好,于是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在班内担任学习委员。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由金列风、王财钿介绍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过团支委。一九五七年七月毕业于玉环中学;同年考入浙江温岭中学高中部。在高中学习期间担任过团支委、班长。一九五八年被评为县级优秀团员。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八日经苏有本、朱沛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〇年七月毕业于温岭中学。同年八月我被录取在浙江大学第10系(工程物理系)。一九六三年系和专业调整,全班转入无线电系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制造专业。在大学期间一方面由于自己刻苦努力不够;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对我的影响亦较大,所以学习成绩一般。在大学时期担任过班委、团支委、浙江大学第三分部学生会劳动部长、宣传部长等职务,曾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一九六五年七月我毕业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制造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公安部十二局。八月中旬我到北京报到,八月底我随公安部和公安部队司令部组成的“四清”工作团到山东省威海市搞四清。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清”工作队撤离,我被安排作留守队员,直至九月上旬才回到北京。这时,谢富治已向周总理打报告,说公安部

不搞托拉斯，要把当时公安部所属的一些研究所、工厂和单位以及六五年招收的一百多个专业，三百余名新大学生转给四机部；周总理说公安部新大学生是从全国高等学校优先挑选来的优秀毕业生，不要转到四机部，于是就批转给七机部。当时正值“造反有理”的动荡年代，一些大学生就不愿去七机部，提出要国家计划委员会重新分配；国家计委同意予以重新分配。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当时国防科委所属的8334部队（即现在的国防科工委第廿一训练基地研究所）。一九六七年三月我到新疆部队报了到，同年五至七月我参加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的飞机取样任务，荣幸地看到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的壮观。

一九六七年底，国防科委拟在廿一所建一座原子能反应堆，于是我就跟我们组的同志们一道到北京一九四所（原子能反应堆研究所）实习。我被分配去学习搞剂量监督和防护，圆满地完成了实习任务。一九六八年底原子能反应堆又决定不建了。这样，我又回到新疆搞核试验参数测试工作。这个工作从一九六九年初一直干到一九八三年底，共计十五年，而这十五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六九年初至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我共执行了三次核试验任务的参数测试。一次是参加测试爆炸时产生的温度梯度（等温球）。这个参数是为了推算和核实核爆炸产生的特高温对人、对动物、对武器装备以及建筑物的杀伤率和破坏率。还有二次则是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的同志一道，测试核爆炸的 T 总。就是测量核爆炸从炸药引爆到原子弹（或氢弹）爆炸完成的全部时间。测准这个时间，从这个时间的长短，可以推算原子弹（氢弹）的威力、

能耗、弹壳结构优劣、核燃料的燃烧率……等各种参数，为改进设计、制造原子弹、氢弹提供实验依据。这两次测试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其中第二次测试我是一个测试站的指导员和站长。在这阶段我除了执行三次核测试任务之外，还研制成：(a)半导体探测器暗电流检验器；(b)100MC快脉放大器；(c)水银开关标准幅度产生器（共做了二台，有一台一直被北京原子能所拿去使用）；(d)电缆长度测试仪等等。这些仪器的研制成功对于提高核测试精度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我还做了大量的物理方面和电学方面的实验工作。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开始，我着手进行对于SBM-14示波器改装的研究。因为当时我们组面临测试记录核爆炸中产生的毫微秒级的单次的特快信号，所有的国产示波器都无法满足要求。如果从国外进口高档的示波器如：7844型、7904型等，一则因需求量大，一时难以购到；二则需要用大量外汇。这个研究项目至一九七九年底基本完成。一九八二年由上海无线电廿一厂和江苏杨中无线电厂分别投入大批量的生产。为当时我们第三研究室的高强度混合场聚变中子的测量取得圆满测试成果以及为研究所一、二、四等研究室的冲击波、X光、电磁干扰等等项目测得满意结果做出了较大贡献。当时也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一九七九年部队首次评定技术职称时，被晋升为工程师。

第二阶段，即从一九七九年底至一九八三年十月。我继续做科研工作和执行两次核参数测试的准备工作以及执行21-94、21-83两次核参数测试任务。在这期间仅获部级以上的奖励就有：

1.高强度混合场聚变中子测量及系统。1985年国家级科

技进步一等奖（主要参加者）。

2、SBM-14示波器的改装。获1980年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三等奖（主要负责人，改装完成者）。

3、21-83试验出壳聚变中子时间谱。获1983年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三等奖（主要负责人、完成者之一）。

4、核试验近区中子测量项目。获1983年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二等奖（主要参加者，完成者）。

5、硅PIN半导体探测器对单个重带电粒子的时间响应。获1980年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四等奖（参加者）。

6、1KV.ns级脉冲信号产生器的研制。获1982年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五等奖（参加者）。

7、几种国产高压示波管软X射线的检测。获1980年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五等奖（参加者）。

以上获奖项目中，有关“中子”的项目的测试成果都是为改进原子弹、氢弹的设计、制造以及为制造中子弹提供参数的。

一九八三年底至一九八四年四月，我被调到研究所器材科搞国内外的示波器的检修。总共检修了一百三十余台国内外出产的示波器。其中700系列示波器（美国Tektronid公司产）的检修获1984年部门级科技进步五等奖。

在这期间发表的文章有：

(1)关于SBM-14示波器的改装。发表于《试验与研究》1982年第三期上。

(2)几种国产高压示波管产生的低能X射线的初步检测。发表于《试验与研究》1981年第三期上。

在这期间存档的文章有：

(1)提高SBM-14示波器写速的情况和体会。（1979年存档于廿一所）。

(2)关于SBM-14示波器的改装总结。（1981年存档于廿一所）。

(3)超强显影液配方的初探。（1982年存档于廿一所）。

我在新疆戈壁滩和戈壁山沟深处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十七个春秋，在那里做了不少科研工作并执行了六次核试验任务，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那里经受了烈日暴晒、风砂袭击、寒风冰水刺骨等等的考验，也经受了喝苦水，经常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的考验和锻炼。又经受了其他各种自然的、人为的辛酸苦辣的艰辛环境和条件以及核辐射剂量伤害的严峻考验。为祖国的国防尖端科研作出了一点贡献。在那里我担任过业务副小组长、副大组长、党支部委员、站长等，和同志们一起荣立了集体三等功二次。我自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及嘉奖等约十次。

一九八四年四月底，我被调来石家庄陆军学院。在本院训练部中心实验室（现在和电子技术、机械力学合并成机电教研室）工作，主要负责仪器设备维修。八年来完成了以下工作：(1)共计维修仪器、仪表、设备、家用电器等近一千五百台次；(2)把六台进口的20寸黑白电视机改装成用于本院指挥中心监控室的监视器；(3)为中心实验室研制了电热蒸馏水器停水自动停电控制器；(4)参加为侦察教研室专修室用的计算机课堂教学管理系的方案论证，线路板、控制台的安装，并把该系统接入大屏幕彩色投影机显示；(5)参加语言教研室进口的视听设备的安装；(6)参加了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石家庄陆军学院院景沙盘及升华转印机的安

装；(7)负责改装陆军学院家属区暖气锅炉房的电气控制系统；(8)修理过“皇冠”牌进口轿车的电控部分、收放机，修理过电控理发椅的控制部分，电子计算机等等就不一一赘叙。

到石家庄陆军学院八年来，我受到嘉奖一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两次，荣立三等功一次。一九八八年被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其业绩已辑入《全军院校名师大典》。

来陆院后写的文章有：“培养德才兼备初级指挥人才之我见”，“试论院校教育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两篇为陆院入选论文。并被聘为《石家庄陆军学院学报》特邀审稿人。另外，两篇即“浮云与雨点”、“压力、动力和威力”发表在《杂文界》杂志上。

我曾经是中国电子学会新疆分会的会员和河北省高校实验管理学会的会员。

总之，我觉得自己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知识面比较宽广，动手能力强，有较高的学术技术水平，有独立完成研究课题和工程项目的能力，为祖国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是和高水平的同志相比起来，我觉得还是相差很远的。虽然我已有高级技术职称，但是我还没有真正成才。我之所以能够做出点小成绩来，这是我不忘记党、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不忘叔父对我的哺育；不忘记各级老师对我的教导的结果。也是平时我能够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对技术精益求精，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结晶。

最后，用我于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写的《自勉(一)》作为本自传的结束语。

自 勉 (一)

我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极其普普通通的人，

我没有什么特殊本领；

我有一颗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心。

我不想学“知了”整天“叽叽喳喳”地叫；

我倒象蚯蚓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

我曾经在罗布泊附近度过了十七个春秋；

我没有显赫的业绩和权位，

我也没有名利熏心，

我更没有做过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情！

我做了铺路砂石、人梯，不必自叙，

我的功过如何？就让他人讲评。



● 中国画坛怪才

青年画家 朱仁民

朱仁民，号莲花洋人，祖籍玉环城关，1949年出生于宁海，少时随父母到舟山普陀落户，外公是国画大师泮天寿。朱仁民自幼就欢喜作画，常趴在外公画桌上涂鸦，十岁时创作国画《奔马》，获舟山地区首届美展一等奖。

文革期中，家庭倍遭劫难，只有初中程度的朱仁民，被下放到海岛，从事代课、打铁、出渔、晒鲞、张网、做游泳池救生员等苦力谋生。后来进剧团当美工。十年文革时期，他风里来雨里去，踏遍了东海上凡有人居住的岛屿、画下了成千上万的海岛速写，他也因此谙熟大海之灵性，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这缘份给予他旺盛的生命力和战胜苦难的巨大力量。

十年浩劫结束，浙江画院成立，调他去杭州专业画家，他却却在制作巨幅作品时从高架上跌下腰椎折伤，瘫卧在床上五年有馀，他以坚强的意志、超人的毅力，趴在地上作画，作出了《在公海上团聚》、《嫦娥奔月》、《泮天寿画像》等名作，并创作了《阿狗青春日记》等十几部连环画作品，获中央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铜奖优秀奖等，同时借这个时机，还研读了诸子百家以及不少中、外艺术、哲学等著作，他还研习气功、医道。五年以后终于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接着，他拄着拐棍进入浙江美术学院，他重新分解、解释了自己的绘画思想、技巧，有机会阅览了许多世界各国艺术流派书籍，几十年积淀在心中的情感，如同涌泉般地喷射了出来，他在悟识到传统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深深地感到它的惰性与压迫，他在300×3公尺的宏幅宣纸上泼瀉、扫划，无法无度，也在寸尺中勾勒点染精湛神秀。

从浙江美院出来，他又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大海。1987—1989年，朱仁民的作品在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举办个人画展、讲学、示范，当地报刊称他为“中国画坛的怪才”、“东方具有极大潜力的画坛新星”，日本中国美术交流协会将他的作品在日本各地巡回展出，南朝鲜将他画海的作品，选入《亚洲现代水墨画精华》。同时，他的作品，获国内最高层次的第七届全国美展奖；第二届中国青年画展奖；全国首届风俗画展奖；日本、中国美术交流展出奖；全国首届中国艺术节、首届国际微型画展等奖，他的姓名和艺术介绍收入了《中国当代书画界名人录》、《中国美术家名录》、《中国美术家辞林》、《中国文艺年鉴》等大型辞书。

朱仁民现在是潘天寿纪念馆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浙江画院画师、南海普陀画会会长、奥地利应用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指画会理事等，文化部授予朱仁民为“中国民间绘画画乡优秀辅导员”、“全国儿童文化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中国《名人传记》1991年2月号老作家丁凡，以翔实的资料，细腻的笔触，长篇介绍朱仁民的画坛生涯和成长轨迹，1991年2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精装画册《朱仁民》，1992年浙江电视台拍摄介绍朱仁民的专题片《海魂》，浙江、上海、台湾、中央电视台以及美国

洛杉矶、新加坡等地电视台介绍朱仁民及其辅导的民间绘画群体。

1993年朱仁民在杭州、上海两地举办画展，受到绘画界同行的赞誉，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吴山明教授有一段评语：“大师家庭的熏陶，佛国梵音的感召，四十年天风海涛的浇注，以及他高度的悟性和勤奋，使他的作品显得格外地雄阔、神秘、精湛、独特。作为画家，我为朱仁民的成就而关注，作为朋友，我为朱仁民的精神而钦佩，作为老师，我对朱仁民的才华寄予很大的期望”。

朱仁民的文学作品《三更记录簿》，是记录着自己丰富的阅历及在文学、哲学和其他姐妹艺术中全面的修养、造诣和令人吃惊的自信和悟性。这些简洁的没有多余一字的生活记录，给人如同嚼橄榄般无穷的清香和回味，它把玄乎深邃的哲理悄悄地潜行在溢满鱼腥味的渔家俚俗语事之中，它介引我们悟识到：绘画和大海与人一样：“杀机和幸运并存，抗拒和依存相连，热爱和憎恨等量，苦恼和欢乐混杂，一股永远扯拉不开的生死恋”。（摘自三更记录簿）正是几十年跌宕腾挪，浪谷峰巅的生活，使他悟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才使他的艺术语言如此地感动人心。

（朱仁巴辑）

我的 小 传

● 朱泽枫



我于1936年出生于玉环坎门镇。小学毕业后，因父亲刚去世，不能继续升学。一九五二年，县城环山小学办起附中，我才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读了半年，附中停办，嗣后，参加县里的土整工作半年。后来又继续考入永嘉中学读完初中。一九五五年考入温州第二中学。在班级先后担任了学习委员、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因品学兼优，被学校推荐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家乡亲朋好友得悉后，都前来祝贺，全家人也给予大力支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直属中科院的一所新型综合性大学，郭沫若院长任校长。我为能进入这所高等学府学习而自豪，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暗下决心，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绝不能辜负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我要加倍努力来学习。学的是无线电系、电子技术专业。虽然当时选择该专业是出于自己的爱好，今天，我仍没有懊悔，而是更热爱本专业。

一九六三年夏季，当我们临近毕业，传来了一件令人振奋的喜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日理万机，还挤出时间，

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首都应届大学毕业生作报告，历时三个多小时，总理的谆谆教诲，时而激起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么亲切。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核工业部第十研究所（北京），从事核子仪器的研制和生产。这段期间，主要科研成果有：核辐射剂量仪器、地质矿山仪器，后处理核子仪器等多项科研成果。

一九六九年，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单位内迁至三线

——陕西省西安市，我仍从事军工产品的研制。这段期间的科研成果有：核放射性 α 、 β 、 γ 等各种系列的剂量仪器和卫生防疫系统仪器。平均每年有1—2项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均经部、局鉴定，并获科研成果二、三等奖。

一九七八年后，军工产品研制逐渐转向民用产品研制。此时，我接受了核工业部和公安部联合委托的科研任务——消防自动报警系统的研制。带领课题组，经历了五年的艰辛劳动，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放弃了多少节假日，攻克了一个个难关，于一九八三年通过国家级鉴定，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一致好评。为消防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产品银质奖、金龙奖，陕西省、核工业部、公安部的优秀产品奖等。该成果列入高层建筑消防产品中的优选产品。

该产品在全国各大城市得到广泛应用。如北京的北京饭店、长城饭店、广州的东风宾馆、杭州的望湖宾馆等；不仅在宾馆、饭店应用，还可广泛用于文物保护场所、图书馆、商场、仓库、机房等场合。

一九八〇年，我多次代表单位参加广州全国产品交易会，交易会期间，我们会见了许多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友人，如香港德仪洋行的梁世伟先生，就是原清华大学的老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进口商服务部主任卡罗琳·布雷姆小姐就常光顾我们的展台。

一九八一年，参加了北京国防消防技术交流会。会上，我们同澳大利亚的威武国际（澳洲）有限公司的李百利先生进行中澳两国消防工程方面广泛的技术交流。

一九八三年调来温州大学。在机电与电子工程系任系副主任，并先后兼任计算机中心主任、计算机教研室主任，一九八七年，已获得副教授和高级工程师两职称。除主管全系教学工作外，同时还讲授计算机硬软件课程，在校学报上也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和成都大学、金陵大学、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共同编著“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一书。



和汽车打交道的人

● 吕光泽

吕光泽，1933年11月出生于玉环县青马乡。1947年毕业于环山小学，1951年毕业于楚门中学后考入温州工业学校机械专业，1954年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在重工业部，国家“一·五”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抚顺三〇一工厂工作。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先后从事生产安全技术，总机械师室设计室等工作。1956年考入吉林工业大学（原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汽车内燃机专业，本科五年，专修俄语一年，于1962年毕业被分配到大庆油田汽修厂（新建）参与设备安装、工艺、工装、设计、技术标准制度制订等生产技术服务工作。1964年参与“大庆牌”越野客货两用小车研制成功；1965年主持组织设计汽车发动机轴瓦修制作业线专用设备及工装投入生产，解决当时配件奇缺并节约了大量材料费用，受到油田领导表扬。1966年参加石油部设备检查团，先后到大港油田、四川石油局、江汉油田等单位帮促设备整修和健全管理制度等工作。1969年10月调江汉油田，参加三线油田开发，在运输处先后组织两个汽车修保厂建设；70年代主要从事汽车运用和修理技术服务工作；1974年引进一批大型汽车和

特种车等石油钻井设备搬迁设备，在缺乏技术资料、配件情况下，自力更生，组织人员培训、设备使用、维修管理等方面建立了一套适合实际的制度，使设备完好率保持在90%以上，并及时将发现的制造质量问题，通过国家商检部门向外商索赔。1975年后又承担三个方面机械厂生产的进口汽车配件质量装试考核，在二年多中，先后为三个机械厂的约150种配件完成技术鉴定。为该厂修改图纸、改进工装、工艺，实现产品批量生产创造条件，并参加全国石油系统配件生产经验交流会。1978年晋升为工程师。

80年代初，参加中原油田开发会战，任濮阳石油勘探处运输大队主管工程师；1981年底调回江汉油田，负责筹建江汉油田运输汽车技工学校，并担任校长和教学工作。主持制订油田第一套汽车驾驶专业的各课教学大纲。1983年调任汽车大修厂主管全厂生产技术、产品开发、工厂技术改造建设等工作。先后完成新建厂房工程8项1万多平方米，调整工艺流程、增加工装、设备，使大修厂成为湖北省技术装备完善，生产工艺先进的少数几个汽修厂之一。同时主持组织制订六种汽车（吊车）的14种修理工艺规程、技术标准，作为江汉油田汽修行业标准。1988年以来，组织大修汽车质量创优，参加湖北省质量评审，先后获荆州地区、潜江市一等奖、省二等奖。1988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90年经省和石油部检查评审，分别获湖北省汽修企业基础技术工作第一名和石油部一级汽车修理企业。此外组织开发研制SC-Ⅱ型V形窄带双鼓胶带成型机成功，通过定型技术鉴定，获江汉石油管理局89年度科技进步四等奖。该机为我国三角胶带更新换代提供先进设备，一年可创产值300万元以上，先后为开

封、绍兴橡胶厂、大庆、河南、江汉等油田提供设备，使该厂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1986年以来，组织“金属胡极高堆积镍刷镀技术”应用研究取得成功，参加91年全国发明展览会获发明银质奖。除解决了汽车修理中基础零件、大件修复、降低成本、缩短修理周期外，并先后将该技术转让给锦西化工厂、本溪钢铁公司、清华大学某研究单位；1991年石油部确定为在全国石油系统推广的新工艺新技术项目之一。受委为全国十六个油气田举办两期应用学班。先后共取得技术转让费近20万元。

1989年以来，受湖北省荆州地区委托，主持举办两期“汽车修理质量检验员培训班”培训省级质检员110名，还为潜江市培训一批汽修工，多次受到地区和省有关业务部门表扬。

1992年底调任江汉油田运输凯达经济技术开发公司高级工程师，负责由俄罗斯进口的一批大型工程机械设备组装调试、人员培训、投产使用及对外承揽土石方工程施工任务，目前参加京九铁路麻城站段土石方机械化施工建设。为按质如期建成京九铁路而努力，同时为本单位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本刊辑)



病理学家教授

- 李义清 -

李义清，上海铁道医学院病理学教授、肿瘤病理学家。1925年12月生于浙江省温岭县坞根乡，三岁随父母迁居玉环县楚门镇。曾就读于楚门小学、任望学社、黄岩县中、温岭县中。1951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六年制医本科。曾任三医大外科军医、助教，湖南军区医院外科医师，第15军医学校教师，天津市总医院外科住院总医师，北京铁路总医院外科主治医师、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外科学会理事。1957年进修病理学于北京医学院，而后历任北京铁道医学院、上海铁道医学院及宁夏医学院病理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教研室主任、上海铁道医学院医学科学研究所副主任、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宁夏自治区病理学会会长、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现任上海铁道医学院医科所肿瘤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及上海市科技成果评审专家、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癌症基金会铁路分会副理事长，《当代世界医学》、《肿瘤临床》、《上海铁道医学院学报》编委，《铁道医学》专家审稿组成员。

李义清教授从事医学教育40余年，1958年筹建北京铁道医学院以后曾同时负责教务工作，在病理学教学上总结了

“诱、读、讲、练、用”的五步教学法，并提出《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学生的智能培养》和《有关第二课堂的设置》等教学论文。由于在教学上呕心沥血，效果突出，而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记二等功及大功各一次。近十几年来，致力于胃癌的病理学研究，对胃癌的组织类型、癌前病变、生物学特性、预后预测等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后则确定以“微小胃癌”为中心课题，对微小胃癌的形态特征、组织发生、形态发生、发展规律、肿瘤标志、DNA定量、微量原素测定、激光检测、立体显微镜及电镜观察等等作了深入的探索，全国胃癌研究会推定为全国微小胃癌协作研究的牵头人。1983年以来，相继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三次全国微小胃癌协作研究会议和多次参加国际交流，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长宁区中心医院联合举办了七期全国微小胃癌诊断技术训练班。1983年开始在院内筹建医学科学研究所，成立肿瘤研究室。最近几年则为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胃粘膜的损害与抗损害在胃癌发病学上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成果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中央及上海电视台和全国二十多份报刊报道了这一成果。另外与上海市消化病研究所合作的重点项目《提高胃癌的诊断和综合防治水平的研究》已获1993年科技进步二等奖。李义清教授虽已高龄，而仍马不停蹄，现正在进行“早期胃癌氮分子激光的内窥镜诊断”、“胃粘膜保护与防癌”、“癌前病变的表现类型与逆转可能性”以及“胃癌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等课题。在已完成的项目中发表论文50余篇，获得上海市及铁道部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院级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1991年铁道部授予《火车头》劳动奖章；

1992年，因有突出贡献，国务院颁发证书，给予政府特殊津贴。姓名及事迹已收录于《中国现代教授大辞典》、《中国当代自然科学人物传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词典》。

（本刊辑）



为了全军战士的健康

——记陈必松副主任医师

陈必松，男，1943年10月出生于玉环县坎门镇，文化程度大专，中共党员，现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防疫队军队卫生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他从事军事医学研究和卫生防疫工作了30个年头，刻苦钻研业务技术，专业理论扎实，现为南京军区第七届医学委员会委员，军队卫生专业组副组长。中华预防医学江苏分会卫生检验学会和环境卫生学会委员。作为课题负责人，先后组织军区部队营区水源卫生状况调查和食品卫生调查等课题，得到军内外专家较高评价（食品卫生调查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曾多次担任全军和军区卫生骨干训练班教学，精通“二管五改”技术，有较强实际工作经验，在全军同行中享有较高知名度。他设计的“生进熟出一条龙伙房”，布局合理，卫生科学，被全军爱卫会采用，并在全军部队推广，受到总部首长和同行专家的好评，对加速部队生活卫生设施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为军区部队卫生防疫工作上台阶和保障官兵健康作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个人组织研究的《81型移动式给水净化器》、《军区部队水源水质状况调查》、《生进熟出一条龙伙房》

等课题先后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三项、四等奖一项。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编22万字的《食品及环境卫生检验手册》一书（1992年10月由人民军区出版社出版）。由于贯彻《六五》《七五》全军除害灭病规划成绩显著，1987年1991年先后二次被评为全军除害灭病先进个人，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通令嘉奖。1991年被评为南京军区优秀中青年科技干部。荣立三等功一次，受上级党委嘉奖多次。其主要事迹载入1992年南京卫生年鉴。

（本刊辑）



向世界先进水平冲击的人

记化工部第一胶片厂高级工程师陈必源

1988年年初,《经济日报》报道了一条消息:化工部第一胶片厂研制的音乐级AD、AR高档盒式录音磁带和AD级高速复录带通过部级鉴定。这一成果结束了我国只能生产低档盒式录音磁带的历史,标志着我国盒式录音磁带已跨入国际先进行列。

在此之前,送到日本、西德测试的音乐AD级盒式录音磁带已引起这些技术先进国家有关人士的震惊。日本著名音响评论家石田善之亲自在评价书上写道:“将三盒中国磁带(乐凯AD)和认为与之同水平的TDK-AD、马克塞尔的UD-1、索尼HFX等,就音质和电声特性进行了比较。结论是甲乙难分上下。日本磁带在世界上得到很高的评价,中国产磁带也具有与之难以区分的高水平。甚感吃惊”。

“关于音质上的不同,各厂家有各自的特色。中国磁带表现力丰富,代表立体声效果的定位感和音色感已达到很高的稳定性、高频音响效果饱满”。

以上成果,无不渗透着化工部第一胶片厂磁带研究室高级工程师陈必源的汗水与心血。

由于贡献突出,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标兵和劳动模范,1987年到1989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保定市劳动模范,

1988年被评为全国“讲比”竞赛活动先进个人。

他被国内外专家誉为敢于向世界先进水平冲击的人。

百折不挠 艰苦创业 勇攀高峰

陈必源1945年出生于玉环县坎门镇,是一个中专毕业生。他硬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刻苦钻研,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

那年他身患脉管炎,住院两个月,竟然在医院病床上攻下了一门外语。他就是这样以顽强的毅力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 with 科研技能。

我国磁记录材料工业起步晚,基础薄,技术落后。但这并未使陈必源这样的有着强烈事业心、责任心的中国知识分子自暴自弃。陈必源认为,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探索和技术积累,我们有向世界先进水平冲击的能力,关键看我们敢不敢,有没有雄心壮志。

几年来,在陈必源同志的带领和鼓舞下,磁带研究室的同志在向世界先进水平冲击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然而,这成绩不是一帆风顺得来的,是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一次又一次失败后才取得的。

在研制AD级高档盒式录音磁带时,磁浆的高分散是一个技术关键,原材料在砂磨机中出现不可逆聚胶现象,反复试验始终不能解决。大家都有些灰心丧气,陈必源却没有在失败面前低头,他鼓励大家要经得起失败。他说:“经得起失败的考验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必备的品德。”在他的精心组织下,对物料特点逐一进行定性分析,对设备逐一进行检查分析,终于制定出更为合理的工艺条件,制成了合格的磁浆。

谈起艰苦的科研工作，陈必源总是淡淡地说：“很多技术问题的解决，常常就象捅破一层窗户纸，一旦捅破了，就一目了然，不觉难了”。

然而，为了“捅破这一层窗户纸”又需要他付出多少艰辛的努力！在攻关的日子里，他早来晚走，以厂为家，废寝忘食成为家常便饭。他妻子知道他为了事业，担当了大部分家务，成为他事业上的贤内助。陈必源的这种忘我劳动、顽强拼搏精神，也感染和鼓励着与他共事的同志们。

新产品的研制成功通过鉴定，并未使陈必源感到满足。他认为，作为科研工作者，研制的新产品不能推上大生产投入市场，只是样品是毫无意义的。

他迎着困难上，决心将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尽快结束依赖进口的局面。中国科协和国家计委号召全国科技人员开展“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更激发了陈必源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的热情。在1988年的“讲比”竞赛活动中，他把AD级高档盒式录音磁带和高速复录带推向大生产做为参赛项目，带领大家开始了新的攀登。

一种新产品，从实验室过渡到大生产，成为合格产品投放到市场，确实需要艰辛的努力。实验室的条件与车间有很大差别，而车间现有的设备条件也与做出高档录音带的要求相差很远，他们必须从生产合格产品出发，制定合理的工艺条件。陈必源在主持新产品投入生产的过程中，首先抓了磁浆工艺这个关键。他仔细研究了设备的现状，根据AD级盒式录音磁带和高速复录带磁浆的特殊性，决定采取分批连续补加物料的方法，来满足高分散的工艺要求，为了确保试车一

次成功，他发动群众，自制设备，进行模拟实验，根据模拟实验的经验和工艺参数，证明自制的连续补加物料的装置切实可行，能满足工艺要求，在车间的配合下，陈必源一方面与科研人员一起进一步调整工艺参数，加强工艺控制，将补加物料的次序、时间和速度调到最佳水平；另一方面，协助车间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和岗位练兵，进行技术交底。通过一系列措施，在工人的认真操作下，终于生产出高填充度，高分散性的磁浆。为了使涂磁达到设计性能的要求，陈必源又提出了将磁浆调整到最佳精度和最佳涂层厚度的方案。当时，陈必源患有静脉炎疾病，不能过度劳累，但当新产品试车时，他有时连续工作30多小时，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终于做到试车一次成功，涂出了合格的AD高档盒式带和AD高速复录磁带。

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大受欢迎，有的唱片公司表示，这样的产品有多少要多少。更令人可喜的是，用AD级高速复录带分装成的盒式带，1988年和1989年，连续出口罗马尼亚，创经济效益200万美元。陈必源终于实现了让乐凯磁带产品打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夙愿，为祖国争了光，为企业增加了经济效益。

陈必源在成绩面前没有停步，1989年，他又把进一步提高AD级高速复录带质量，降低磁浆消耗10%的目标做为参加“讲比”竞赛活动的项目，他同课题组的同志们深入生产现场，集思广益，在取得大量数据的基础上，降低了涂层厚度，采取了提高磁浆质量等一系列措施，成功地达到了预期目标。仅此一项增收节资50余万元。

1989年一季度，AD级高速复录带生产突然出现挫折，产品

质量不达标，磁浆几批投料成品率仅7%。陈必源急生产之所急，主动组织技术人员到生产第一线，分头把关调查，对搜集到的大量数据进行讨论研究，从而找出发生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检修时加大了行星搅拌器的缝隙，使搅拌力减小，从而影响了质量。陈必源经过认真观察分析，提出了提高予分散效果，严格控制粘合剂含固量和磁浆制备温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实施后，AD带优级品成品率迅速回升到81.6%，而磁粉消耗下降，与过去相比，每批磁浆可多生产宽幅磁带一轴以上，增加收入5000元以上，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着眼未来 培育新人 走向世界

解决我国科研人员“断层”问题已迫在眉睫。陈必源同志不仅自己奋力拼搏，有所成就，还十分注重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他常说：“民族磁记录材料的发展靠几个人不行，靠一代人也不行，需要有一批思想技术过硬的科技人员长期奋斗拼搏才能实现。现在我们科技战线上的同志，大多已50岁左右了，没有年青人接上班是不行的，与其以后着急，不如现在抓紧培养年青人。”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第一胶片厂磁研室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开发出能与世界名牌媲美的产品，使我们国磁带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是与陈必源同志的“着眼未来、培育新人，走向世界的战略思想分不开的。

陈必源把培养年青科技人员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他一手抓科研成果，一手抓人才的培养。而对青年人的培养，他是思想、技术、作风一起抓，把树立坚定的政治方

向，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在首位。他在百忙中抽时间亲自给青年科技人员上思想教育课，以自己切身经历和本厂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对年青科技人员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培养他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在工作中，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做到。磁带科研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常和甲苯、环乙酮、炭黑等打交道，又脏又臭又有毒，身上常弄得黑一块、红一块。又常深入车间，工作很累，年青同志刚开始不习惯，气味熏得吃不下饭。但他们看到陈必源同志虽是领导，又是年近半百的高工，越是艰苦、累、脏的事，越是抢着干，越是干在前面时，年青同志深受感动，他们也以陈必源为榜样，自觉地磨炼自己。

人们都知道陈必源技术全面，但一点也不保守，他对年青同志技术上更是手把手地教，帮助他们掌握试验方法，帮助他们分析问题。当年青同志有了一定基础后，他就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让他们承担一些课题，“逼”他们钻研技术，在克服困难中成长起来。陈必源注意根据年青人不同特点，有意识地从不同方面锻炼他们。比如，搞一段时间科研，他就安排一些年青大学生到车间锻炼熟悉工艺设备，这样再搞科研就会考虑生产的特点，为以后科研成果尽快推向大生产打下基础。面对一些动手能力强、实践多的青年人，他则强调要学好基础理论，打下深厚理论基础。他的这些良苦用心，激励年青同志更加努力工作学习。

陈必源认为：经得起失败的考验是科技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所以他特别强调要有严谨细致和坚韧不拔的作风，对年

青科技工作者要求严格，对他们工作作风上的缺点，常毫不留情地批评指出，面对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又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

在陈必源同志的精心培养下，一支可以托付未来的重要力量形成了。

如今，这个研究室新产品开发研究项目有半数以上由青年科技人员承担。他们都已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原籍浙江的大学生王德胜，开始不安心在保定工作。陈必源从思想、技术、生活上帮助他，让他了解国内外磁记录材料发展现状。引导他在砂磨工艺的研究和应用上下功夫，陈必源强烈的事业心以及做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品质深深地感染教育了这个年青人。他开始热爱磁带事业，刻苦钻研实践，使磁浆分散由球磨过渡到砂磨，在新产品开发和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王德胜担任402录音带性能改进和高速复录母带专题组组长，他的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进展，1989年他被评为保定市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面对成绩，他总是说：“应该感谢陈主任，他为我们年青人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

陈必源同志培养青年人才的又一特点是根据年青人不同的特点、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因材施教，使他们能够全面地掌握磁带科研、生产工艺。为加强研究室涂布和工艺技术力量，更好地配合磁浆配方的研究应用。同时又为了加强车间磁浆制备这个主要岗位的工艺管理，他提出将车间的陈大为同志调研究室，研究室的李文庶调磁浆工段。结果，使两位同志得到了不同的锻炼，丰富了各自的知识，把生产与科研紧密结合起来，做到科研指导生产、生产为科研创造条件，

提高了产品开发和工艺管理能力。

陈必源同志培育年青人的第三个特点是敢于给年青人压担子。如在研究室举办科研成果评审会，按常规应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作报告，陈必源却把任务交给了青年科技人员王学虎。王学虎不负众望，拿出了水平很高的评审报告。

此外，还有锁亚强等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他们都肩挑重担，担当着课题组长的职务。他们成为本厂同年进厂的大学生中的佼佼者。

陈必源同志胸中装着大目标——这就是发展民族磁记录材料，超世界先进水平。他常告诫周围的同志：“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的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很多磁带产品国内还是空白，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奋进，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陈必源同志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同研究室的同事们一道发展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S-VHS高级录相带、磁卡、90mm高密度软磁盘等。这些新产品的开发成功将使我国磁记录材料工业登上一个新台阶。

他是一个真正的敢于向世界先进水平冲击的人。

我们祝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化工部第一胶片厂科协 1990年10月



与恶疾抗争的人

记寓言作家陈必铮

许多人往往以为成功者是时运的宠儿。其实，他们的路途无一不是风平浪静的。温岭县政协委员陈必铮，从一个医务工作者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在与疾病的抗争中不畏艰难地隔“行”爬“山”，成为一名寓言作家，就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陈必铮1937年出生于玉环县坎门镇一个医生家庭，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初中毕业就考入温州卫生学校，工作不久又被选送去温州医学院“西医学习中医班”进修。结业后，为了闯进中西医结合的医学秘宫，他不顾体弱多病，刻苦钻研，辛劳治病。正当他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1978年的一场灾难突然降临。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接着又患上严重糖尿病，空腹血糖高达600毫克，一日大饮大溺竟达数十次。一个正当盛年的男子汉却瘦成仅30多公斤重的小老头，每天靠注射胰岛素来维持生命，他一下子濒临了绝境。

老陈躺在床上，心潮翻滚，心痛如绞，眼看十多年为之奋斗的事业即将付之东流，身体条件不允许重操旧业，今后能干些什么呢？他两眼泪如泉涌，双手重重地敲打床沿，他是多么伤心，又多么不甘心哪！

这期间，组织上给了他多方面的关怀和帮助，亲友和周围同志也热情地安慰他，鼓励他勇敢地站起来，这些，给老陈拨亮了心灵之火。他想：人生何处无险岩，自己的身体虽然垮了，但脑子还健在，思维的闸门是永远无法关闭的。只要勤奋努力，人生的意义也许更体现在无望的希望之中。就这样，他拿起笔来写寓言。

可是，创作的道路也并不平坦。原以为寓言短小，写起来并不费力，没想到要真正做到“以小见大”，很不容易。尽管他写了不少作品投寄报刊，却大多被退了回来，他这才悟知创作的艰难。

他为自己立下了一条座右铭：“恭恭敬敬学习，老老实实创作。他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寓言名作，从中吸取营养，提高自身的文学素质。他勤奋捕捉“生活胚胎”和“知识胚胎”，做着各种笔记，为创作提供生活沃土。他还要与恶疾抗争，克服写作过程中的疾病障碍。

老陈患的是脆性糖尿病，血糖起伏极不稳定，每次低血糖一出现，思路就突然中断，创作的激情也随之消失，过后又往往难以追忆。对此，他并不灰心，十多年来，星星点点写了感触笔记达30余册。在创作《喜鹊记者》这篇科学寓言中，他查阅了十几家省级科技报刊和有关书籍，与自己所要揭示的形象一一作了比较，先后七易其稿，稿子寄出不久就被发表，而他所付出的努力却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时间。在针砭拜金主义的寓言中，他也曾写过几篇不同取喻的稿子，但都觉得老化陈旧而推倒重来。最后，居然去翻阅物理课本，发现磁性不为黄金所动。老陈喜出望外，以此设譬立喻，既有知识性，又有新鲜感，初稿写了近千字，经反复修改，改

成了连题目、标点在内仅109字的“微型寓言”。

他就是这样精益求精，聚沙成塔，一点一滴地把自己对生活、对人生、对知识的感悟，制作成精神产品奉献给读者。他说，是勤奋给了他“智慧”的钥匙，是知识赋予他“才能”的拐棍，把他带进新的创作领域，去造就自己的新东西。

那时，老陈的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爱人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两个孩子又无居民户口，全靠买私粮过日子。全家四口挤在14平方米的斗室里，靠他每月43元工资收入糊口。在这种贫病交迫的困境下，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老陈精神有了依托；奋斗有了目标，他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有一天，将近黎明之际，老陈突然发生了深度低血糖，爱人发觉他全身流汗，四肢抽搐，紧咬牙关不停地吐出白沫，慌忙撬开他的嘴巴灌糖水。苏醒过来后，他爱人说：“你年纪也大了，身体又不好，别再累死累活写东西了，还是保养身体要紧。”爱人的好意他难以接受，更不能不写，搞创作是他这辈子最后的一次选择，哪怕拼上老命，他也无怨无悔。十多年来，无论严冬还是酷暑，他几乎每天都是四点钟左右就起床，写作、学习从不懈怠。为了防止低血糖出现后造成思路紊乱，他还一直坚持着不吃早餐。他说，这是为了适应工作和写作的需要，我甘受终生之苦。

1984年盛夏，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邀请他去长春参加全国首届寓言文学学术研讨会。路途遥远，家属和单位同志都很担心，但他坚持要去，带上冰瓶、胰岛素和注射器，一身北上长春。列车快到山海关时，因前方出了故障，在秦皇岛附近停靠6个多小时。此时他已坐了整整一天二夜的硬

座，双腿肿到膝盖，喉咙干渴得像着火，四旁无一熟人，力不能及的老陈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为了不致在列车上出事，他除了饮水，什么东西都不吃，硬是苦捱苦撑着到达了目的地。

老陈就是这样在与恶疾的抗争中，靠坚韧专注，靠乐观自信，靠不懈的努力，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开垦出一方表现自己生命潜力的园地。现在，他成为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并加入省作家协会，已发表寓言作品300多篇，正式出版寓言专集2部，《中外寓言鉴赏辞典》收进了他的作品，《中国科学寓言十家》把他列为一家。他的寓言被选入40多种选集，寓言集《真理的父亲》获得了“台州地区首届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优秀奖，还两度被评为县级先进生产工作者。1989年县委、县政府授予他“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994年他再度被授予“温岭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陈必铮同志在总结自己这段经历时说：“不幸使我睁大了眼睛，不幸又激发我学习怎样去做人，在不幸的遭遇中，我磨炼着自己，也塑造着自己。”他决心一步一个脚印继续向前走去，老老实实作文，堂堂正正做人，在编织寓言之网的同时，努力编织好自己。

摘自《政协委员风采》作者李光云



我的经历和点滴体会

● 肖秋生

我于三十年代中出生在楚门东门，初入东方小学，毕业于楚门镇中心小学。在我上初中的那年，迎来了家乡的解放。我是顽皮出名的学生，给小学和初中的老师带来很多的麻烦，并为我操了不少的心。但解放初期的那种正气凛然、朝气蓬勃的气象，一直引导我向好的方向发展。对于党的号召，在各项运动中我还都能积极的投入。那时，我曾被评为楚门区的捉蝗虫模范，还和徐君义同学在渡头枪林弹雨中抬过解放军的伤员。后因母病，我是家里的老大，休学了一段时间，在家帮助料理店务。母体康复后，经南门村村长介绍参加楚门区的土整工作。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过去只知道顽皮的我，开始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知道只有学好本领才谈得上为人民服务。我就带着这种强烈的学习愿望，继续就读玉环县中初中五册。上课开始专心致志的听讲，成绩大幅度的上升，过去成绩一直全班靠后的我，初中毕业时上升到全班约第8名。1952年考入温州市立中学念高中，这时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时期，超美超英，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雄心大志，激励我奋发学习，同时同学之间

展开的学习竞赛及积极争取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强烈愿望，更促进了自己的学习积极性。那时，一星期一般只有星期六晚上休息一下，有时也到东南戏院看场越剧或到大众解放电影院看场电影，星期天一大清早就背着书包到海坛山上看书去了，一看就是一天。在高中的三年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进入全班的第二、三名。1954年由同乡同学邓孙禄介绍，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5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在大学期间政治运动较多，自己又当了班主任，在学习时间上，没有中学时期那样多，尽管自己在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上还算合理，在大学期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同济大学学报上发表过论文，在南宁机场实习时被评为青年突击手(在技术革新中，设计制造出高效率的龙门式吊车)，毕业时也被评为优秀生，但自己总觉得还可以学得更好些，而没有作到，有时也感到有些惋惜。

我毕业后的经历是这样：1960年被分配到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教研室任教，1962年又调到北京工业大学道桥教研室任教，1981年到1983年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进修交通工程、交通规划，1983年回国后直至目前都在北京工业大学交通工程教研室任教。现任该教研室主任，并兼任全国公路、桥梁与交通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常委，当代科技重要著作丛书（交通工程单元）评委，中国科协城市交通专家组成员等职。长期致力于道路交通工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对城市交通规划进行了系统研究。这几年，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发表在全国一级学报上。专著和译著8部，其中主编的《城市交通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原理》两部为全国统编教材，都为交通工程专业

的必修课。在城市交通规划方面的成果有4项获奖,其中《北京市城市交通综合体系规划研究》和《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模式研究》两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包括北京科委、建设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各一项)。特别在货物流通中心规划和城市客运枢纽规划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结合我国实际,创立了货物流通中心和客运枢纽的选址模型,并开发了选址的通用程序。尤其在人机对话方面有新的突破,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好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带来了新的面貌、新的生机,特别在上月的欧美同学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主席对大家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将不断地激励我们海内外学子更加奋发图强来建设我们美丽的家园。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的确感慨万千。自己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新社会的环境下不断地成长,最后也能为社会作一些微薄的贡献。这当中组织、老师和家长都有其重要的作用。家乡的老师中,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钱启敏、张春莲和戴汉节老师了,他们在我心目中是那么的善良,是那么的认真负责,他们是我幼小心灵中的真善美,也是我以后做人的楷模。人生应该有一奋斗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劲头就会大不一样,再是我认为人的智力一般都差不了多少,很聪明或很笨的人都属少数,因而后天的勤奋就成为一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了。此外,我还有以下几点亲身体会:

其一,持之以恒,即成功在于坚持。在学习外语和锻炼身体中,自己深有体会。学习外语是不能间断的,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文革期间,我就结合学习《毛主席语录》经常坚

持着。我那时手头就有中文、英文、俄文、日文和德文五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这些外语工具,不但在我科研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且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很快的适应了前进的步伐,我就是第一批考入北京语言中心(中美合作),较早出国深造的,锻炼身体也如此,我在中学时是特别爱好运动的。以后就不怎么锻炼了,在生过一场大病后,吸取了教训,我就一直坚持锻炼到现在,身体一直不错,目前我还是北工大老年教工篮球队的队员,还和国家女子二队交过锋,很受上面的重视。

其二,和气致祥,即和气容易成事。自懂事起,我和同学以致后来和同事的关系一直不错,不论本单位或外单位的同行都愿意和我合作,其中主要一个原因,听说是“老肖人缘好”。就是在文革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的程度,两派的人和我还都能讲得上话,因而我这个“泥瓦匠”在以后的大团结中,曾起过别人起不了的作用。我总认为人民群众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现在从国际范围来看,特别需要炎黄子孙们的团结,这将是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其三,机不可失,即机遇不能放过。我是报考同济大学铁路专业的,可入学后组织则把我分配在道路专业,当我道路专业毕业时,组织又把我分配到清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当然这是组织的一种信任,因为清华计划要创办“工程规划专门化”,要在全中国选人到苏联进修,虽然以后由于与苏联关系紧张而告吹,但我还是不失时机地学习和掌握了城市规划原理。接着专业归口我又被调到北京工业大学道桥教研室。这些属于不同学科的课程,当我在国外进修时则都被

时候，被徐立普老师见到，他大大地鼓励与赞扬了我一下，这就更激发了我学习数理化的信心。老师的一次小小表扬，往往使学生进步的开始，而过多的批评却往往使学生失去信心！而我立志要成为一个工程师，也是初中时与偶然听到一位老师的评论有关。这位老师在与一些学生漫谈时，他说：“你们这一年级的同学，我看没有一个将来能成为科学家的”，当时我路过听到后，也没有当一回事，可是后来我越想我感到不是味！不是说聪明在于积累吗？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他最聪明也是个智力不全的孩子！也许老师批评我们不努力吧！那时我们正处于初中毕业的前夕，我又是春季班，属于提前半年毕业的学生，究竟选择中专呢？还是上普通高中？大家都心内在斗争着，开始我是想考中专的，想做一个技术工人或技术员。我的哥哥肖秋生对我说：“你不想当工程师吗？”当时我把工程师与科学家是等同起来的。是呀，我要当一名工程师。就这样，我考上了省立温州中学。

温中，是一个学习氛围很浓厚的中学。人们都说“温州人头发空心的”，说明温州人是很聪明折。所以我很注意观察他们聪明之处，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聪明之处，也就是说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有些人接受外文很快，但其它功课却平平；有些人文科很好，而数理化却平平，也就是说人们对各自的知识积累是各不相同的，聪明虽有天生的一份，但更主要的在于知识的积累。之所以说温州人聪明，实际上应该说温州人是很努力进取的人。温州人之所以聪明也与他们在现代工业科学上所接受的知识远高于来自农村的孩子，是由于他们早已接触到了而我们甚至汽车也只是在电影上见到，轮船、火车更没有见过！所以我相

信，自己的努力去积累知识，就会填补我们人份的不足。在社会上绝顶聪明的人是不多的，把科学上有成就都看成绝顶聪明人作出的，也不全是如此，没有后天的努力与积累，“聪明”也会消失的。所以“笨鸟先飞”，确实有其深刻的道理。在温中三年的学习，我已经感到，我的学习成绩已经跨到班级的前几名了！

1956年我考入了大连工学院。高中时，我还是个顽皮的孩子，还打过架呢！但到毕业前夕我似乎改变了原有的性格，并且加入了共青团。而一进大学，我就被任命于129班的班长。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并且是刚入团不久的团员！我想大概是搞错了，到系办公室一打听真是我的时候，我真有点不知所措。系中对我说，当班干部社会工作较多，你的高考成绩较好，又是被评过优秀团员，所以你干吧！

我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却想出了一个办法，来个全班登记。结果发现班中的同学，有当过学生会主席、团委委员、支部书记、班长和组织委员的！我就把这些同学推举为我们班的班干部，从他们那里学习工作经验。同时也更激起我学习的雄心。当班长，就得各方面起带头作用，首先在学习上要走在前面。这样我就把中午休息的时间利用起来。后来我发现中午也是我学习效率最高的时间。因为那时全校寂静，教室内几乎没有人，因此我的作业几乎都在中午就完成了，晚上在资料室可以获得更丰富的知识。我不但作完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并且逐个做完老师指定参考书中的所有习题，而最主要的是课堂中精力高度集中听讲！

我是学习工科的，但对机械制造知识却很贫乏，因此工厂实习中，我也是全身心地投入，虚心地向师傅学习，努力工作。我很羡慕那些肯动脑筋的同学。在工厂劳动中，他们就能搞革新，制造自己设计的工具，我也决心不落后于他们，我尽力提高自己的技能，并采用高速切削，一次列宁格勒共青团代表来实习工厂参观，当看到我高速切削，并知道我是个实习大学生时，他举起了大拇指，来个*xopamo*（好的）工厂实习中我还被评为优秀工作者！

五年的大学生活，我几乎均担任班长或团支部书记。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论文获得优秀！

1961年9月份，我踏上了工作岗位，是为海军服务的军工厂。由于大学工厂实习中积累了点知识，因此进入工厂我就能较好地胜任工作，但我知道，与老技术人员相比，差距很大，我决心缩短差距。我从没有不懂装懂，也虚心求教，不但向老同志学习，也向工人师傅学习，同时也在工作中把我所知道的尽力向工人师傅介绍，因此，较快地熔溶到工人之中。

当我被分配到研制导弹快艇主机的时候，除了星期六晚上与星期天外，我几乎白天黑夜都在工作学习。虽然当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肚子空空的，但为了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技术人员，我不放弃任何获得知识的机会。那时，也正是美国兵舰不断侵犯我国领海，我国政府不断发出警告的时期，我们是多么希望我们的主机尽快装备到导弹快艇上去，多么希望大批量的导弹快艇提供给我们的海军！我还是个没有经验的技术员，组长要我填写一份主轴承的技术任务书！我知道，这份技术任务书要填出来，必须作动力计算，像这

新型的发动机，在学校中没有学过，工厂中也没有人作过，但我决心把它计算出来。我寻找了各种参考资料，编排了计算程序！有一个晚上，去苏联实习一年的设计科副科长，发现我主动作这种复杂的计算时，就把他在苏联的实习笔记及聂意曼教授编写的动力学给了我，我真是太高兴了！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晚上，我把整个力系全部计算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上海交大李教授带领研究生也正在作此工作！他们工作结束后，并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论文，我真羡慕他们，善于总结。但文章中我发现，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这种计算，现在较完善了，若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在程序编排好后，大概只要十几分钟就能计算出来了。科学是不断地在进步的，但我也深深感到，后人的成就，都是踩着前人的背脊上去的，即使最聪明的人，没有前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新的发明，发现都是不大可能的。另外我也看到，那些经常以为自己高明的人，指责别人的错误缺点，挑剔别人完成的工作是极其简单的，似乎他事先都已经掌握了的人，往往是最不愿意干实事的人，也是不敢去攻占科学难题的人。而敢于去碰的人是常会被人讥笑，而成功后也常被贬之一钱不值。是的，科学是一张薄纸，捅开以后，似乎很简单，但没有戳穿前，人们都在摸索，也往往碰得头破血流。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现在一个中学生都知道这个定律，但在这以前又谁知道呢？在工厂实际工作中也一样，任何小的发明与改进，都是倾注着工作者日夜辛勤的心血，在艰苦的工作中取得的，不是聪明人一想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实践与知识的积累，只有勤劳的人，不怕艰苦的人才会取得卓越的成就！智力不高的人，付出劳动更大些而已！智力不高的人，就要先飞。因

为我知道我的智力只能算中等，但在工厂很长的岁月中，我都担任了较重要的研制工作，并且也获得过科学成果奖和技术进步奖，并从一个小技术员，第一批被提为工程师，随后提为高级工程师与研究员级高工，也担任过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职务！实际上智力在我之上的大有人在，我认为主要的是我大概比他们更努力些，更接触实际些，因此这些重要的工作落在我的头上。而实际上，我接受新事物，总是比别人慢些，并且反映也迟钝些，所以有时辩论时，往往是被攻对象。但为什么大家又都推荐我，包括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唯一的，我想，我能实实在在地干工作，实实在在地向一切比我高明的人请教，也实实在在地毫无保留地向别人介绍工作的关键点，而最主要的是大概我总看到别人的优点多而忘却别人的缺点与对我的讥笑，也愿学习他们的长处！来提高自己的水平。

总之，笨鸟要先飞，首先不要自卑！

肖惊生简历：

- 1951.1 楚门小学毕业
1951.1—1953.7 玉环县中（楚门中学）上学
1953.7—1956.7 省立温中上学（温州市第一中学）
1956.7—1961.7 大连工学院上学（大连理工大学）
1961.9—1971.7 407厂技术员、设计组长
1971.7—1993.3 405厂技术员、设计组长、设计科副科长、科长、副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总工程师）
1993.3—1994.4 舟山市船舶工业总公司 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1994.5—至今 中国精通拆船洗船有限公司 董事、总工程师
（中精公司是由中国拆船总公司、浙江省拆船公司、舟山市船舶工业总公司组成的有限公司，公司经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1994.5.18日揭牌）

- 1978年 任命为工程师，1980年发工程师证书
1988年初 评为高级工程师
1989年12月 评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1992年10月 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每月100元特殊津贴

—编者—

冶金化学战线上的排头兵

- 苏维福 -



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国防科工委曾为云南四矿送去了一面鲜艳夺目的大红锦旗，对云南四矿全体同志，特别对勘探、发现、研制、提炼原子弹主要原料代号17——锺铤作出卓有成效贡献的玉环籍科学工作者苏维福等全体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

苏维福，男，1936年出生在玉环县楚门镇一个小贩家庭。自幼好学，1952年被玉环中学（现楚门中学）保送入杭州化工学校（现浙江工学院），1955年毕业后，响应祖国“进军大西北，开发大西南”的号召，深入“不毛之地”——滇东南的深山老林，立志开发地下宝藏，决心改变我国尖端科技原料空白的面貌，至今达38年之久。现任云南省会泽铅锌矿技术监督处处长、冶金分析高级工程师。

五十年代初期，国家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对矿藏资源的开发，有着更高的要求。可是，当时的我国，遭帝国主义的经济“禁运”和国际反动势力的全面封锁，一切都要靠自己。苏维福凭着为国争光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顽强拼搏的无畏精神，在“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大西南，风餐露宿，长期战斗在人烟稀少的荒山秃岭之中，为探求深奥莫测的地下宝藏，默默地无私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

在条件十分简陋的实验室中，冒着随时都有爆炸、人亡的危险，经过上百次的失败，终于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提炼出我国第一克实验室“锺”金属粉，填补了我国的空白，向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

消息传至北京，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并命该矿立即着手开发，全国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通力协作，大力支援。一时整个矿山沸腾起来了。各路建设大军和科技工作者纷至沓来；各种仪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至矿区，一个大型的采、选、冶、综合加工的工厂诞生了。苏维福敬业、爱业，三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矿山资源开发区上。三十多年来，为国家提供了累计达二百多吨高质量的代号17的锺铤，为我国的国防建设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他用辛勤的汗水，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科技硕果，同时也染白了自己的两鬓。

1983年，一本长达438页的《冶金分析规程》一书问世，是他和所里有关同志集体研究的结晶。

“锺”是一种化学元素，他对这种产品的测试研究，付出了毕生的精力。1988年他设计的QYT6-86《还原锺铤》标准，获云南省计量技术进步一等奖。1989年，他又设计了云南省企业标准QYT-6-86《还原锺铤》，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七五”期间，他对《超净分析》工程设计，获云南有色金属总公司会泽铅锌矿优秀工程设计奖。

“八五”期间，苏维福又有新的任务，正在从事化学分析、物理测试、冶金研究、选矿研究、计量管理与自动化研究等新课题，投入新的战斗。

（本刊辑）



我的回顾

李
晓
姣

我于1940年12月出生在玉环县楚门镇。196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本科。1963年2月来到湖北潜江汉江油田勘探处,从事职工子女教育,历时三十余载。教过小学、初中、高中,中师、高师函授和教师培训,曾任中小学校长、教研科长,现任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是全国数学学会会员、湖北省中数研究会常务理事,并获《中国数学教育人名辞典》荣誉证书。三十多年来,我没有辉煌的业绩,却有几件值得回忆的往事:

难忘的油田职工子女教育

我是1963年2月到江汉油田的,那时石油队伍还年轻,除个别子女上初中外,大多数是小学3—5年级。我先教小学三年级算术,经过二年的苦心孤诣,1965年初考,升学率数学平均分都是潜江县第一。县教育局要我在全县教师大会上介绍经验,从此,我成为潜江县城关小学的一面旗帜。

1966年,江汉油田会战开始,当时玉门、山东、广东的石油队伍上来,潜江地方接纳不了大批石油子女入学,会战领导决定自办学校,责成我筹备职工子弟学校。1967年2月20日,正是我生老二满月的日子,就放在我家召开职工教师筹备会,经过大家分头努力,在离会战前线只有五、六华里的潜江家属基地,办起了第一所油田子弟学校。3月5日正式开学,有学生300多人,有7名职工教师,再聘一些家属教师和保育员、炊事班。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全

部住校,学校全部包下学生的吃、住、卫生、活动。我既是学校的负责人,又是四年级的班主任,每天都要等到学生全部就寝以后,我才能回家休息。有时夜间,孩子打架、尿床,一个哭了,几个一齐哭,保育员管不了,我还得半夜起来去做工作。星期六下午,我们把孩子换洗得干干净净,用大车送回去,让他们的父母和孩子过一个团圆的星期天。有时星期六上午第四节课就发现学生逃课,他们偷偷跑回去,有的步行,有的到大路口搭便车。为了安全,学校规定不许学生独自跑回去,利用战地广播,要求家长配合。学校采取“连环串传递管理”的办法,一人有行动,班主任立刻知道。学校还定期放电影,家长也不来接子女回去。学校从未出过重大事故,油田会战领导和家长都比较满意。

随着油田的不断发展,会战队伍的不断扩大,入学人数也不断增多,学校要增设,势在必行。会战领导决定办第二所,第三所子弟学校。从选择地址、建造校舍、增添设备、聘请教师,一系列的繁重工作,又落到我的头上。寒暑假都不休息,全神投入,招聘代课教师,组织培训,使之不误学时的走上工作岗位。第二所东方红学校,第三所红旗学校相继开课。红砖瓦的校舍盖起来了,芦苇棚糊糊的家庭也一栋一栋地搭起来。高年级住校,一二年级一律回家。会战领导还从前线调来一名指导员,参与学校的政治思想和管理工作。油田子弟学校办得红红火火,也出了不少尖子学生。

倍受劫难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席卷全国,也刮进了江汉油田。战斗队代替了生产队,批斗会代替了生产指挥部,生产秩序打乱了,停课、停产闹“革命”。今天揪这

个当权派，明天斗那个“牛鬼蛇神”和“黑帮”，这场大火不仅烧了整个油田，也烧到了我的身上。在那人妖颠倒的日子里，许多事情都不可理喻，心灵被扭曲了，我也作为一名“黑帮”分子被揪出来批斗，关入牛棚，参加重体力劳动，我的健康完全崩溃了。为“照顾”我的身体，命我去猪圈养猪。那时死了头猪，就叫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尽折磨，我近乎精神失常，每天承受着莫名的痛苦，难以磨灭的心灵创痛，撕心裂肺的历历往事，罄竹难书。只有作为历史的垃圾，扫入十八层地狱，用千古锁枷起，使之永世不得翻身。

真正尝到了“解放”的甜头

1971年，我们的指导员调任油田教育处副处长，也把我调回课堂。这时，我真正尝到了“解放”的甜头，抑郁的心境得到了舒展。1972年会战结束，指挥部撤销，成立江汉油田管理局，要办一所高中，领导给我四名教师，200多高一学生，我又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和四位教师上午分头上课，下午带学生参加建校劳动。这年我已三十二岁，而立之年，我是经受过磨炼的人，工作上的困难是难不倒我的。高中学生也都是我过去的学生，他们很听话，也争气，高中办得有声有色。1973年，局评我为先进教师，1994年被评为模范教师，我的班级被评为先进班级，先进团支部，高中部教研组被评为先进教研组。这满堂红的殊荣，我该感谢教师、学生和家长们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

1976年，油田又办了师范，我又是该校的数学老师。1978年，华中师大在江汉油田办高师函授班，我兼解析几何、高等代数辅导老师。

1979年3月，管理局调我到教育处工作，油田学校招工，

技考、中考、教师考核，数学试卷全是我命题。我在教育处工作期间，有不少所谓“文革”时期的“对头人”，他整过斗过我，如今有事上门求我，我都“相逢一笑泯恩仇”，该办的无不热忱，理智地为他们办了。因此，赢得了上下左右的信赖。

被抑压以后迸发出来的热量

七十年代我复出工作以后，抚平了自己内心的创痛，调整了被扭曲了的心灵，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只有用自己的巨大成绩，才能体现出真正的人生价值，一种被抑压以后迸发出来的精神力量，引发自己在工作上获得前所未有的热量。自1973年以来，我年年被局评为先进教师，1986年获省教委“优秀教育工作者”证书，1988年被评为“三八红旗手”，1988—1989连续二年获省数学教学实验一等奖，1988年获国家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一级教练证书，1992年3月领到“全国数学教育人名辞典”荣誉证书。

1984年教育处从局机关处室转变为双重职能独立出来，我是第一任教研科副科长、科长。当时油田中小学已有19000多名学生，我参加地、省、全国各级学术会议，陆续发表的论文有：《论教育学》《研究课堂问题》《重视创造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重视思维活动的探索》，分别发表在《油田教育》省《数学通讯》上海《中学数学研究动态》等刊物上曾获一等奖、十佳论文的殊荣。

1987年在广州参加全国思维协作组郭思乐教授主持的《思维与数学教学专题研讨会》，我发表了《谈思维是教学载体，思维场的认识和实践》一文，获大会一致好评，他们认为企业教育深入这个课题的研究，是我们独家。1989年

11月，全国数学第9届年会在西安召开，我在会上的发言题目是《教育管理评价十个一》获会长丁尔陆教授的肯定。

火红的老年大学

1990年，由于工作需要，我调到老干部处，筹办老年大学。我们办学模式一校多点，现有10个点，23个班，学员800多，教师有40人，8个专业，油田退离休干部、职工有9896人。1993年10月，我参加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第二次老年教育代表大会，在会上发表《论企业实现五有的思考》获局二等奖。1994年5月参加在南宁召开的中南六省第四次老年大学经验交流会，共有九人在会上发言，我的发言题目是《做思想工作，调节老年人的心理》，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油田局领导要我将此文整理在湖南省报上发表。

我没有什么成绩可奉献给家乡父老，我是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是中共党员，是能够经受得起多种生活的磨练和考验，我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积极向上，奋发努力，尽心尽职，为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五十年中的点点滴滴

● 张子佩

玉环县清港镇是我的故乡，1930年1月，即夏历己巳年十二月，我在那里出生。我是吃清港的山水长大的。

我读过两所小学，先是家乡的清港小学，从初小四年级开始，转到楚门小学就读。1942年夏小学毕业，考入温岭县立中学。从那年秋季起，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的中学生活都是在温岭中学度过的。1948年夏高中毕业后，当时身体不大好（患痢疾等），就耽在清港家里，直至1949年4月家乡解放，我才开始工作。先是在土整队，然后，大约是6、7月份，奉命与汪国帮同志一起去接收清港小学，并为该校的高年级学生办了暑假补习班。由此开始，我先后在清港小学、坞根小学以及龙岩小学工作了三年，分别担任过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和校长等职。期间，从1951年5月底至9月初的三个多月是在温州地区文教干校学习。1952年5月，我奉调参加县文教工作组，然后在县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工作。同年10月初，我被保送进入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经考试后，我被录取在数学科，学习两年，毕业后分配留校工作，也就是说，从1954年7月份起，我开始在浙江师院—杭州大学数学系工作，一直到现在。

从读初中算起，到现在整整五十个春秋。

“盗泉之水”

在中学时期，特别从初中三年级起，我很喜欢写作，这一事实现在我自己也觉得颇为奇怪，因为我实际上一点也不懂得怎样写作，我在中学里的几位国文（语文）教师绝大多数都是有名望的好老师，可惜的是他们上课都是一个样：将课文读一句接着解释一句（对于白话文来说，这“解释一句”往往就等于重读一句），既不介绍作者生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也不分析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因此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欣赏一篇文学作品，更不知道该如何写作。那时每两周有二节国文课是作文课，但教师并不教如何作文，只在黑板上写个作文题目，往往什么也不说，让学生自己写去，不过可以不按教师出的题目，自己出个题目写一篇上交也是可以的。我记得自己好像从来也没有根据教师出的作文题写过作文，在用来写作文的两节课内，我往往什么也想不出、写不出。不过我平时写得比较多，往往有所见、有所感，或加以想像，或加以提炼，自己觉得有东西可写时，就动手写。这些习作多数就写在作文簿上，在作文课后交上去。从篇数来说，总是大大超过规定的作文篇数（我对教过我国文的老师们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尽管我上交的作文篇数很多，其中有几篇还很长，老师都一一的仔细认真地给以批改，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这些习作当然是很稚嫩的，作为中学生的习作，我虽然不能说丝毫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成份，但十之八九都是有感触、有内容的，并非无病呻吟。记得我在一篇作文中开头第一段只有一句，是：“盗泉之水，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则易其名而饮之。”显然是读了一篇课文后引起了自

己对于当时一些社会现象的深沉感慨。

逝者如斯

如果说，我中学时的课余时间有许多是花在学习写作上了，那末我在大学读书时的课余时间可以说是完全浪费了。正常的休息和适当的文体活动是必要的，决不能说是浪费时间；我指的是没有好好利用时间，使自己学得更好些更深些。主要原因是自我要求不高。我们这个专修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初中数学教师，当时我们的专业思想很巩固，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也很坚定，因此自始至终认定自己将来要作一个中学数学教师（自己估高一点，把高中教师也包括进去），根本没有想到今后的一生会是从事大学数学教学和数学研究。自己在思想上并没有要利用课余时间作进一步学习的要求。当然，客观原因也是有的。那时除了新从苏联翻译过来作为教科书的出版物外，很少有适当的书可供我们在课馀阅读、自学。那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只是要争取在各门主要课程上成绩达到100分，至于要作为一个中学数学教师，除了学好校系规定的几门课程之外，是否还应该学点什么？或者，对自己学过的某一门或几门课程，是否应该作进一步的学习？学习什么书？等等，自己都不知道。但这不能怪教师，而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教师绝大多数是刚从中学里选调上来的，他（她）们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把课开出来，把课开好。事实上他们已成功地开好了该开的课程，并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和优秀的中学数学教师，很好地完成了他们当时的历史任命。

有人说，大学毕业以后才是一个人学习的真正开始，这

是我在读大学时听到的，当时并不怎么理解，然而后来我自己的经历却正是如此。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学校本系代数教研室，为了使自己能胜任代数方面的教学工作（那时普遍地还未把学术研究提上日程），于是开始边工作边学习，决心学好代数专业，这种要学好某一专业的强烈的自我要求，在学生时代是比较不容易产生的，在学生时代，往往走的是“听课、做作业、考试”的三部曲，考试成绩不错，自己就满足了，尤其是我们那个时代，由于种种的历史条件，很难突出这个三部曲，这与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我很羡慕现在的大学生们，只要有志，在大学时代就可以开始你自己的“真正的学习”。

边工作边进修，首先是工作，那时我们的教学工作都很重，为了做好当时担任的一门（常常同时有二门）课程的辅导工作，还得花一部份精力和时间在学习该课程，因为有的课程自己也没有学过，即使是学过了，光凭自己做学生时学到的那点东西，也是很不够的。因此，我在代数专业的进修上，时间并不多，一、二年后，系里成立了数学教研室，因人员不够，把我从代数组调到了教学法组，系主任给我的任务是要我学会“双打”，即既要能担任代数方面的教学任务，又要能担任教学法方面的教学任务。对于一个只读了二年专科，毕业后只工作了一、二年的青年来说，要他同时学习掌握两个专业，实在是很少见的，不过我还是服从了领导的决定。从此，我除了继续学习代数外，又开始学习数学教学法。在教学法方面，最花时间的是每年一次的教育学习，我必须带领一部分学生到中学里去，指导他们如何备课如何讲课以及如何做班主任、批改教案，听他们预讲和正式讲课，

然后开评议会，等等。这一个月中，从早到夜，精力全部集中在所带领的学生们身上，几乎连片刻的休息时间也没有，更谈不到自己的专业进修了（直到1958年学校由浙江师范学院改为杭州大学，我才回到代数教研室）。此外，众所周知，还有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也是很分心和很占时间的。当然，如果只是很消极的应付地参加运动，也可以在政治运动中争取到自己的时间，但是我却偏偏是个凡事都很认真的人。不过，我觉得政治运动对于专业进修的影响，主要的还不是时间，而是思想认识。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不是一次专门的运动，但几乎每次运动都会涉及。在批判“理论脱离实际”时，首当其冲的是代数和几何这两个学科。几何有一位教授顶着，虽然他们日子也不好过，但多少会比代数好些，我这里说的并不是“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意思，因为批判的并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人，我指的是，有一位在专业上很有造诣的专家，对于本专业的认识总要深刻一些，受影响也会少些。而我们之所以受到很大影响，主要是在思想认识上模糊了，自己也怀疑代数这个专业自己该不该继续搞（甚至怀疑这个专业该不该继续存在）！有一段时间，我们终于暂时中止了代数方面的进修，而转向运筹学（我是中国数学学会会员，也是中国数学学会运筹学会现名中国华东运筹学会会员），虽然没有放弃代数而完全转向运筹学，但当时对代数的确已经动摇了。后来还是系总支书记，一位老革命干部，从全系的大局着想，把我和另一位同志叫去，要我们继续搞代数，不要改变专业方向，我们才回到代数上来（也许应该说明，理论要联系实际这提法并没有错，问题是在于怎

样正确理解），然而，“理论联系实际”的风并没有终止，劲风一来，我们又困惑了。人在困惑中是迈不开步子的，这种困惑所造成的影响是很不好的，有时也许甚至是致命的，我觉得在这里得到的教训是，在选择专业方向或中途决定要改变方向时固然要十分慎重，但决定以后，就要坚定地勇敢地往前走，正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所说：“走自己的路，由他们说去罢。”

真正能够让人安心、专心于自己专业的时期是在十年动乱结束一二年之后，然而我已垂垂老矣。虽然有道是“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但毕竟是逝者如斯，青春不再。我的体质生来就很孱弱，我遗憾的是从来没有注意锻炼身体，如果我能把身体锻炼得强健些，我就可以学得更多些，做得更好些。

黄卷青灯

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有一个或断或续，或长或短，通常往往是相当长的自学过程；在自学中，也总会有一两个特别难的阶段，而这往往恰是很重要的阶段，若比之攀高，这就是遇到一个特别难以攀越的高度，但当你攀越了之后，回头再看以前的和周围的一切，你会觉得特别清楚明白。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例如有一次我要读一本当时觉得很难读懂的书，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啃，读了一章或几章，然后又回到前面一遍两遍地从头再读。这样，当我读完之后，再看别的书就觉得特别轻松。实际上，这时我不仅学了读书的知识内容，而且在思想方法上和自学能力上，都有了不少的提高。当然，这“啃”的过程是很艰苦的，又是漫长的。须有

坚强的毅力、顽强的刻苦精神，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和辛劳，在这种时候，我觉得自己以前曾遇过（相对说来）比较艰苦的生活，受过一些磨炼，是有点好处的。

我的家境在当时当地还算富裕，我在家中也备受宠爱，然而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就已较少在家，中学六年则更是在远离家乡四五十里的温岭中学（那时什么车也没有），寄宿在校，和同学们过着一样的生活，那时人民生活普遍贫困，与今天是无法相比的，我不想去回忆那时的情形，然而此刻却在脑际忽然闪现出“一灯如豆”这四个字。偶尔停电，临时点支蜡烛，但我并没有一灯如豆的感觉，现在回想中学时期却忽然冒出这四个字来。那时每晚夜自修，我们每人用着自己的一盏菜油灯，就在这如豆的灯光下，或复习功课，或做课外作业，读的是油印的讲义，纸头是发黄的“毛边纸”，写的也是这种发黄的毛边纸，真可谓是黄绢青灯了，只是我们并不是在诵经礼佛，而是在寒窗苦读。

解放后我在小学工作时期，也有过比较艰苦的时日。在坞根小学时生活比较苦，吃的往往只是些我们自种的蔬菜，在龙岩小学时，主要则是工作比较辛苦，那时有两股热潮与小学紧密相关，一是冬学（成人夜校），每个自然村都有一所；另一个是农村剧团，从选剧本（有时是自己编制）、导演到琴师、鼓师等等，都是我们的教师。因此除了白天的小学以外，每晚都要到一、二个冬学看看，回来后往往还得帮忙剧团的排演，工作确实很辛苦，然而我们也很愉快。记得有一次积雪未融，我和总务主任孔小青同志一起出去为学校筹款（办公费用），在山坡一块光滑的巨岩上，我们中的一个被脚下的水滑倒了，另一个想去拉一把，结果两人一起跌

倒，我们禁不住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小时候，人们就说我这个人非常嫩弱，我觉得自己现在仍是如此，不仅这“弱”字很真实，在很多方面，这“嫩”字也很贴切，然而我的个性也有倔强、固执的一面。我并非不是一个“不耻下问”的人，在我认为需要问人时，我会很坦诚地向人请教；但我很少问别人，尤其是在自学中，往往宁愿自己久久地冥思苦想，以求自己解决。平时的这种习惯，以及个性中倔强、固执的一面，也许就成了我在克服困难时能顽强地坚持下去的毅力，这毅力，我想也是与一个人对于学习、工作和事业的认真态度分不开的。

“我看得很吃力”

又回到了“认真”二字。我不想说我对于这二字的看法和感想，也不想多写自己回忆起的有关片段，我是想在这里记下我在中学时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大概是高中二年级吧，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好几位同学一起到国文教师家里，他是一位慈祥的很有名的中医，家里藏书很丰，那次他拿出很多书法碑帖来让我们看，这都是些平常很难看到的碑帖。我被手上的一份碑帖吸引住了，只觉得其笔力遒劲，笔法奇特，因此看得很仔细。这情形大概被这位老师发现了，他问了句“怎么样？”我随口答道：“我看得很吃力！”其他同学都惊奇地回头看着我，老师却高兴地拍拍我的背，亲切地说：“好！你将来一定有出息。”我忘不了老师对我认真用心的学习态度所给予的赞扬和鼓励。

我有出息吗？我不知道；我成功了吗？应该肯定地说：没有。我失败了吗？或也可以说：没有。漫长的人生道路是

艰苦的，当然也有欢乐，是两者交织的，而我认为我们应该重视的是艰苦，而不是欢乐。最后，我想借用一位朋友在给的信上所说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他写道：“在漫长的艰苦的人生道路上，我们艰苦地走了几十年；然而不管怎样，我们毕竟是走过来了。”

1992.8于杭州

我省著名女律师

- 张燕征 -



张燕征，女，汉族，浙江省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一级律师。1930年12月出生，玉环楚门人。就读楚门东方小学、玉环简易师范。1947年上半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被开除学籍，1947年7月参加括苍游击队，同年入党。全国解放后继续在部队工作，立过三等功，1953年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深造。她怀着为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贡献力量的强烈愿望，刻苦学习，成绩优秀，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等生奖状和中国人民大学三好积极分子奖章。毕业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中的一员。律师制度取消后，她长期从事司法宣传、法律政策研究和理论教育等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律师制度后，她“归队”从事律师管理工作。

张燕征律师刚正不阿，维护法律的尊严，为当事人排忧解难，她办理的“张××报复陷害案件”申诉案就是一例。

1983，桔乡黄岩某羊毛衫厂一名女工自杀身亡，厂长张××被以报复陷害罪判刑六年。被告上诉被驳回后，连续申诉达三年，申诉书达10多万字。张燕征律师获悉后，仔细审阅了申诉材料，调阅辩护卷宗，发现有足够的事实证据证明被告没有陷害的故意和报复陷害的行为，作为一名厂长，张

××对该违纪的女工进行批评教育，是合法的，女工的自杀与厂长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弄清事实后，张燕征以省律师协会的名义致函省法院，建议按《刑事诉讼法》第149条之规定及时处理。为了增强辩护力量，张燕征又与4名有影响的律师联合陈书省法院，请求复查。随后她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以省政协委员、政协法制组负责人、全国律协理事的名义，通过方方面面的呼吁，督促法院，并走访了最高法院刑二庭。1988年5月，在经历二年零四个月波折后，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终于作出了宣告张××无罪释放的决定。此案改判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钱江晚报》、《民主与法制》、《律师与法制》、《江南》等报刊先后对该案进行了报道。

张燕征作为一名律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宣传民主与法制，宣传律师制度。在1985年和1986年的省政协大会上，她分别作了《大家都来关心律师工作》和《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的发言。1986年，被省政协授予“政协工作积极分子”的称号。1988年，中华全国律协授予“五十年代老律师”荣誉证书。张燕征律师还积极参加对外律师工作交流。1986年参加中国律师代表团赴港考察，1987年参加亚太律协会议，并成为该律协的个人会员。1992年参加浙江省法律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几年来张燕征接待过日本、美国、法国等地的律师及法学代表团，与国外律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张燕征十分重视律师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及律师工作的改革，1989年她为《律师与法制》撰写了《改革律师体制与倡导民主之风》的评论，强调了倡导民主之风的重要，近年来，张燕征提出的“律师工作如何为改革开放服

务”的议题，被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正式列题，成立课题小组，并于1992年完成了该课题任务。张燕征撰写的《加强我省涉外律师队伍建设十分紧迫》的调查报告，刊登在浙江省司法厅主办的《综合与调研》上。

张燕征除了担任本职工作外，还担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省五届六届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省企业家协会理事、省女律师联谊会会长、中华女律师联谊会理事等职务。1993年被选入《中华名律师辞典》。

(本刊辑)



女发明家

- 林 静 -

林静，又名小娟，1952年出生在本县楚门镇。1975年毕业于温州医学院医学系。1975年至1986年在本县防疫站工作，1986年调浙江温州医学院任教。

几年来，林静阅读了大量医学专著，并检索了大量国内外医学和医疗器械资料，刻苦钻研，大胆实践，研制发明了多方结构和固定结构之“阴道扩张器”取代了我国近百年来一直沿用至今的锣母锣丝固定结构之金属“阴道窥器”。1989年她申请国家专利。1990年12月授于专利权，专利证书第49511号。1994年授于发明专利权，发明专利号891083928。

林静发明的这种“阴道扩张器”广泛应用于妇科、产科、计划生育的临床检查，人工流产和健康人群体检，克服了原金属锣母锣丝结构的“阴道窥器”双手操作，费时费力，造价高，能导电，携带不便，寒冷季节病人有冰冷不适感，反复使用易致疾病交叉感染的弊病；林静研制的阴道扩张器，设计新颖独特，安全实用，大大缩短了操作时间，且单手使用，提高了工作效率，电灼冷冻不导电，无冰冷不适感，减少了病人痛苦；推带方便，有利于边远地区体检使用；塑料制作，工艺简单，且为国家节约了大量金属材料；

一次性使用，能杜绝医源性疾病（如爱滋病、性病、乙型肝炎、癌肿等）的互相交叉感染，是妇产科临床器械之理想换代产品。因其使用量大，故而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林静的这个发明项目，曾被《世界发明》、《当代发明家成果辞典》、《中国专利精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辞典》以及国际权威专利刊物（英文版专利号N1051307A）等工具书收录和收藏。经检索迄今，我县获得中国专利局授予发明专利权者林静为第一例。

1993年10月该发明项目在第七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上荣获金牌奖。由中国发明家协会发合格证书，编号F127，成为玉环县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女发明家。

新近，林静的该项发明又荣获首届中国金榜技术与产品博览会金奖。

（庄德华）

林明祥，又名林存鹤，1941年11月，出生于玉环县楚门镇外塘乡一个农民家庭，也是该地区林姓家族中第一位大学本科生。1954年9月进玉环县中（现楚门中学）念初中。1957年9月进温岭县第一中学念高中。1960年9月考进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1965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无线电十四



微电子高级工程师

林明祥

厂工作。1988年10月调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工作。1982年被评为工程师，1986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担任过车间主任、生产控制部经理、生产部经理等职务。

林明祥从事无线电半导体工作将近三十年，工作不遗余力，成绩斐然，多次被评为厂、局先进工作者。

1968年组织成立华东地区第一个固体电路小组，担任主设计师，首创国内以扩散法制作cmos器件。1968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就用上他设计并制作的模拟门集成电路。“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林明祥与他的同事们，荣获电子工业部、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的嘉奖令。北京504研究所、第十五研究所等单位，都先后派人来与他洽谈联合开发cmos集成电路，并运用到火箭及舰艇导航上，扩散法制作cmos器件工艺，打破了第十三研究所首创的外延法制作cmos器件的一统天下，为国内半导体行家所瞩目，接踵而来的培训了不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1983年10月，参加了微电子工业部技术工人等级培训教材编写工作，主编《半导体器件工艺》一书，耗时一年多，这部四十多万字的书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为普及、提高半导体工艺作出了贡献。

1986年发表了《S枪溅射》、《高离子体湿积》等论文，其中《S枪溅射》获得了徐汇区科技一等奖。

1987年参加上海市科委组织的半导体工艺“在线检测”会战工作，与同济大学合作试制HL-T数字式温湿度计成功，荣获上海市科技一等奖；同年试制HL-T离子型薄膜电容器式数字温湿度仪，获上海市优秀产品二等奖。

林明祥是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微电子专业人才，在无线电和微电子方面有独特的造诣。1987、1989年两次率队出访美国，进行考察和接受培训，取得丰硕成果。

林明祥投身的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是与比利时合资的中外合资单位，其厂房设计是日本人搞的全封闭式洁净厂房；其设备是美国引进的80年代中后期产品，有不少设备还是巴统会控制对象，首次引进中国；其技术是引进美国 and 比利时最先进的3微米工艺水平。贝岭公司从产品试制到形成生产也是国内引进外资中最成功的单位之一，1992年销售产值已达1亿元，1993年翻到2亿元。这惊人的速度为国内同行瞩目。其产品为程控电话集成电路，是为上海贝尔电话有限公司配套产品，销售遍及世界各地。贝岭公司正向1.2微米更先进的工艺技术进军。

（本刊辑）

老教授 林循经



林循经，1912年出生于我县坎门镇，现已83高龄。1927年毕业于坎门小学、1930年毕业于温州瓯海中学，同年考入浙江大学高级工业专科学校，1933年毕业。因品学兼优，留校做实验员。1934年又考入浙江大学机械系，1938年毕业，在江西省工业专科学校水力机械系任教。他编写了《水力机械》等教科书，还绘制了八十多张大挂图，保证了教学上的需要。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初期，燃料奇缺，电力更是极少。这时林循经刚刚大学毕业走向社会，血气方刚，怀着满腔科学救国的热忱，投入教学工作和科学实验。由于日寇步步入侵，学校几经迁址，后来迁到江西于都县上营村，晚上学生自修和教师备课都是点豆油灯。他利用旧发电机，开始研制我国第一台小水力发电机，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战，终于获得成功，并获得发明专利权，改善了师生夜间照明条件。1940年升任“工专”讲师，科主任、实习工厂主任。1942年任“江西工专”（后改为南昌大学）副教授，讲授“金工工艺”、“机械制造原理”等课程。

1951年，由高教部推荐，调入我国第一所综合军事院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由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主任教员，

副教授、机械教研室主任。由于当时刚刚组建院校，教材缺乏，他编写了《机械工艺》、《机械制造原理》、《金属切削》等教科书，满足了教学上的需要。

他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科研活动。1958年写了《大前角高速切削离心力断屑研究》等论文，推进了高速切削的理论基础研究；参加了当时的四海机器厂实验所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参加了“机械手”“超声波发生器”“电切屑加工”等一系列实验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果。1958年升任为教授。

他除了搞好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工作外，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马列主义的哲学观点运用到教学方面，写了《论机械运动的矛盾性》等论文，受到领导和师生的一致好评，曾多次出外演讲。

由于他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多次被学院评为先进工作者，荣立二等功，58、59、60年连续三年作为军代表去北京天安门参加十·一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亲切会见，并合影留念。

1962年调江西工程兵学院任教授及渡河教研室主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3年调无锡工程兵科研一所工作，1979年调南京工程兵学院任教授，和担任学院顾问，1986年离休。

林循经在军中任教35年，为我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和科研骨干，现任工程兵司令员、南京工程兵学院院长等都曾是他的学生。1986年总参、总政、总后联合颁发了题词“为我军教育，竭尽忠诚，勤奋工作，呕心沥血，精心育才，做出贡献”的荣誉证书，表彰其功勋。

他一生的座右铭是，“理论联系实际，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他的生活简朴，从不居功自傲，不要官，不要名，不要利，廉洁自律，一生清贫，是知识分子中的楷模。

（张一芳供稿）

编者按：

林循经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九四年九月九日十四时五十分在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设计战线上的一位老兵

- 罗天智 -



罗天智是设计战线上的普通一兵。一九三六年三月出生于浙江玉环县的小渔镇——坎门。一九五四年毕业于杭州化工学校化工机械专业，时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之际，这颗年青人的心，早已飞向了祖国遥远的建设工地，就连美丽绝顶的西子湖在他的眼里也显得那么平淡无奇，那么不值得留恋。1954年秋天，他参加了大连化工厂的改造，轰鸣的机器声，闪烁的焊光，对他来讲是多么的新鲜、多么的亲切。他努力工作，孜孜不倦地学习，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工地上。在压缩机厂房的改建中他提出了几条合理化建议，并得到了奖励。小小的纪念本、薄薄的奖金，对这刚刚跨出校门的年青人来说是多么的珍贵，他是那样地高兴，那样地珍惜，因为他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出了一点点他想出的力。

一九五五年底，他随工作单位转战到了吉林化工区。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吉林化工区位于吉林市的松花江北，由三个主要生产厂——有机厂、化肥厂和电石厂组成，还有配套的热电厂、机修厂及水源地等，是一个完整的新建的大型化工基地，他参加了化肥厂的建设。这里原是一片广种薄收的北国田野。因

为他们是安装公司，生活条件要比土建公司好得多。他们到时，不少厂房与一批宿舍已经建起来了，但道路情况还是很差，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常常穿过原野，踏着厚厚的积雪，步行几十分钟去上班。北国的严冬确实令人生畏，那时“三九”天气常温在零下36度左右，还曾到过零下40度，刺骨的寒风能吹得你双颊失去知觉，戴着皮帽子还觉得头皮发凉，这是人们传说的“撒尿立即会冻成冰棍”的地方吧！再加上主食不习惯，对出生在南方的人来说生活上是艰苦的，但工作却是很有意思的，苦中有乐。

一九五六年国务院部委调整，重工业部撤销，成立了化学工业部等专业部，由于工作需要，他于同年秋天被调到化工部第五化建公司，参加兰州化工区合成橡胶厂的建设。这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建设的三个化工基地之一（还有一个化工基地太原化工区）。当他参与建设的橡胶厂凝聚工段开车成功生产出雪白的丁苯胶时，他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激动，因为辛勤的汗水又培育出一朵工业之花。

通过一个接一个工程的建设，他得到了磨练，不断地学到了新的知识。然而，知识的海洋是那样的浩大无边，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他渴望着学习，渴望着深造，但是那时施工队伍中的技术人员还是很少，这种深造的机会是很难得到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各条战线都得到了大发展，教育也是如此，得到国家教育部的批准，吉林、南京及兰州三个化工基地组建了化工学院，不但向社会上招生，也向在职职工招生。近水楼台先得月，经过争取，他得到领

导批准，报考了化工学院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四年的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并被兰化设计院选中，从此他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涯。

一九六二年到设计院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参加兰化橡胶厂石油汽车间的轻油管式炉裂解试验。该车间的乙烯装置是苏联帮助建设的，年生产能力为五千吨，裂解原料是采用炼厂的干气，由于炼厂干气得不到保证，该车间长期处于半停工状态，为了发挥该装置的效益，必须寻找新的原料来源。轻油管式炉裂解在国外技术上是成熟的，但国内没有掌握，在工业装置上进行轻油裂解试验还是第一次，是有一定风险的。当时由石油车间和兰化设计院有关人员共同组成了联合试验小组，共同讨论试验方案，共同参与试验。当时对轻油及液态烃两种原料的各种条件进行了试验，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试验获得了成功，该成果曾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他作为设计战线上的新兵，虚心向老技术人员学习，向老工人学习。按照分工他对裂解工段的试验进行跟踪观察，记取数据，并在此试验数据的基础上，参加了裂解工段的改造设计。不仅改造了流程使其适应对轻油的裂解，而且对裂解气的急冷系统进行改造，砍掉了急冷塔，增加了废热锅炉。这样不仅大大地减少了冷却水的消耗，减轻了环境污染，而且还回收了大量废热副产等汽供本车间使用，使车间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改造后的装置一次投料试车成功，使该车间走出了长期半停工状态的困境。此后，又对该车间进行了多次改造和扩建，使其年生产能力从五千吨乙烯提高到约五万吨乙烯。在生化设计院期间他共参加或负责了大大小小十多个项目的设计工作。

一九七六年因工作需要，他从兰州被调到了湖南岳阳岳阳石化设计院（原称岳阳石化总厂设计院），还是从事老行当。期间他负责了六个项目的设计，还担负了若干项目的技术把关工作。在他负责的设计项目中，先后有三项设计获得了中国石化总公司及国家的优秀设计奖。

岳化03厂涤纶短丝装置挖潜改造，是一个技术改造项目，他负责设计。该装置原系某纺织设计院设计，年生产能力为五千吨涤纶短丝，前纺有八台VD403纺丝机，后纺有四条LVDH3牵伸联合机。经过几年的生产实践，前纺部份有一定潜力，后纺达不到生产能力，前后不配套。另外，产品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这是他第一次担负化纤装置设计。化纤装置和化工装置在工程设计方面虽是基本相同，但生产工艺有很大差别，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需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当时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领导把任务交给了他。为了岳化的振兴，他勇敢地挑起了这付担子；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虚心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向生产厂的同志学习，和大家一起认真地进行了国内技术调查，吸取了兄弟厂的经验。在调查的基础上，他组织大家一起讨论确定了纺丝机的改造方案。纺丝部分基本上利用原有部件，将每台双面排列12个位的VD403改造成一台单面排列24个位的纺丝机，喷丝板孔数增多。卷绕部分全部重新设计，并在结构上作了较大改动：机头与机身分离，机头由链传动改为齿轮传动，丝束改用非啮合式喂入，计量泵与导丝辊改用同步电机变频调速。切片干燥部分取消卧式沸腾体干燥器，改用立式翻板沸腾体加充填式干燥器，使切片平均含水率降低一半，切片含水均匀性大大提高。通过上述改造，使纺丝速度

从550米/分提高到800—1000米/分，年生产能力从五千吨提高到一万吨，产品一等品率从30%提高到95%，装置一次开车成功，生产厂感到很满意。该设计获得了中国石化总公司优秀设计二等奖。

岳化03厂3500吨/年涤纶长丝装置设计，是一个利用闲置的原晴纶厂房及其配套的公用工程，引进国外POY—DTY技术路线的涤纶高速纺丝设备的改造设计。原计划前纺部分按照当时纺织部设计院的做法成套引进，外商完成基础设计及大部分详细设计，国内只做土建部分的详细设计。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到十二月与外商进行合同谈判，由于当时国内长丝装置大量上马，外商手中已有不少项目，再加老厂房改造设计难度大，所以外商态度不积极，中途退出谈判，我方亦嫌其价格高、进度慢。谈判破裂后又邀请过几家外商，也都没有来参加竞争。但是工程不能停，怎么办？决不能让外国人卡住脖子，要为中国争气，在上级有关部门支持下，我方走自行采购的道路。做为设计负责人，他积极组织有关人员做好单机采购准备，在上级有关部门组织下于一九八五年三至四月间，在消化吸收国内已有装置的基础上，不引进技术软件和工艺设计，甩开外国工程公司，自行出国采购单机，与十一个厂商洽谈，签订了八个合同，自己配套完成工程设计。由于单机采购价格便宜，再加上商务谈判压价成功，结果用买二条生产线的钱，买了三条生产线，扩大了装置的生产能力。为了抢回前面损失的时间，打破常规，在专业不齐(当时出国团组中只有工艺及设备二个专业)的情况下，利用采购间隙，用四天时间，在国外分别与两个主要厂商举行了二次设计条件会谈，讨论了方案，明确了双方交

接的条件，为双方尽快开展设计创造了条件，为工程建设抢回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该装置从单机合同签约起，只花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建成，投料试车一次成功。该装置的设计，先后获得中国石化总公司优秀设计一等奖，国家优秀设计银质奖。

岳化06厂3000吨/年环氧树脂装置是从日本国东都化成株式会社引进技术及关键设备，采用合作设计的方式，由东都化成完成基础设计，我方完成详细设计。这种合作设计的方式，是当时刚刚开始探索的引进方式之一，比起七十年代以前我国经常采用的成套引进，在设计上要复杂得多，当时这种合作形式对巴陵院来说也是第一次，因此需要周密考虑摸索前进。他又挑起了这付艰巨的担子，亲自编写了询价书，担任了合同技术附件谈判的主谈，率领了设计联络团组到国外工作，组织了初步设计，直到完成详细设计。由于他在战术上重视，小心谨慎，认真对待，周密思考，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设计任务。由于全体同志的努力，这个技术先进，自控水平很高的环氧树脂装置，从合同生效起，仅用了二年的时间就建成投产。在试车考核的验收会上，一位外商说：“我们公司在中国建了不少装置，没有一个能在二年内建成，你们的速度出于我的意料”。该项目的设计获得了中国石化总公司优秀设计二等奖。

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其本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巴陵石化公司于一九九二年授于“巴陵公司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同年由中国石化总公司上报国务院，于10月1日批准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科技人员。

(本刊辑)

我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生于玉环县楚门镇。一九五四年毕业于西安石油学校测量专业，后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当代经营管理专业。参加工作后，历任组长、技术员、队长、主任、科长、江汉油田八达实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甘肃省永酒厂董事长。一九七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三年被授予工程师职称，一九八八年八月被授予高级工程师职称。

祖国需要石油，人民渴望石油，使自己走上从事石油勘探与开发的道路。这是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路。野外

勘探工作，常年风餐露宿，每日不是一身水，就是一身泥，曾被人们称为全国第二个最可爱的人——勘探队员，深感劲倍增，心更坚。转眼间四十个春秋，曾转战陕、川、桂、鄂四个省区。五十年代，从陕北的黄土高原，南下四川东部、南部的深山老林；从四川中部的丘陵地直下广西中西部的石灰岩地区。完成了3000多公里的三等三角控制测量、三等水准测量，五个区片的小比例地形测量。六十年代初，转战湖北，驰骋于江汉平原，直至七十年代，参加了江汉油田初期勘探工作，参加了该油田历次大小会战中的生产组织工作，以及之后开发中的管理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我的简历

●
季菊铨

江汉油田地处平原水网地带，地势低洼，常年受到洪涝灾害的威胁，每年总有1—3次造成停工停产，损失巨大。随着油田发展解决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受油田党委之托，组织有关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与研究，结合实际地提出了等高截流，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及时抢排的原则，于一九八〇年负责编制了“江汉油田防洪排涝总体规划”。经亲自组织油田人力、机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经五个岁月的努力，使“规划”得以实施。从此使油田的洪涝灾害得到治理，确保了油田的生产与安全。该项目在全国石油系统专业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得到了肯定与推广。

八十年代初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吹进油田，为发展繁荣油田经济，解决油田富余职工，家属和知青的就业问题，开始从事探索和发展油田的多种经营，主管八达实业集团公司的工业实体，为发展经济，前后曾到俄罗斯、乌克兰、缅甸考察。为增强自身实力，从基础工作入手，加强企业管理；抓信息，大力开发新产品，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二十个工业企业，在管理上大部分达标。前后主持了十六个产品开发，经论证、立项，投入了生产。我还针对油田的特点下功夫，当时油田大量轻质油得不到充分利用，成了负担，一九九〇年我开始对轻质油的综合利用进行研究，经分析采取蒸馏法深度加工，由于馏份太窄，用自动仪表严加控制的办法，又产出丁烷、石油醚、6#A溶剂、120#溶剂油、200#溶剂油等五种产品，完成了从开始论证、立项，到建设和生产的全过程，其中产出的新一代植物油浸出剂—6#A，填补了湖北省的空白。十多年来，集团公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一九九三年，发展到了二十个门类，

产值年平均递增50%以上，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八达实业集团公司的主导产业，产品销往国内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到三个国家。集团公司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多次受到石油部领导的肯定，并在全中国石油战线推广。

在石油战线整整战斗了四十个年头。忆往昔，实在太平凡，只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做了自己能做的一点点工作；看今朝，原油产量过了一亿三，倍感欣慰，增添了几分自豪；想将来，随著祖国经济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五日

我在1938出生于玉环县坎门镇。1953年考入永嘉中学（温州头陀寺）初中和高中读6年，59年考入杭州大学化学系，1963年8月毕业于该校光谱分析专业。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山西太原，化工部太原化学工业公司。实习期满后调入化工部第二设计研究院，属该院研究部分析室。1965年底受派去北京，在化工部北京化工研究院进修红外光谱、仪器分析一年半左右，学习后回到太原负责组建红外光谱实验室。从此以后与红外光谱分析研究工作捆在一起。

在研究院中曾先后参与和承担过十多个专题的红外光谱结构分析任务，由于我院的研究方向是聚氨酯特种橡胶，主要解决胶的链段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当时属军工任务范围，研究成果不发表，只能作成鉴定材料入资料库。

“文化大革命”时，该院的设计与研究两部分经化工部批准分家，设计部复名为原来的化工部第二设计院，研究部改称为山西化工研究所，我在1978年任分析室副主任，1982年任分析室主任。

以下是技术职称和社会工作经历：

1979.11 经化工部科技局统一考核、批准授于红外光谱专业工程师。



我的自传

●
郑
达
坤

- 1981.2 山西省科技测试学会成立，被选为常务理事。主要承担本省大型精密仪器的进口咨询、进口仪器技术座谈和展览。
- 1984.7 受聘于山西省科技开发咨询中心（公司）、担任专家级顾问。
- 1984.12 由山西省科委推荐，被聘任为山西农业大学研究生部，担任给毕业的研究生讲授红外光谱、紫外光谱的仪器分析课。
- 1985年起 任山西化工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主任。并同时兼任山西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由省标准局和省化工厅任命）。
- 兼任化工部化学助剂（加工助剂）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负责人（由化工部科技局任命）。
- 1986.5 由化工部科技局任命、担任化工部化学助剂监测中心第一副主任（主任由院、所长兼任）。负责全国144个生产厂的化学助剂的质量检验、部级奖的评定工作。
- 1987.1 从山西调回温州工业科学研究所，仍从事红外光谱工作。
- 1987.11 由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所评选推荐，经温州市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投票、上报。由浙江省工程技术高级职务第三评审委员会批准为高级工程师。
- 1988.3—1990.12 由“温州市职称改革办公室”聘任为“温州市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化工专业组成员”定期参加市中级、高级技术职称的评审。

由于长期从事红外光谱技术工作，撰写了《红外光谱在聚氨酯橡胶剖析上的应用》和《国外红外光谱技术动态及发展》两篇论文，获得同行们的好评。



#####

学海无涯苦作舟

我的自传

● 郑祖武

#####

我于1941年12月出生在玉环县城的一户贫民家中，此时正值祖国遭受日本鬼子的蹂躏，我生下几十天，侵略者的铁蹄就踏上这片土地，母亲背着我逃难到陈屿山区福山寺躲藏，家中木板箱柜上留下敌人不少刺刀的刀印。我的童年在多灾多难的充满血与泪的土地上成长，幼年体弱几乎年年发疟疾，我见过多少次母亲为我彻夜不眠而显得憔悴的面容和着急的眼泪。她老人家从小在洞头海岛的风浪中长大，身世悲凉，18岁那年经人说媒远嫁到玉环岛，从此几十年她仅回娘家二次，这是为什么？！我的父亲是一个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汉子，他十三岁母死，十六岁父死，家穷连小学也没毕业就到坎门杨葆真药店当学徒，直到解放后还在当店员。我七、八岁时常上山打柴与下田打猪草。我当时渴望上学，1948年父母终于省吃俭用送我读环山小学，盼望有出头之日。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看到如今有些东西已变得那么遥远，可是有些东西却“留下了沉重脚步的深深的印子”。我永远记得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孩中那个赤足的孤苦女孩……我想到母亲的经历……我看了《革命家庭》一书，

周莲为革命献出儿子立群；我看了《野火春风斗古城》影片，杨晓冬为革命失去母亲；我看了《红湖赤卫队》影片听韩英狱中唱到“生我是娘，教我是党”时，由此我深感母爱的温暖，母爱的无可比拟之珍贵，更加明白了又一个“母爱”，这个更加伟大的母亲——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指引我方向，正如我父亲生前写道：“是党，是毛主席把我儿子（郑祖武）从小学、中学一直培养到大学。”

1949年玉环岛解放了，我在新中国党的怀抱中健康成长，1953年戴上红领巾，1954年高小毕业，1956年加入了团，1957年玉环中学初中毕业，1960年温岭中学高中毕业，1964年7月毕业于温州师院。1964年8月，我被分配到浙江省委组织部诸暨社教工作团，先在诸暨枫桥，后到诸暨安平、高湖大侣及赵家埠等工作队锻炼，任过队员、秘书、大侣片团委书记，“三同”好处多，我在农村广阔天地学到学校没有学过的东西。1966年7月19日在诸暨党校由组织部再分配我到浙江省电台从事新闻记者职业，一干广播报道就是五年；1970年末被调至浙江电视台，一干电视报道就是十一年；1981年3月，我到“大众电视”杂志社，一干又是七年；1988年8月底，我调入广电部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新闻系主讲电视新闻报道，1993年7月1日，该校党委批准我为中共党员。

近十年来，我注意抓科研促工作，学术上进步大、出成果。198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编的《外国电视明星荟萃》一书，计十二万字；这一年的年终，我责任编辑《国外电视之窗》栏目，被大众电视社誉为全国同类刊物中的名牌栏目。1988年1月，我赴京组稿采编的“关于电视节目商品

市场”的理论讨论历时半年,被1989年1月号的《大众电视》刊物称为“1988年中国电视界十大新闻之首”,讨论内容被中央广播电视部列入了1988年部政策研究室科研项目,因而本人获大众电视优秀采编奖。就在1988年5月,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同年10月又加入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浙江分会。到了高校后,我努力教书育人,更加重视学术研究。在1989年第5期的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学研究会主办的《电视研究》学刊上,全文一句不改地刊发我的八千字的学术论文《试论电视新闻的导语艺术》,论文针对中央电视台名记者、中国第一个电视评论主持人庞啸关于电视新闻(消息)不要有导语的论点,提出了我独到的见解,深入进行有事实有理论的论证,引起了学术争鸣,推动了电视界对这一问题的学术探讨。

1990年7月,浙江出版了我编著的《电视新闻节目创作概论》一书,计21万字,印数五千册,作为我向本校新闻系大学生讲课的代用教材,杭州大学新闻系也作为88级至91级大学生的参考教材,人手一册。在1991年第2期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报《新闻大学》上,刊发了我的论文《试论双通道的现场性——关于电视传播特性的再探讨》,全文七千多字。1991年11月11日,我校学科组和高评委一致通过上报我副高级职称,1992年4月下旬,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高级职称评委会批准授于本人为副高级职称——主任编辑(副教授)。1993年初以来,现实生活的紧迫感鞭策自己要加油,新的科研在等待我,“学海无涯苦作舟”,电视以现代电子技术作传播手段,博采广播、电影、报刊等传播媒介之所长,发挥独特优势,使一件新闻、一个节目,在事件发生

的同时就能轰动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这一年年轻的艺术尚有许多课题有待于我们去攻克!

想起个人成长史、家史及祖国100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烈为民族振兴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这一代理应继往开来,把一切献给党!

赵日良,男,50岁,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毕业;现在是吉林省黄泥河林业局森防站站长(副处级);森林保护高级工程师;延边州林学会森保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赵日良同志三十年来精心从事森林病虫鼠害的防治研究,吉林省研究森林鼠害防治的起源地就在黄河林业局,经过不断的开
实验研究”等课题具有国内先进水平。

《中国林业报》、《中国林业》、《天池》、《南方日报》、《延边日报》等报刊杂志分别报道了赵日良同志的治鼠事迹,誉称为“鼠害防治专家”,在全国林区享有“治鼠大王”之称,为绿化祖国大地,保护森林资源贡献了全部精力。

1976年—1992年,先后有“樟子松人工幼林鼠害的防治研究报告”、“落叶松落叶病预测预报的研究”等23篇论文在国内各级刊物发表,其中“应用杀菌油剂防治落叶松落叶病和枯梢病技术研究”一文,1985年6月被美国农业



“
治鼠大王”
——赵日良

拓创新,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林业森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先后获得了部、省、州科技进步奖的殊荣,经有关专家鉴定

“应用植物不育剂控制森林害鼠生育研究”课题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

“樟子松人工林鼠害综合防治试验研究”和“吉林省森林鼠害综合防治试

部选用,编入《林业文摘》。参加各级各种学会学术讨论会15次,其中获优秀论文8篇,应邀参加了亚太地区兽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应用植物不育剂控制鼠类生育的研究”一文,编入英文版论文集。

赵日良同志勇于进取,不安于现状,为了林业森防事业的不断发展,他现在全力以赴进行“吉林省森林害鼠微机测报管理系统”;“国家林业星火计划项目鼠用复合植物不育剂生产技术开发”;“吉林省林业‘八五’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植物不育剂防治森林鼠害新技术”;“落叶松枯梢病抗病性优良单株选择测定及繁殖利用”和“落叶松落叶病免疫功能及抗病育种”的研究推广工作。并为自己制定今后几年科研目标,准备把林业星火计划项目“鼠用复合植物不育剂防治森林鼠害新技术”由东北、内蒙古的应用推广扩大到全国林业。并进行“鼠用复合植物不育剂从林业扩大到农田,草原的鼠害的防治”和“植物不育剂防治多种主要鼠害技术”等课题技术的研究。

由于赵日良同志在科技领域中辛勤努力,坚韧不拔,荣获了多种荣誉。

“樟子松人工林鼠害综合防治试验研究”,1983年获吉林省林业厅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1984年获林业部,吉林省人民政府科技成果三等奖;“百磷油剂烟雾技术防治落叶松落叶病的研究”,1989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3Y—35型烟雾机”1989年获浙江省林业厅科技进步三等奖;“吉林省森林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1992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应用植物不育剂控制森林害鼠生育的研究”,1992年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1年获延边州林

管局科技成果一等奖；“东北林区林木鼠害生态控制技术的研究”，1993年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1年12月林业部鉴定，“落叶松苗木及十年生幼林枯梢病防治技术”，1992年12月经省级鉴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省、州局的表彰奖励；1983年出席全国农林科技推广工作会议，被评为先进个人；1984—1992年连续被评为吉林省林业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吉林省森林保护先进工作者。1992年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家特殊津贴。《鼠用植物性复合不育剂应用技术》，1993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1993年有三项科研成果被编入《中国实用科技成果大辞典》；个人小传被编入《中国当代科技发明家大辞典》。

（吉林省黄泥河林业局供稿）

一、启蒙教育

我于1936年出生在楚门镇。童年在兵荒马乱中度过，难忘的头一件事就是全家老少到小竹岗济理寺，燕几山头逃日本乱，幼小的心灵埋下抗御外侮、民族自尊的种子。为表达抗日决心，胞兄把我原名日华的“华”字，改为“槐”，此名沿用至今。我爱故乡山河，更爱故乡人。上小学时，有幸受到进步教师冯云萍、林小仁等老师启蒙教育，吸收我加入少年儿童团，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儿童团经常在我家印发传单，开会。林老伯（林存邦的父亲）也常来转运物资支援前线，为革命作出贡献。解放前夕，儿童团活动更加积极，我们自发滚草龙到凑钱做布龙、演戏、篮球赛，宣传革命道理，丰富城乡人民文化生活。楚门解放了，我们立即送慰问信、送鸡蛋慰劳子弟兵；组织篮排球队到栈台与驻岛解放军联欢……用实际行动拥护诞生的新政权。1950年我在玉环中学（现楚门中学）首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时，我与陈荣华等三人被选送到温州地区第七期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凡塘乡工作。那时，乡民听不懂何玉才同志正宗的山东话，我充当“翻译”，土改结束后，我回校学习。

我的回忆

● 赵日槐



二、蹉跎岁月

建国初，国家财政处在困难时期，困境中我考上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

学)。当时，多数学生自费入学，我享受甲等人民助学金的待遇，解决了后顾之忧，激励我勤奋学习。1959年11月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安排，分配到长白山林区筹建朝鲜族自治州延边林学院，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吃榆树皮、喝糖渣汤，度过了极其艰苦的日子。1965年响应林业部开发金沙江林区建设大西南的号召，正当林业生产蓬勃开展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而来，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注定了我是双料的“黑五类”，造反派给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批斗”、“监督劳动”达三年之久。1970年组织用我一技之长，调我到林业指挥部营林处，担负紫胶林场建设重任。党的信任与文革中的屈辱成为我前进的动力，我带领工人战天斗地，“三块石头一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在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推土造地、挖坑种树，加强扶育管理，仅用三年的时间建成了紫胶林，生产紫胶种八万余斤。1975年中央林业部、外贸部、商业部在我市联合召开全国紫胶生产经验现场交流会，高度赞扬我场多快好省地发展林业，艰苦奋斗办林场的创业精神。在生产建设中依靠科学技术；在实践中又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几年来与中国林业科学院紫胶研究所紧密配合，完成林业部下达“紫胶寄主树良种选育”等课题，应邀到全国紫胶生产培训班上讲课，增加我学术造诣，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三、报效祖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澄清是非，拨乱反正，极大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1980年科技人员技术职称恢复后，我被市、省政府首批聘为林业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83年担任

攀枝花市经济林木处副处长职务，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根据地区垂直气候明显的特点，本着因地制宜，全面布局，分类指导，发挥优势的原则，实行农林立体综合开发，大搞多种经营，在林场推行承包责任制，利用林间空地套种香料、甘蔗等作物，生产原料办香料厂、糖厂；邻近市郊区办花木场，引进南亚热带名贵花草苗木，提供城市园林绿化需要；高海拔山地建果园，从辽宁、浙江等地引进苹果矮化中间砧，进行嫁接换种矮化密植试验，获得优质丰产的好效益；低海拔坡地引种芒果新品种，经过多年培育，筛选象牙芒等8个品质优良、高产耐贮的良种，推广定植万余亩，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几年来，在全国、省、市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5篇；《金沙江干热河谷区荒山造林技术研究》等论文，编入《四川省民族经济研究论文集》；13篇论文编入《攀枝花市科技成果论文题录》；“四川省紫胶林引种及生产技术研究”课题，获省科技成果二等奖；中国林学会授与“劲松奖”。历任市政协二、三届委员、常委，市林学会理事，市园林学会理事。1988年调九三学社攀枝花市委员会秘书长职务(驻会)。积极参与参政议政、科技咨询、智力支边、社会办学。兼任九三学社创办的金江实验大学常务副校长，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政府授予市级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对我极大鼓励和鞭策，我将在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地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



化工设计战线上的
高级工程师
- 胡德慧

胡德慧，祖上从乐清移居我县城关镇，1954年毕业于杭州化工学校温州分校机械专业，1954年分配到北京化工设计院工作，1955年1月至1957年7月派驻吉林跟随苏联专家，进行吉林电石厂设计工作，1957年~1958年12月，在北京有机设计院负责进行电石通用设计工作，1959年1月至1960年9月，在北京化工二厂进行空气制石灰氮及丁纳橡胶的小型工业试验获得成功，1961年1月调武汉化工四院任科长、工程部主任、总工程师，1966年提升为工程师，1987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二十多年来，胡德慧在设计方面，成绩突出，1958年所作的2万吨/年电石通用设计得到化工部通用设计奖，1966年由胡德慧负责，根据国外专利资料参考，从零开始，设计一套国内联合的空分—氮联合装置，用于新疆建设兵团化肥厂，该装置达到并超过当时的国际同类装置的先进水平，投产后获化工部优秀设计奖，由胡德慧参加的绍兴化肥厂节能改造设计获化工部科技进步奖；镇海尿素设计获国家科技奖；辉县千万吨/合循环尿素设计获科技进步奖。

此外，胡德慧还对葛店化工厂操作手册和4万吨/年（水溶液合循环法）尿素装置操作手册等的编写和审定工作。

（本刊辑）

刑法学家
高铭喧教授



高铭喧，男，1928年5月出生，汉族，浙江省玉环县人。1947年考入浙江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学习，1953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1956年评为讲师；1980年评为副教授；1983年晋升为教授；1984年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我国刑法专业首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984年被国家科委批准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年专家称号。1983年—198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专业博士点召集人、法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法学组召集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法学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中国检察学会顾问，中国法学海峡两岸法律问题研究会顾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吴玉章基金会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顾问，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丛书编委，《中国法学》编委，《公安研究》编委，中国人民大学《法

律学习与研究》编委会主任,《法学杂志》主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编委兼刑事审判卷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上海法律专科学校特聘教授,郑州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等社会职务。

高铭喧教授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法学家。他从1954年起到1979年,自始至终参加了我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刑法》的立法原意有准确而深刻的把握。他于1981年出版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确切地阐述了我国刑法典的制定过程及其涵义,成为刑法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工作人员学习、研究和运用刑法的重要根据,受到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广泛好评。近年来,他还应邀参加了国家立法机关一系列法律和国家最高司法机关许多司法解释文件创制过程中的研讨和咨询工作,较为充分地发挥了法学家对国家法律制定与司法决策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高铭喧教授治学严谨,勤奋、务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方向,积极提倡并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刑法学科学的理论体系,注意不断探索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新问题。他在刑法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如关于刑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观点,关于犯罪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的见解,关于刑法因果关系、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刑罚目的与刑罚属性的区别的主张,以及创立军事刑法学的建议等,都在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他近年来勤于耕耘,著述丰硕,个人撰著、主编和参加编著的专业书籍二十

余种,在中外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七十多篇,总字数达两百多万字。其中,他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自1982年出版以来,迄今已印行十多次,印数逾百万册,成为全国政法院校和司法机关学习研究刑法的必备书籍,1988年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奖;他主编并于1986年问世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是我国法学领域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学科文献综要性著作,为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总结与进一步开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对我国法学其他学科的系统总结与创新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与王作富教授共同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首次对刑法领域的几十个重要专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相当深入的研究,1991年荣获光明杯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由他主持并正在出版过程中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刑法理论与实践》,力图从深度和广度上显著地推进我国刑法学的研究。

近四十年来,高铭喧教授一直处于教学第一线。他授课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而鲜明,逻辑严谨,语言通俗,阐述论证深刻,授课中注重结合立法与司法实际,注意综合、评述最新的学术动态。由于教学态度认真,教学艺术出色,教学效果显著,他的教学经常获得广泛的赞誉,他因此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授课教师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优秀主讲教师。

高铭喧教授十分重视对研究生的培养和对青年法学工作者的扶持。近年来,他与同事王作富教授等联合招收和培养近六十名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和研究生班研究生,并摸索和总结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指导与培养刑法研究生的方法,他们

的经验受到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的肯定，并为兄弟院校的同行专家、教授所称赞和借鉴；他从1985年2月起至今已招收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12名，其中已有6人获得博士学位，已有3人先后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近来，为了进一步提高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高铭暄教授又在探索和试验新的培养方法，并已取得初步的成效。

作为我国刑法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高铭暄教授近年来为全国刑法界的协调和全国刑法学研究会的组织建设、学术活动的开展，为我国刑法学研究与国家中心任务和法制建设的配合，为我国刑法研究的全面开拓与深入进展，作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高铭暄教授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法学要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立足本国实践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还必须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研究、参考和借鉴外部的法学成果与法制经验。因而除了在教学和科研中注意进行中外的比较研究以外，近年来他还比较注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并为宣传我国刑事法制和刑法理论作出了一定贡献。近年来，他先后出访过美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并与来华的英、美、法、德、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的法律专家、学者交流，切磋研究成果，互相介述各自的刑事法制与刑法理论。他曾在1987年5月于意大利锡拉库常举行的死刑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在不少与会的西方国家代表废除死刑的主张一边倒的呼声，鲜明地阐述了我国保留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主张及其充分的实际根据，响亮地提出了应当着重为社会不受犯罪侵犯而奋斗、文明与否不能以是否废除死刑

为标志的正确见解，打破了会议上一度出现的废除死刑论的垄断局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于宛）

（原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2期

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

- 徐元植 -



徐元植 (Xu Yuan Zhi), 男, 浙江省玉环县人, 1933年5月出生于温州(市)。1951年毕业于温州市立中学(现名温州二中), 应届考入北京大学化工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入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1955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1953年由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成立北京石油学院)。应届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现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1979年晋升为副研究员, 1980年调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工作, 并协助卢嘉锡教授指导研究生。1984年调浙江大学化学系任物理化学副教授, 1987年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物理学会波谱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波谱学杂志》编委, 浙江省化学学会理事, 国际磁共振协会会员, 国际《应用磁共振》(App Lied Magnetic Resonance)杂志编委。

徐元植教授治学严谨, 虽然是学石油化工出身, 但他一直认为: 要培养出高层次的科学技术人才, 必须要有扎实的数、理、化基础。他自己的成才过程就是一个例证。当他于1960年转向从事属于物理学和理论化学领域的“电子自旋共振波谱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时, 从一开始就加强自己的数理

基础的学习。否则, 他认为: 只能使自己变成谱仪的操作者, 而不可能成为波谱学专家。尽管文革中断了十五年之久, 仍不失为在这一领域中当今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学者之一。1981年以后,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中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多核桥联配合物的合成与结构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在教学观点方面, 除强调加强基础课的教育外, 力主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他经常在授课时插入与课程内容有关的某些发明以及科学家的故事, 用以启发学生活跃思路, 增强兴趣。

他出身于石油化工, 而早期转向物理化学, 仍具有不浅的化工功底。在七十年代下放期间, 曾主持五十万吨石油化工厂的扩初设计; 帮助改造温州晶体管厂的多晶硅车间生产工艺及装置, 解决技术关键使之正常投产。利用矾浆(矾矿废料)与蛎壳在立上烧制成功超早强水泥。自1976年以后他多次上矾矿、上工厂, 利用他扎实的物理化学基础, 结合生产中的关键, 提出“明矾石高温快速脱水生产明矾联产铝氧的新工艺”, 被列为浙江省计经委1986年重点开发项目, 并获得该项目发明专利(专利号: 86100806.5)。九十年代一开始为了适应市场需要, 研究出可供印制防假冒商标用的热致变色颜料和油墨, 受到广泛欢迎。

八十年代后期, 他更是活跃在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上。1986年首次应邀赴日本爱媛大学作短期访问讲学, 并与石津和彦教授合作“中国淡水珍珠中过渡金属的ESR波谱”研究。同年12月在日本全国ESR第25届年会上, 应邀作“中国ESR研究概况”的学术报告。1987年与北海道大学相马纯吉教授等共同发起, 并在浙江大学组办了首届“中日

双边ESR学术讨论会”。担任大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89年5月应邀参加在意大利皮萨(Pisa)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磁共振弛豫研究工作研讨会”。在会上作题为：“人发的ESR弛豫与人体健康”的学术报告。并被选为第四届会议的国际学术顾问。同年六月应匈牙利科学院中央化学研究所科学顾问A.Rockenbauer教授的邀请，访问了布达佩斯。又应波兰Wroclaw大学化学研究所的邀请，访问了波兰。1989年9月又东渡日本，在德岛大学药学部进行中草药的SOD活性的合作研究。同年11月底作为中方主席，率团(25人)参加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二届“中日双边ESR学术讨论会”。在会议期间，他还提出：“用ESR显微成像的方法研究催化剂表面顺磁粒子分布图”的设想，引起日本同行的极大兴趣。1990年初应日本大阪大学理学部的邀请，与化学系的桑田敬治教授以及物理系的池谷元伺教授进行上述课题的合作研究。不到三个月取得了初步结果。并在日本《化学速报》(Chemistry Letter)上发表了研究简报后，引起国际催化剂和波谱学科同行们的关注。1992年6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在意大利佛罗伦萨(Florence)召开的第六届“国际胶体及界面科学中的磁共振学术研讨会”，并被聘为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催化分会场的主持人。他还接受台湾同行的邀请，作为首批大陆学者，将前往参加台湾区第十届“触媒与反应工程研讨会”。

他始终坚持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虚怀若谷和海人不倦的优良作风。他性格开朗，豪爽热情，坚持体育锻炼，喜欢书法、诗词以及中外古典音乐。

转载《玉环史志通讯》1992年1-2合刊

默默耕耘在文物考古战线

——记温州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徐定水



徐定水，曾用名子飞，祖籍永嘉枫林，1933年12月出生。于玉环县环山镇后垟大坑村(今环城乡环东村)。出身农家，家境贫寒，弟妹五人，排行老大。自幼勤奋好学，但求学道路艰难曲折。七岁进小学，先就读于后垟保国民小学，继入陡门头保国民小学和环山镇中心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玉县立简易师范、温岭县立师范、玉环县立初级中学及温州第二中学。196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历任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助教，温州市级机关干部，1963年调温州市区文物管理委员会，1981年起任温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现为温州市文物管理处副研究员，温州市文物鉴定组副组长，浙江省博物馆学会理事，温州市中共党史学会理事，温州市政协文史委员。

三十多年来，徐定水执着研究文物考古工作，颇有造诣。先后参加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型考古发掘，温州市郊梧埭北宋白象塔清理，泰顺玉塔南宋青瓷窑址考古发掘，温州市县有关古遗址、古窑址、古墓葬的调查和发掘清理等工作。在主持温州市博物馆工作期间，积极征集、抢救大批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以充实馆藏；组织馆内人员，对馆藏近2万件文物进行鉴定、定级，按照科学管理方法，编

造新总帐和分类目录，并对各件藏品进行拍照、制卡，使藏品保管条理化、科学化；设计陈列展览大纲几十个，并编撰了展览文字说明，等等。

与此同时，结合专业，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对古代文物和温州地方经济史进行系统研究，撰写考古、文物和经济史论文数十篇。他在《文物》、《考古》等国家级杂志上发表的《温州北宋白象塔清理报告》、《白象塔北宋彩塑艺术》、《浙江永嘉出土东周青铜器》、《浙江乐清古文化遗址发掘简报》、《青铜耨性质用途考略》等论文，为考古界所瞩目，受到广泛引用；其中《浙江乐清古文化遗址发掘简报》、《温州新石器文化初探》，为温州地方史填补了空白，使温州上古历史推进到五六千年前，被赞为温州史前文化的开山之作。他在《浙江学刊》等杂志上发表的《吴百亨创办实业成功之路》、《抗战时期温州工商业发展的独特道路》、《温州近代钱庄》、《温州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生与发展》等经济史论文，不仅为研究温州近代经济，编撰温州工业、商业、金融业等方面提供了翔实资料，而且为当前发展温州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近年来，徐定水还参加对瑞安境内遗存的西周春秋石棚墓（又称支石墓）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该类石棚墓在日本、韩国均有存在。日本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对温州石棚墓颇感兴趣，曾先后组织四个专家组团来温向其请教墓葬情况，进行实地考察，以寻找日本国石棚墓的文化渊源，并邀请他参加将于明年在日本召开的有关石棚墓问题的研讨会。

此外，在工作中，还注意对青年一代的培养。指导他们进行实际工作，帮助和修改他们的撰写的有关文物文章，使

其增长对各类文物的认识能力。有数名青年同志现已获得中级技术职称。

现在徐定水年已花甲，但仍继续致力于文物考古和地方历史的研究工作。孜孜不倦，躬耕不已。

（本刊辑）

我原名郭鏞森，1922年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坎门镇，笔名谷鸣、菲洛等。1935年毕业于玉环坎门小学。抗日战争开始后即离开家乡，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曾经在浙江云和、平阳和乐清等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后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离开浙江来到当时有大后方文化城之称的桂林，1943年毕业于桂林淮南俄专。1944年在昆明协助中共地下党员，我国著名作家杜宣编辑进步民主刊物《群报》（后改为《评论报》）。1945年曾参加西南联合大学等校的学生民



● 郭一民

一窗昏晓送流年

主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在上海和家乡坎门担任过小学教师和校长。1948年再次离开故乡，在上海《商报》任副刊编辑和记者，直至上海解放之后。1950年3月，应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之聘，离沪北上，任该局翻译，后历任人民出版社、北京时代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编辑，1958年因机构合并，来到我国历史最悠久的老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现为商务印书馆编审（大学教授级）。

解放后在北京四十多年的生活，除1959年下放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平西

老区劳动锻炼、参加社教，1964年到河南林县参加“四清”、1969年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外，基本上是过“亦无风雨亦无晴”的平静书斋生活。

我的文学生活的开始是同对故乡人民的眷恋和对日寇的仇恨分不开的。我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坎门军民歼寇记》（1938年5月发表在《浙江潮》周刊），是关于坎门地区军民英勇打击登陆日军的记实；我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海防线上》（1939年9月发表在《东南文艺》月刊上），是描述日寇海上封锁给坎门一带渔民带来的贫困和痛苦；我写的第一首长诗《红灯》（1940年发表在《前线日报》副刊上），是以理想化的笔触歌颂故乡战前的和平生活，以及以仇恨的心情揭露敌人的凶残。以后，我在大后方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散文如《海恋》（发表在《柳州日报》上）和《憔悴的脸》（《东南日报》副刊上），都是同故乡的山川和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转而从事翻译工作，开始介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文艺作品和社会科学著作，这期间出版的文艺作品有与人合译的苏联瓦西列夫斯卡雅的《水上歌声》三部曲：《沼地上的火焰》、《湖里的繁星》和《河流在燃烧》（分别于1953、1954和1955年在北京时代出版社出版）、苏联穆萨托夫·罗赫杰尔的《代表》（发表在1956年《译文》杂志《儿童文学专号》）、捷克斯洛伐克米纳奇的《弃儿玛尔卡》（1957年2月《译文》杂志）、葡萄牙马莫拉的《少年鼓手》（1960年5月《世界文学》杂志）、保加利亚达斯卡洛夫的《伊列桥》（1960年9月《世界文学》）、突尼斯阿里—马尔基佐的《山洞中的人》

(《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中的一篇,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苏联索科洛夫的《祸起宫墙》下卷(1991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波兰薇拉·霍隆沙雅的《狱中寄亲友》

(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苏联肖尔巴科夫的《北极飞行记》(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即将出版的著作有《罗伯特·欧文传》。

文教、青年修养和社会科学的翻译作品有:苏联果洛达尼可夫的《苏联学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苏联包德列夫的《苏联学校中的共产主义教育》(合译,北京人教社)、苏联捷尔任斯基等《家庭与教育》(合译,北京人教社)、苏联福尔杜纳多娃的《七岁儿童的教育》(合译,北京人教社)、苏联伍任朱莎尼诺娃等编的《农村学前教育工作者手册》(北京人教社)、苏联雅洪托娃编《合译,苏联少先队夏令营》(中国青年出版社);苏联席里雪夫的《友谊就是力量》(中国青年出版社)、《加里宁论青年》(合译,中国青年出版社)、苏联沃尔金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苏联马里宁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苏联《论空想社会主义》中卷(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苏联达林的《论巴贝夫主义》(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苏联扎斯田克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纲》(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布朗传》和人合译的《富兰克林》商务印书馆出版等。

著作和论文有:

《痕迹》(1942年桂林“真理”书店)

《伟大的空想家》(1984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此书曾获《人民日报》和《读书》杂志好评,并在1985年第二届

国际图书节上展出)

《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人物传略》(合著,北京工人出版社)

《罗伯特·欧文传》(北京商务印书馆)

《傅立叶的生平和思想》(1961年8月22日,上海《文汇报》)

《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1962年7月13日《光明日报》)

《梅叶和他的〈遗书〉》(1980年5月《读书》杂志)

《吕瓦房尼之谜》(1982年10月《读书》杂志)

《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出版情况》(《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第1期)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代表作》(1987年《国外政治学》杂志第二期)

《圣西门学说释义介绍》(198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一部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著作》(198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皮佑选集〉中译本序》、《德萨米〈公有法典〉中译本序》

《德尼·维拉斯〈塞瓦兰人的历史〉中译本序》、《格雷〈人类幸福论〉中译本序》(以上各书中译本序均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以上出版的译著,是“一窗昏晓送流年”中的产物,是我的平静生活中的一朵浪花,是我的漫长生平的一道轨迹,同时也是我的传略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3年除夕



● 郭心晖

我的
简
历

我是玉环坎门镇人。1916年9月18日出生时，母亲(马智音)仅20岁，体质娇弱又难产，昏迷多时才抢救过来。那年父亲(郭云观)在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官费留学，首途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我的名字取自孟郊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一直牢记庭训：生辰乃是父忧母难日”。

儿时，母亲常带我乘船去温州百里坊外婆家。至今我仍记得外婆家的房屋庭院和临街的眼药店“马银潢”。大舅马孟容、二舅马公愚都是书画家。我喜欢看舅舅挥毫作画，为他们铺纸磨墨，也曾梦想自己将来成为书画家。

我在10岁前，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我家几度迁徙，曾在北京慕贞小学、温州模范小学读书，1927年6月毕业于坎门女子小学。1928年秋，我考入北京贝满女中初二。当时父亲任燕京大学法律系主任。1933年我从贝满高中毕业，被保送进入燕京大学国文系。父亲已于前一年调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1935年我转入心理学系，1937年6月毕业，文学士，并获得金钥匙荣誉奖章。

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我积极参加两次示威游行及抗日伪宣传工作。我和同学们组织“一二·九文艺

社”，集资出版进步刊物《火星》、《青年作家》，并担任《燕大周刊》编辑工作，与赵荣声(工人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已离休)、周游(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已离休)共事。从那时开始以笔名“郭蕊”发表诗歌散文。(“一二·九诗选”，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辑入我当年的作品《归来》)1936年秋，我曾为海伦·斯诺译出《中国的伏尔泰》一文，辑入《纪念鲁迅逝世专刊》。

三十年代心理学系最受欢迎的课程是“心理卫生”，全校学生可以选修。专业课程则有实验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我初次读到马克思《资本论》英译本是在心理系图书室。心理系主任由校长陆志韦教授兼任。他把汉语规范化及语言与思维问题列入科研项目，希望我将来能成为他的助手。我的毕业论文即为《儿童语言之研究》，在《心理学报》1937年1卷4期发表。“七·七”事变后，我无法北上，在上海工部局女中任文史教师。1940年7月我与燕大同学张芝联(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全国政协六、七、八届委员，民盟五、六、七届中央常委)在上海结婚。他曾主编《西洋文学》杂志，我也在业余从事翻译诗歌小说。

1941年8月我俩重返未名湖畔。他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系。我在母校任图书馆中文采访部主任兼哈佛大学图书馆驻平采访处主任。当时宋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译丛》主编)和孙道临等组织“燕京文学社”。我俩也参加该社，并在“燕京文学”上发表作品。想不到四个月后即爆发震撼全球的珍珠港事变，日军强占校园，燕大被迫解散。陆志韦校长和师生十余人被捕入狱，孙道临也未能幸免。

1942—1944年底，张芝联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我则担任辅仁大学几个女生的家庭教师。1945年1月，张芝联的老父（张寿镛，1876—1945，光华大学校长）病危，我俩急忙返沪。1946年张芝联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1946—1948年我在光华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外文系讲师，业余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散文。我父亲以“上海高等法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在光华大学主持法律系。

解放初期，张芝联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我因照顾幼小的女儿，仅1952年在中央贸易部高级商业干部学校任讲师半年，大部分时间从事翻译工作及北大家属委员会工作。1957年3月起，我在北大外国留学生班任教，1964年转入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讲“中国历史文选”。1969—1971年曾和历史系大多数师生在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两年。返校后，因病休养一年。养伤期间，与张芝联合译《戴高乐将军之死》（商务，1973年，1990年）。愈后，为工农兵学员讲授“古代汉语”，并与工农兵学员合作，注释汉代思想家王充《论衡》（中华书局，1978年）。1980年我编注《中国历史文选》上下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内部发行。同年，职称评为副教授。1982年初，因左腿股骨颈断裂，休养半年。愈后继续授课。1985年右腿骨折，1986年正式退休。

养伤期间我以笔耕自娱自励。退休后更倾注心血，为先师亡友们撰写报告文学，使他们感人的事迹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共鸣。我为韩素音翻译悼念老同学龚澎的文章《中国建设》1985年10期）又为张芝联的业师张歆海夫妇撰写《天涯赤子情》（《人物》1986年3期）博得好评，《新华文摘》立

即转载。我更不会忘记舅父们的音容笑貌，写了《书画传家三百年》（《人物》1987年3期，纽约《海内外》1987年56期转载）。1991年初，我自费出版了诗文集《人生·友谊·爱情》约十餘万字，大部分是1982年以后发表的作品。

1986年以来，我担任《燕大文史资料》编委。我以半残之躯，笔耕不辍，并扩大范围，为健在的科学家撰写传略。我仍喜欢写些抒情散文。来日有限，珍惜夕阳晚霞。

我走过的路

● 黃岳云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iddle-aged man with dark, wavy hair, wearing a dark suit jacket, a white shirt, and a dark tie.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a mottled, light-colored texture.

苦难的童年

我是1935年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出生在环山镇西青街一个穷苦贫民家庭。初小一二年级是在天后宫西青小学念的，三年级时才转入环山小学。在我10岁那年冬天，父亲因病去世，我也因缴不起学费而休学，由一个善良好心的表叔把我带到海山乡他家过了一年，回来后在街坊邻居的关心下复学。此时由于国民党十分腐败，通货膨胀，货币急速贬值，所谓的“金元券，一夜去一半”，为了保值，学校无奈把收学费改为收“学米”，我记得当时小学高一是缴18斤大米，校方同情我家穷减半，只缴9斤，可是我家当时连红薯干都吃不上，由于缴不起9斤学米，读了半个学期被校方勒令退学，这是我在旧社会，念一个小学就休学了两次还未毕业。此后，年仅11岁的我只好靠砍柴、打短工、做小贩、卖甘蔗、荸荠，和我母亲两饱一餐、饿一顿的过着极其艰辛的岁月。

党和人民培养了我

好不容易，挨到了解放，我首先参加了“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担任我镇儿童队大队长，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改变旧

风俗，我积极参与组建“环山少年剧团”到各乡巡回演出。1951年家乡土地改革，我家分得土地和房子，我才翻了身，并被破格选为我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我哥哥在人民政府工作，生活也较为安定。我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花了半年时间完成了小学的学业，随后考入楚门“玉环中学”。当时我们玉环城里没有中学，解放前只有一所“简师”即初级师范，解放后也停办了。因此解放初我们上初中都要翻山越岭渡海峡去楚门，当时县里又没有高中，我初中毕业后考取温州一中（当时玉环属温州地区）在我高中快毕业时，正是整风反右斗争，我哥哥被错划成右派，在那阶级斗争上纲上线的年代里，尽管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历任学生会主席、温州市学联会主席、团干部，但我哥哥政治上的遭遇和不幸，给我带来严重影响，高考时的第一、二、三志愿都不能录取我，后来据说还是看在我本人表现突出，才录取我在“浙大”机械系就读。

艰苦的大学生涯

我进浙大时，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年代。在政治上，因为我哥哥是右派分子，被开除回家。当时学校对录取我又产生了争议，一种意见要把我退回去，好在也有坚持党的政策的好同志为我说话，于是决定暂时留我下来，与全班同学一起先去半山参加筑铁路劳动，这对我从小苦惯的人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我劳动表现很好，两个月后回校，方让我办了注册手续。生活上，由于当时浮夸风的影响，到处食物奇缺，伙食标准直线下降。

1960年教育改革，决定把我们专业的全体师生和浙江机

专师生一起合并到浙江农大去，成立农机系，下设三个专业(机制、机化、电气化)，当时又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生活极度困难，每餐饭都没能吃饱，每月每人只有三两食油，经常是“瓜菜代”还吃“小球藻”。同学们一下课，就围在一起“精神大会餐”即饿得太难受了，就学阿Q画饼充饥，专讲吃。一天中午，在浙农大池塘庙食堂我曾创造过29秒钟吃完四两烂糊面的记录，现在听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真实的。一个路桥的同学下自修就高喊“什么时候能吃饱饭，就是人类最大的幸福！”可想而知，当时饿肚子的境况，社会上许多人因营养不足而得浮肿病，也有许多人饿死，现在有些年轻人不爱惜粮食、包子、馒头吃不完乱丢，以显示自己慷慨，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当时家境较好的同学，有时就买点“盐水萝卜”充饥，而我在大学五年，家里无法给我寄一分钱，我那份糕点票几乎全部送给有钱的同学，我在班是最贫困的，就靠甲种人民助学金吃饭，每月两元钱另用。因此每到暑假，其他同学兴高采烈地盼着回家改善一下生活，而我家难归，到处找临时工做，去学校实习工厂，或去杭州园林管理处劳动，赚几个钱，开学时好添补衣服和日常用品，当时从杭州到玉环回路费只要20元，我因为太穷了，在杭州读书五年没有回过一次家，在我们系里也是唯一的了，直到大学毕业，同学借给我路费才回了一次家，我的第一次工资就是还债，在大学五年期间，得到家乡许多亲友、老同学的关心和支持，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借此机会再次谢谢家乡的亲人。

“文革”中的磨难

我是1960年7月在浙江农大入党的，1963年分配来南昌

原“八机部南方水田机械研究所”工作，当时单位领导也十分器重我们新来的大学生，一年实习期满按时转正，并提拔我当课题组长，不久又提我任研究室副主任，1966年正当我带一组同志深入农村和工厂研制“新建铁犁”、“全喂入脱粒机”等项目时，本想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报效祖国，报答人民对我的培养，谁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里把我从工厂抽回去主持室里的运动，并担任所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文革组长和我都挨批斗，并把我也列入大大小小的当权派行列，被勒令下工厂劳动。当时全所科研工作陷入瘫痪状态，我是白天和所长、书记们一起下车间劳动，晚上写交待材料，有时去陪斗，直到7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造反派感到像我这样刚出学校门就进入单位门的人，家庭出身又好，又无海外关系，再不解放出来，自己也要犯打击一大片的错误，于是先把我解放出来，叫我管一下科研业务工作。不久工宣队、军宣队同时进驻我们这个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研究所，当时叫“掺砂子”，紧接着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开始了，“查反标”，“挖反革命”，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一个小小的研究所被隔离审查的人一大片，活活整死四个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留下了血的教训。幸好，我当时被派遣去搞一年多的外调工作，尚未介入犯罪，这不能说是我的高明，只能说是人生的机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科研工作才逐步转入经常化，才让人们干点实事。

我的主要技术业绩

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多半的精力不是用在科学研究、生产建设和发展经济上，只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人们才安下心来做点发展生产力的工作。

在“文革”前，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1964年春夏组织并参加了大型的进口农机具田间对比试验，并任测试条件组组长，这是原八机部经周总理批准引进国外38种小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机具，在江西向塘农机鉴定站做集中对比试验，这是我国一次规模较大的选型试验，为我国后来发展国产拖拉机和农机具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二是1965年至1966年我任半机械化组组长期间，带领课题组成员深入工厂、农村蹲点研制了“新建铁犁”等四种小型农机具，其中经我主设计的“新建铁犁”很受农民欢迎，推广量达几十万台，并出口毛里塔尼亚，全国评比获三等奖。

“文革”中后期(1968~1973年)下放工厂，任连长(厂长)主持组织开发了江西省第一台NJ-130方向机、NJ-130汽车变速器、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的全套齿轮生产线，组织自制14台专机，创建了“江西方向机厂”。经我具体参与解决的技术问题有：“壳体稀土球铁铸造”，在无镀铜条件下的“球面蜗杆内孔防渗碳工艺”、“摇臂内锥孔尖齿花键的加工方法”、“加工球面蜗杆的盘式铣刀的试制”、“调整螺钉的改进设计”等项目均获得成功，并用于批量生产。

1973年，为了加强科研工作，领导把我调回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经我组织研制并通过省、部级鉴定的科研项目有：南方系列水田犁、南方系列水田耙、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配套农机具、IPS水田耙耕平地

机、CLB-3-25耕耙犁、IBQ系列水田驱动耙。

1980年任省农机研究所副所长期间，组织并参与研制了“山猫装载机”、“1000型工厂化育秧成套设备”、“农用机动三轮车”。

1984年调来情报所后，应邀参加过两项国家课题，作为专家咨询组成员。一是“全国农业机械化预测课题”；二是“机电一体化发展途径与对策的课题”；为了更好地为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服务，组建了机械标准情报室和全省标准情报网，深受企业欢迎，得到厅领导赞扬。

三十多年来，我参加过的重大科技活动有：1974年在全省农机学会年会上作过题为《国内外耕整地农机具的现状 & 发展动向》的报告；1977年参加北京机械部主持的“全国农机基础理论规划座谈会”，并任耕作机具组副组长；1978年参加北京十二门农机展览会，并任机械部第26对外技术座谈组组长（即主谈）先后与日本“东洋运搬”和“松山”两株式会社、“日本农机化研究所”等三个单位的专家作了技术交流；1979~1980年11月代表江西与日本“群士”“佐滕”两株式会社洽谈技术引进和合作试验，并在江西“进贤日本农机试点”与日方技术人员合作试验一年半，任农机试验组组长；1982年底参加机械部组织的《中国农机试验鉴定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先后到东京、盛岡、北海道、京都、大阪等地考察了工厂、大学、研究所等18个单位；1983年5月在江西弋阳“全省农机情报工作会”上作了题为《日本农机试验鉴定方法及科研动向》的报告。

获奖情况和主要著作

我主持组织和参与研究的科研项目中，获省科学大会奖

1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2项；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3项，部科研成果奖二等奖2项。本人负责主审的科技刊物有《江西农机》、《农机内参》均获得情报成果奖；《江西农业机械化综合区划报告》获省优秀区划二等奖。

主要著作有：本人独写的有《对发展南方水田拖拉机的几点看法》、《国内外耕整地农机具现状及发展动向》、《机械工业必须是农业工业化的支柱产业》等10篇，承担主审的有：《江西省农业机械化综保区划报告》、《江西农机》、《农机内参》、《江西机械简报》等几种科技刊物；与人合写的有：《赴日考察报告》、《江西省机械工业2000年优先发展行业和质品的预测报告》；与人合编的内部交流资料有：《技术转让和设备引进实用资料汇编》等。

本人任职情况是：1965年任研究室副主任，1969年任厂长(当时叫连长)，1973年任农机所耕整地机具研究室主任，1980年任江西省农机研究所副所长(副处级)，1984年任江西省机械工业情报所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1991年任所长(正处级)。技术职务是：1980年获工程师职称，1987年获高级工程师技术职务。社会职务：担任过江西省农机学会、省情报学会、省金属切削协会常务理事、江西省科技进步奖评委、江西省工程系列中级技术职称评委。

几点感受

回顾自己走过人生坎坷的路，根据沿途所见所闻，最后谈点个人体会，供青年同志参考。

首先，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部分“动”“变”观是个极其伟大的发现，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组成的，物质是变

化运动的”。我国古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毛主席也曾说过“好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坏事，坏事也可在一定条件下变好事”，大体都是这个道理吧！这个观点启示人们，事业顺利时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时，不要得意忘形，狂妄自大；当遇挫折，失败时，也不要过分悲观消极，更不要自暴自弃，要懂得“悟以往之可鉴，觉未来还可追”的道理，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运动的。

其次，我认为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人，从小就要培养人的独立生活能力。我在10岁时就开始天天为生计而奔波，历经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在物质生活上，是吃红薯干、蟹酱卤、烂子麻(海涂上小甲壳动物)长大，因此后来大炼钢铁、筑铁路。1960年的饥饿、农机田间试验以及政治运动中的受委屈，都顺利地挺过来了，我认为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但我决不妒忌，只是有点担心，父母包办太多了，孩子的依赖性就强，碰上突发事件，他就束手无策。有人说现在是九十年代，好像讲艰苦奋斗是过时货，我不以为然，我有个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告诉我，她初到美国时，一天早上有个只有7岁的小女孩敲她的房门，说自己是推销报纸的，保证每天按时送到，动员她订报，当时我的同事想，这孩子家一定是美国的穷人，她带着十分同情的心情订小孩一份报纸，时间一久，进而了解，原来这孩子家是个大富翁，后来她知道，美国虽然经济高度发达，生活很富裕，但十分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

第三，要想事业上有所成就，勤奋是基础。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并非一看到苹果掉下，就发现一个重大自然定

律那么简单，而是在勤奋学习的基础上，付出艰辛劳动才获得的。像我们搞农机研究的人，有的为了研究犁体曲面，如何适应各种土壤翻耕做到耕作质量最好，能耗最小，付出毕生精力；就是办厂接业务吧！也不简单，机遇是有的，但更主要的是勤奋。有个业务员告诉我，他初任此职时连续出差6次没有订到一份合同，当时真是有走投无路之感，但他不气馁，认真总结经验，不辞劳苦，第七次出去才订到第一份合同，这一切都说明天上掉下馅饼的事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你也要比别人起得早，方能拾到。因此说，勤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



董南才同志的戎马生涯

董南才，1922年出生于本县沙鳊乡小湾村，因家境清贫，读完高小便辍学在家，跟董仲升先生补习语文、数学、英语，阅读进步书刊。1937年冬，经仲升先生介绍去平阳山门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因形势关系，学校提前结束，董南才则随军北上。

1938年4月，新四军先遣支队组成，粟裕任司令员，南才同志在司令部作参谋工作，跟随粟司令率队挺进江南，在广大的敌后地区展开游击战争。1939年9月，粟裕调江南指挥部任副指挥，他也跟随粟裕司令去江南指挥部工作。

1940年1月董南才在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中途留队担任副政治指导员，经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年5月任新四军七师五十六团二连政治指导员，与连长一起奉命率队渡江，投入恢复、发展皖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南陵、繁昌、芜湖、宣城、泾县、铜陵等县，在近五年内与敌伪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共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余次，经过立足、巩固、发展的几个阶段，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部队也由一百多人，发展到二千余人。

解放战争期间，董南才在华东野战军工作，转战山东、

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参加了淮北阻击战，莱芜、南麻、临朐、豫东、淮海、渡江、解放上海诸战役。上海解放后，组建海军，董南才任华东海军训练团副政治委员。1950年为组建空军，又调任空军十六师四十六团政治委员，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他调任空军十六师任政治部主任。1957年10月去解放政治学院学习。1960年，南才同志转业地方工作，先在上海科技大学、机电一局、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药物研究所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1984年离休，董南才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本刊辑）

不像自传的自传

~~~~~

### ● 董楚平



自传自传，自己传自己，颇似卖膏药。今年全国报纸普遍扩版，原因是要增加广告。打广告其实就是卖膏药，当然，只要卖的是真药，亦无不可。

我从小口吃，但从坎门小学、玉环中学（今楚门中学），到温州师范，都得过全校演讲比赛冠军。平时结结巴巴，一上台就口若悬河。场面越大，听众越多，舌头就转得越灵活。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神力暗助。1990年7月，浙江省社科院评职称，凡年限未满而要求提前晋升的，都必须在大会上作自我介绍。我当时距评上副研只有三年多（按规定要五年），要申请正研，必须上台摆成果。我的主要障碍是没有大学学历。我不回避这个问题，一上台就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第一篇史学论文发表于《历史研究》，第一篇文学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就在两大学科的最高刊物上发表处女作，为全国少见。”三言两言，抓住要害，就把自己的主要障碍给扫除了。当场进行民意测验，我得的票数最多，职称也就上去了。有些电视广告，美人头放了老半天，还说不清产品的主要优点在哪里，不知是在推销产品，还是在推销美女。

但是，我卖膏药也有失败的纪录。1957年只卖了点小膏药，就出了个大霉头。从此在温州农村沉默了二十多年。

1980年3月底，《历史研究》编辑部突然发来电报，要我立即赴京。我先乘轮船到上海，再乘飞机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见世面。当时的心情比1990年第一次出国还要兴奋、激动。乘飞机的前夕，我住机场招待所。闲着没事，到候客厅散步。当我走到红地毯旁边时，突然迟疑起来，不敢踩上去。幸亏后面来了一对情侣，他们连看都不看地毯一眼就踩了过去。我这才跟了上去，体验到刘姥姥的喜悦与尴尬。

自从踩上那快红地毯之后，命运之神就不断向我送来鲜花。1980年11月下旬，我从温州永强中学调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90年8月，我发起与组织“首届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1991年，赴日本参加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会后到学习院大学讲学。1992年，当选为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1992年8月，日本十多个单位联合组织“亚洲文化研究课题”，邀我参加。

我年轻时候，热衷政治，壮怀激烈，现在却在古书堆里讨生活，爬爬梳梳，乐此不疲。我今年完成一部《吴越徐舒舍文集释》，在扉页与后记里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楼内楼”。出版社同志跟我开玩笑：“你什么时候当上老板的，怎么不请我们吃酒？”我说，“楼内楼”只供应白开水，要吃酒请上“楼外楼”。上星期，我到北京参加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编撰工作会议，李瑞环、薄一波等同志到全国政协礼堂接待我们（详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1993年1月7日第1版）。如此看来，古书堆工作并非可有可无。我

这想法或许是阿Q精神，但它支撑着我（也许是阿Q）继续在古书堆里干下去。

生命有限，学海无边。少时候跟熊陈琳同学在坎门后沙学游泳，第一次下水就下到较远的地方，熊陈琳说我胆子大。现在，年近花甲（1934年5月3日生），还在知识的海滩上戏水。看来，扬帆远航，只能寄希望于年青同志了。

#### 编者按：

国务院为表彰董楚平同志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特发给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1月15日

杭州楼内楼

我原名董服官，1950年改为董舒林，1922年出生于城关斗门头村。

1935年环山小学毕业后，曾在县民众教育馆办的补习班学习，同时和同学董南才、陈昌镛、胞弟董服伺等约六七人组成烽火读书会。某晚曾和杨炎宾等数人到城隍庙和中山林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政府“9·18事变”后的不抵抗政策。

1936年夏考入温州联中，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温玉间海上交通停顿，被迫休学在家。1938年1月，我大病才愈，即奉父命随吕平、柯爱菊、朱荷香等人作为玉环第一批青年赴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4月，学习结束，因健康欠佳，无法和董南才、陈增佳等一起随军奔赴前线。返玉环后，父亲命我到坎门渔民俱乐部任图书及乐器管理员。

1938年8月底，再赴温州联中复学。9月，参加“突击读书会”，同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寒假中，温州三个中学（温中、联中、瓯中）的民先队员共20多人，集中一起，每天由胡景珵给我们上课，讲革命道理。

1939年2月，联中训育员林保城先生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填表用的是假名“盛芳礼”。该年上半年曾参加校宣传队到永强、瞿溪一带作抗日口头与化装宣传。不久，

## 我的小事



● 董舒林

温州遭日机轰炸，学校停课。下半年，学校迁到郊区头陀寺复课。该学期我被选为学生会学术股长，编辑校刊《突击》。

1940年上半年，学校迁回温州市区，我已是毕业班学生，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和温州市学联会主席，又兼级长，工作十分忙碌，无暇兼顾功课，致使暑假统考时未能考取温州中学高中部。

由于日寇不断在东南沿海扰乱和进犯，高中阶段使我先后换了三个学校：上海君毅中学（内迁在义乌）、省立临中三部（在常山）和福州高中（在福建沙县）。高中毕业后曾在沙县县中任教半年。这以后曾在环山小学任教。

温州联中毕业后，曾三次找地下党单线领导人陈其家，均未找到，进了高中后，写信到他家，也没有得到他的回信。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解放后胡景珵同志作了证明。当时陈某不在温州。1944年上半年我在温州联中教导处工作时，曾碰到陈某。陈某说自己曾被捕并为国民党利用做事（实为叛徒），我便不与他多说，过几天我即离开温州联中，住在庄菊人先生家，温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1945年我考取国立英士大学。在校中积极参加历次学生运动。1947年曾与同学黄岑（解放后曾任福建省电视台台长）作为校代表赴沪发布新闻，阐明学运情况。1948年我当选为校学生会秘书。1949年1月，与地下党接上关系，3月，接受地下党特派员朱育茂同志指派的任务。4月，在金华通过地上交通站参加金萧支队第八队大队。7月，在上海青年报工作。不久参加华东局办的华东新闻学院讲习班学习，11月学习结束，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部队去。1950年出国赴朝，

参加朝鲜东线第一次（两次战役，东线是第一次）战役，以后又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阻击战，在部队主要是担负火线新闻报纸的编辑与采访工作。1952年回国。改为训练教育与宣传工作。在部队曾受通报表扬二次，立三等功二次。

1958年4月转业到杭州，主动要求到中学任教。1986年3月离休。1987年省委批复党龄自1949年7月1日起算。1992年7月，杭州市委批复恢复1939年2月到1949年7月之党籍，党龄自1939年2月起连续计算。参加革命时间自1938年9月参加民先时算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先后写了有关鲁迅研究、教育史、青运史方面的论文数十篇，分刊在北京、天津、杭州的书刊报纸上。编写《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中《鲁迅在杭州》，该书为大型丛书，共五辑六本，由鲁迅研究专家薛绥之教授领衔主编，曾获国家级图书奖。

1986年离休后，先在市老年大学度过一生中最为轻松的一年半学生生活。后来陆续为中央财经出版社编写世界工商经济名录《台湾卷》机电类（约40多万字）、省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国少年百科全书《中国近现代史》部分（约10余万字）、为省少儿出版社审阅修改6卷本《绘画本中国通史》（除宋史外）、参与省党史办编辑《浙江一师风潮》，又参加省市教委组编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社会》历史部分的编审修订工作。其间，还为杭州一中、杭州高级中学编辑出版七十五周年和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各一本。现正在编辑杭高八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册。

## 我的回顾



● 董服仞

我1924年出生在玉环城关斗门头，环山小学毕业时，正值“芦沟桥事变”，八年抗战开始。无法去温州升学。当年年底，随同杨炎宾、陈增佳、董南才等十位有志革命青年去浙江平阳山门中国共产党办的为培养抗日干部的“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当时我还不满十二周岁，人小，在政治上还很幼稚，结果被退回。翌年暑假考入搬到乐清雁荡山的杭州宗文中学。我读中学阶段，正值八年抗战期内，加上一系列阴错阳差的事情，使我在中学阶段，竟读过七所中学，备受颠沛流离的痛苦。

是于1943年秋季，我分配到温州高级中学读二年级。进校后，发现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师资水平高；二，学习风气好，且学生的水平也较高。对我来说已迫近高中毕业的“冲刺”阶段。在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非努力用功读书不可。目今

这个学校正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除了读好现有的功课外，还利用暑期的时间，补修好一年级未曾读好的三角学。这样在班级中考试的名次，每个学期均有上升，最后能顺利的考入北洋工学院为全公费生。

解放后在故乡玉环中学（现楚门中学）任教三年，那时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需要工业建设人材。我是学机电工程的，应该到工业建设岗位上去。1953年打了报告给省教育厅，申述了自己的愿望，很快就得到答复，要我马上到杭州省教育厅报到。到杭州后，把我分配到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该局又马上把我分配到衢州黄坛口水力发电站的建筑工地。这是浙江省解放以来建设的第一个大型水力发电站。到工地之后，就见到屹立在乌溪江畔浇捣坝体用的混凝土拌和楼，建筑工地热气腾腾，从教育工作岗位转到工业建设岗位的我，内心是很激动的。除了先到拌和楼实习之外，还在技校担任了物理学、金属工艺学等课的教学工作，可是不到半年，因为坝址地质情况未勘探清楚，工作只好暂停，人员暂时调往他处。

我是1954年初调到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工作的。该校是水电部的直属中专，为全国培养水电站建设人材，原来该校物理课由专业课教师兼任。因我教过物理，遂专门成立理化学科，由我负责该学科的工作。当时主要的工作是：1.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到上海机械学院听苏联专家叶尔绍夫的课。回来之后，实行课堂教学五级计分制。考试采用考千的办法，以提高教学质量。2. 筹建物理、化学实验室，水电部所属水电学校，全国只有四所，所以实验经费充裕。在一、二年的时间内实验室的规模就相当可观，能开出所有实验。1956年水电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电业先进生产者会议，我代表学校参加。会议期内，在中南海怀仁堂曾受到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总理、董必武等9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1958年，该校上升为浙江电力专科学校，开始招收大专班。1960年浙江电力专科学校、浙江机械专科学校、浙江纺

织专科学校与浙江大学的冶金系、土木系、地质系合并成立杭州工学院，由省委书记陈伟达兼党委书记，按原来设想的规划，不亚于浙江大学。我担任物理大组组长，负责安排和调度各系的物理学的教学工作。当时，有的学校在搞教学改革，我们以上海同济大学的物理课教改为榜样，开出了《64位定标器》《超声波的应用》《光测高温》等较新、较尖端的现代物理实验。

杭州工学院成立不久，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工学院成为冒进的产物，于是停办。纺专改为现今的浙江丝绸工学院，原浙大的三个系，仍回归浙大，原电专、机专都并入浙大。我在浙大担任普通物理学的课程。

五十年代末，浙江大学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参观浙大后提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一条龙的意见，把附近的杭州第一初中接收改为附属中学，办起了高中，当时的师资力量较弱，浙大抽调了大学里的教务科长、教学科长去当附中的正副校长，又把我们这批教过中专的教师调去作为教学骨干。我1962年调入浙大附中。起初，浙大附中按大学高考升学率计算，全省算是倒数第二，到我们教的这一届1965年毕业时，升学率已上升为全省第二，仅次于金华二中。1965年9月7日浙江日报在头版大篇幅的报道此事，主题为《浙大附中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副题为《减轻了学生负担、增强了学生体质、提高了教学质量》。在此期间，我所指导的全市中学生无线电制作比赛获得第一名，全省自制教具评比名列前茅。

1970年，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各校办起了工厂，因我原是学工的，就要我与其他教师负责筹建工作。那时浙江

省科技局(省科委前身)新技术组正在推广“射流技术”“可控硅的应用”等新技术。可控硅的应用有三个内容:1. 可控硅整流设备,用于电镀。2. 可控硅电弧炉炼钢,以杭钢为试点。3. 可控硅励磁,应用于小水电发电设备。我们在新技术组的资助下,负责制作调试可控硅触发电路用的便携式示波器。我们在嘉兴电控厂可控硅整流设备会战现场,解决了简易示波器能观察可控硅触发电路的移相问题。得到用户的热烈欢迎和较多数量的订货。省电子局定为定点生产厂。

在办工厂期间,我还设计了92-1型、92-2型低压电源,电子系演示器J2459-1全晶体管示波器。根据教育部生产供应局技术处的要求,最早设计出我国中学演示实验用325-2型教学示波器、教学示波器附件等仪器。把华罗庚优选法中的0.618法应用到调试325型的频响,提高了工作效率,得到华罗庚小分队的表扬。并在市电子仪表系统介绍经验,该法被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上海燎原仪器厂用于调试示波器。

校办厂的任务是“聚财、育人”,所以勤工俭学任务是首要的,我们除了搞好本校学生勤工俭学之外,还先后接受浙江大学无线电系电真空专业、杭州大学物理系、浙江丝绸工学院机电系学生来厂生产实习或毕业实习,对他们讲课。此外我还对杭州地区物理实验员、杭十一中物理教师、徐州市各中学物理实验员,广东湛江农垦局所属各农场中学实验员、四川成都市有关中学物理实验员和部分教师讲课。1987年担任过杭州市业馀工大的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1976年以后,我分工搞生产技术,先后设计了点焊机、电子管老化台、电子管测试台、电阻老化台、示波管测试台

等设备。制订了有关生产工艺,在我担任副厂长期间,所生产的教学示波器、学生示波器、电子开关等仪器评比,均获得教育部系统第一名,学生示波器还被评为省、部的优质产品。1982年产值达到565万元,利润103万元。而我个人曾被评为1979年、1982年二届省、市劳动模范,1979年被评为省科学大会先进个人、1978年被评为省对质量有贡献先进个人、1984年被评为省勤工俭学先进个人等,还被选为第四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我兼任杭州市教学仪器研究所所长,我的任务是组织开发教学仪器新产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1985年受聘为国家教委《教学仪器与实验》杂志第一届编委。协助副主编组织稿件和撰稿。1986年担任《初中物理实验大全》编委。1987年提任《高中物理实验大全》的副主编和编委。1990年担任《教学仪器维修大全》的副主编和编委。撰稿约数十万言,有的文章还刊登在国家教委教学仪器研究所的《物理仪器汇编》上。此外还为教育部及后来的教委拟订JY7-78、JY8-78、JY7-85、JY8-85等五只部标准,有利于教学仪器质量的提高。

1988年,专职负责杭州市教学仪器研究所的工作。带了二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从事教学仪器的开发工作,迄1992年近4年的时间内,开发了十几只产品,其中有8只产品纳入国家教委的委级研制计划。2只产品已通过委级鉴定。第一年的4只产品,3年多来产值已达200多万元。在1992年国家教委第二届基础教育教学仪器优秀成果评选中,我为主研制的项目,有2项获得1等奖和3等奖。1等的产品曾远销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

我身为玉环人，但为故乡服务的事太少了，真是愧对家乡父老。我现已届古稀之年，还期望有一分余热，能发一分光。

## 勤奋是人生的永恒



● 董新篁

1934年4月5日，我诞生在玉环县城关镇斗门头。在那里，我度过了令人终身难忘且充满天真幻想的童年。自然，村办小学、环山小学和玉环县中（楚门中学）就成了我少年求知的学校。1950年，我在玉环县中毕业（初中），成绩是第二名，按那时教育系统规定，初中毕业前二名者，可保送中专，由于我喜爱生命科学，当时被保送到浙江省立温州高级农业学校。在学期间，我的成绩亦名列前茅，因而先后被选为班主任、学生会秘书、学生会主席，班级中有些同学羡慕地说，玉环人大概是多吃鱼吧！脑子特别灵。我听了暗暗为自己是玉环儿女而骄傲。

中专毕业时，由于我的学习成绩突出，当时被保送大学，但万万没有料到，因我父亲董仲升蒙受冤案，我的“政审”通不过而被分配工作，但我自信自己的智慧，我决心要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发奋自学。那时我被分配到舟山工作。1958年我在舟山六横搞了一个蕃茄丰产点，较为出色，省农业厅当即在这个点召开了全省现场会；当年我还被选为舟山普陀县人民代表，这是当时我们科技界唯一的代表，我深感荣幸。随后普陀县在舟山五中开办了二个农技生物班，县委

指名要我去执教，我去了，在校期间，我待学生亲如亲人。学生们大都来自农村，家境较为贫穷，饭菜票常断缺，我常拿自己的工资帮助解决，个别学生夏日缺蚊帐，冬日少棉被，我亦以自己用的给以支援，所以这班学生深记着我，对我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现今他们中大多数有了出息，好几位已是处、局级干部，就在今年，当我刚跨入花甲之年，他们特地在舟山为我举行聚会，以表祝贺，并送高档的毛毯、绒被给我，他们说：“过去老师送温暖给我们，今日我们敬老师一份温暖，我们相信，当老师盖上这些毯被时，一定会想到我们这班学生！”多么感人肺腑的人间真情呵！这是后话，这里不作赘述。此后我调到舟山农科所搞了数年科研工作，在舟山这段期间，我还编写了二册科技小册子和发表了数篇小论文。

1973年，我调到宁波师范学院，在师院期间，得院长苏滋录的赏识，跟随他身边我边学习边工作了四个年头，并学完大学微生物专业全部课程，随后留校执教并从事微生物科研工作，曾以 $Co^{60}-r$ 射线处理的手法选育出食(药)用菌灵芝早熟高产菌株和“放线菌-14号”菌株，推广全省各地，颇得好评。灵芝早熟高产菌株生长期短，个头大，质量好，很受人们青睐；“放线菌-14号”种性好，活力强。当时，湖南、江苏等省亦纷纷派人前来索种和取“经”，一时间，使宁波师院微生物实验室天天门庭若市。当时，宁波地区科委和教委还定期举办全地区微生物技术训练班，邀我主讲，对基层微生物单位和中学生物老师进行培训，把宁波地区微生物事业搞得热热闹闹，因而1976年获宁波地区科技奖。1981年受宁波科协之托，参与组建宁波市微生物学会，

学会建立后，连任五届理事及副秘书长之职。1984年应宁波啤酒厂盛邀调入宁波啤酒厂。

调入宁波啤酒厂开头二年，我被委任执教宁波市轻工职业中学及其与我厂联办的啤酒职业班。由于在教学方法上我很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学生们掌握知识很快，这段时间我指导学生写的和自己单独写的共四篇论文均在有关刊物上发表，且这个班级亦被评为先进班，我亦被评为宁波市职教积极分子（职教教师中最高级别荣誉）。这个学校亦被评为宁波市职教先进学校。这些情况，浙江日报、浙江电视台、宁波电视台等都作过报道，学生们亦感到非常自豪。那时原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还专门到我实验室视察，和我交谈，给了我很大鼓舞。

1886年我正式进啤酒厂工作，先筹建了厂实验室，后又接受了培养啤酒酵母的任务。酵母是啤酒生产的关键，在我接受任务之前，我厂是依靠向外购买酵母来维持生产的，那时年年用种年年要买，生产十分被动。我接受了这一任务，运用微生物学知识和实践经验，认真选育。当然，其间亦遇到不少困难。正巧，我厂党委组织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我就运用学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解决问题，终于使问题迎刃而解，保证了我厂啤酒生产用上好菌种。实际上，搞啤酒菌种选育工作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掌握了规律，并加以认真对待，才能水到渠成。我厂学哲学出成果的情况，浙江日报作了大版面的连续报道，我的事迹浙江日报记者亦作过专访，撰写文章刊登在报上，宁波日报亦作了转载，并还有约我厂四位学以致用出成绩的同志写了专稿发表，我是其中之一。

对于啤酒菌种选育工作,有关领导是比较关心的,就在我进厂不久,宁波市副市长孔宪旦就专门到厂看望我,勉励我要培育出具有宁波特色的优良啤酒酵母菌种。我不断努力,终于选出了优良啤酒酵母菌种,用于生产实际。取得成效后,宁波市科委副主任顾应昌,三顾我的实验室,催我报科技成果奖。本来这一成果奖早已可报,但我厂领导认为申报后会“泄密”,于啤酒市场竞争不利,劝我不要报,厂内给我奖励。这样,这一科技成果就拖延了好几个年头。现今,由于厂领导的更换,这项科技成果终于在今年得以申报,成果的题目是“采取综合技术措施,用好啤酒酵母菌种”。这项成果现已获得宁波市科委认可,而且请有关专家作好了鉴定。青岛啤酒厂生产处长、高级工程师李璞君鉴定认为该项成果为中小型啤酒厂的生产提供了一条途径,值得推广;北京华尔森啤酒厂副厂长、高级工程师许智认为该成果总结出比较完整的菌种选育、保存和应用技术,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浙江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研究员鲍行豪鉴定认为该成果具有先进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鉴定专家们的一致好评,使这一成果又增添了一份异彩。实际上,我选育的啤酒酵母优良菌种和配套成龙的应用工艺在我厂生产实际中已运转了七个年头,所选育的啤酒菌种发酵度较高,还原双乙酰能力强,口味好,为酿造优质啤酒创造了先决条件。

我平时亦很注意把技术上收益写成论文,至今,我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微生物学方面的论文已有二十余篇,其中五篇刊登在全国性刊物上,其余均刊登在省市一级刊物上。这些论文中,《“谈谈塑料袋代瓶生产食用菌”》一文获宁波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另有《“我国食用菌栽培史”》,

《“啤酒发酵过程双乙酰消长规律及控制措施”》《“试论啤酒酵母菌的选育”》《“冰淇淋稳定剂的选用”》

《“食用菌和酵母液体石蜡保藏法”》五篇获宁波市微生物学会和市轻工学会优秀论文奖。《“啤酒发酵过程双乙酰消长规律及控制措施”》在省首届啤酒学术讨论会上作学术报告,另外《放线菌“5406”的菌种复壮》等10篇论文在省市微生物专业会上作交流,受到好评。我主讲的“怎样选育啤酒酵母菌种”,被拍成电视录像教学片。另外我撰写的《洋为中用的啤酒酵母活化技术》在全国啤酒学术讨论会上作过交流,博得中国啤酒协会齐志道会长好评,并被《“中国啤酒通读”》刊用。

1990年德国啤酒专家威廉·阿伯特来我单位指导工作,我陪伴他在技术上愉快地合作了一个月,使他的洋技术为我所用。

由于我在学术上和教学上取得了一些小成绩,现已被中国微生物学会、浙江省微生物学会、浙江省啤酒学会、浙江省食品学会、宁波市微生物学会、宁波市轻工学会、宁波市食品工程学会、宁波市科技情报学会等八个学会吸收为会员,并被选为浙江省微生物学会理事和理工委员,职称上被评为工程师。

我生平对绘画、书法、音乐、写作亦都有爱好,绘画方面曾获宁波市漫画三等奖。音乐上曾创作过一首渔歌,被选入舟山“征文选集”,并在电台播出。写作上,时有短小的文学作品在报刊露面,所以我感到自己的生活非常充实。

我追求进步,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我走过的道路看起来似乎比较平坦,但实际上,途中的

沟沟坎坎亦足以令人惊叹，如果要问我是怎样跨越这些沟坎，我感到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意志和毅力，这意志和毅力，使我变得勤奋，当我看准了前进的目标，就勤奋去追求它、实现它，其结果总是“一分汗水，一分果实”。

勤奋，人生的永恒！



## 环 保 专 家

- 童 晔 书 -

童晔书1933年5月出生在楚门镇。童家是诗礼传家，医药济世，在当地颇有名望。祖父是一个救死扶伤的老中医。童晔书自小受到他的熏陶，关心人民疾苦。他的姐姐和姐夫、堂姐和堂姐夫，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上小学时，他的一些老师也是地下党员。因此，他在少年时代就接触革命思想。中学时代，他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16岁那年就投身革命，奔赴浙南游击队。解放后，1950年党培养他到上海华东团校学习。结业后回到温州从事团的工作，并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曾任青年团泰顺县委宣传部长。1955—1959年又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在计划经济系攻读四年整。回来后，被分配在浙江省计委从事计划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下放劳动。1976年复职上调省建委从事环保工作。1976年至1982年任浙江省环保办公室副主任，1983—1987年浙江环保局成立，童晔书调任该局综合处处长。1987年至今任浙江省委讲师团领导成员。1991年上半年任浙江农业大学客座教授，1992年受聘为浙江农业大学环保科研所特约研究员。职称为副研究员。

环境保护工作是关系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已逐

渐被国人所认识，并上升为我国一项国策，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又面临着：温室效应江河污染、森林破坏、物种减少、水土流失、资源稀缺、生态失调等问题，给人民生活和健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童畹书关心人民的幸福和健康的事业，热爱环保工作，从1976年开始，他涉足这一领域。经过数年努力，他已从外行变为内行。他运用自己的特长，发挥经济学专业的优势，积极开展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环境经济学是环境学和经济学相交叉发展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对于这一新的学科，童畹书虚心学习，刻苦钻研，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环保科研工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童畹书从事环保工作十多年，先后在环保科研方面，主持了我省第一部《环境质量报告书》的编写，并曾担任我省农业环境质量报告书的编辑与顾问。他组织和参加了浙江省东海污染的调查；并担任浙江省海岸带调查研究领导小组的领导成员。该项研究是全国和我省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他还参加了杭州市中东河综合治理研究课题的研究和讨论，参加了萧山“山一”大队生态农业研究课题的研究和评审。该环境科研项目，已被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所肯定和重视。他还参加了杭州丝绸印染厂的丝绸污水治理的科学研究，为环境保护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于童畹书同志的潜心研究，积极进取，八十年代，他在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在学习、参照、引进西方环境经济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学。在这一学科的研究中，他在有些方面，特别是环境经济理论方面，在我省甚至在我国处于领先地位，得到我省学术界的好评。他的研究成果，已被编入浙江省社会科学

志第二章第二节《环境经济学研究》之中，对他的一些论文和著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近十多年来，童畹书更加勤奋，笔耕不止。他写了许多论文，出版了不少著作。论文有：《环境保护与四个现代化》、《环境计量的理论与方法》、《论环境》、《协调比同步更现实》、《对制订排污条例的几个问题的研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及其经济效果》等十多篇，发表在省以上有关刊物上。调到省委讲师团工作后，为了适应浙江省理论研究的需要，他又写了不少政治理论方面的文章。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论乡镇企业外向型发展的路子》、

《社会主义优越性探讨》、《论党的群众路线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党性锻炼》，以及配合十四大的有关理论性的文章十多篇，发表在省一级的理论刊物上。可以说，他是环保专家又是理论家。他负责主编的《干部学习辅导材料》是专门提供给省、地市领导班子学习的一个内部刊物。这一刊物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

他主编和参编的主要著作有：《环境经济问题》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获省社科二等奖，《浙江省情》，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思想品德教育》，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环境科学管理》，由吉林省科学出版社出版，《水的趣谈》，由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少年儿童百科全书》部分章节条目，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浙江部份），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童畹书同志是我省第一代环境保护工作者，在全国来说，他从事环保工作也是较早的。由于他热爱这一事业，并能知难而进，刻苦钻研，废寝忘食，执著不懈。因此在环境经

济学研究方面已有较深的造诣。十多年来先后在省干部业余科技大学、杭州大学环境化学系和法律系、省农业大学环保系讲授环境经济学等课。近年来他仍参加省农业大学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组织的环境经济研究课题，并和省农大学的环保系的教授、专家们合作，编写我国第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学》，由童晓书同志任主编。该著作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童晓书从事环保工作十余年，兢兢业业，务实奋进。在科学研究上，他呕心沥血，孜孜以求，正努力向新的高峰攀登。

(本刊辑)

## 航天测控技术专家

- 熊陈琳 -



熊陈琳，研究员，男，1933年生于玉环坎门，1958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本科毕业。在大学期间，荣获“南京工学院优秀生”称号。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参加侦察接收机研制工作，工作积极肯干，被评为五好标兵。1959年立三等功一次。

1959年参加1059导弹仿制工作，主要干无线电横偏纠正系统地面发射机。解决超差代料，发射机调试，排除故障等工作。在这段时间有若干项革新：地面发射机控制系统的改进；加温控制电路改进，针对发射机寄生调幅的出现，写了一篇“灯丝电压对发射机寄生调幅的影响”分析了故障，计算了板流Ni的50H1成份，提出改进方法，以上工作受到通令嘉奖。

1960年到南京720学习雷达，回来后从事当时的东风导弹无线电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并担任工程组长。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设计了磁控管微波发射机，并进行发射机功率传输试验，获良好效果。

在东风二号导弹地面发射机设计中，本人提出二种方案：(1)已调波放大；(2)自动板调，来解决发射机增大功率

问题,并分析其优缺点,“已调波放大”被采用。当时地对地导弹惯性制导和无线制导都在研制,1962年参加无线制导总体方案论证,采用Doppler测速定位系统,它是首次应用到我国导弹上,作为先行,先干外弹道测量,他参加总体论证,该方案为国内首创,他参加了方案制定和数理方程推导,进行精度分析和指标分配,论证后,领导弹上应答机工程组工作,对弹上应答机进行总体设计,制造了弹上应答机和检查其精度的相位锁定解调设备,通过东靶场联试,性能良好,超过当时空军用的光学测量精度。成为国内先进测速定位系统。该项工作填补了我国空白,在干应答机中,多次攻克技术难关,并写了论文,首先指出:1. 弹上应答机要稳定工作,其灵敏度和输出谐波抑制比必须有某一关系;2. 正弦分频是相位锁定在直接藕合时的特例;3. 据实际“采样时间 $\Delta$ ”的概念,研究出接有各种滤波网络时,相锁回路对起伏干扰的滤除能力,指出在 $\Delta \rightarrow 0$ 特别下就是苏联B.B.woxTulbaqH的研究结果。以上研究结果在论文《相锁回路对干扰的滤除》四篇文章中论述。并推导出许多计算公式,理论上有所创新。

1965年军委决定地对导弹不干无线控制,他只干惯性控制,调到210厂先后干工艺和调试工作,写了两篇理论性文章《双择相位检测》和《信号存在统计相关时最佳检测方式》,文章对苏联B.P.lebuh教授的双择信号提出进一步看法,数学推导指出,当采用两个反相非零信号时,可以得到更小错误接收概率。在相同错误接收概率条件下,后者信噪比可以降低4.5db,文中还提出一种信号存在统计相关时,最佳检测信息的方法。

1977年到28基地发射东风四号导弹,任弹头工作组副组长,解决YE-3磁记录系统现场技术故障。特别是多年未解决的“抽样脉冲沿对编码精度的影响”。排除电子门的故障,以上工作受到七机部试验队和基地表扬。

在210厂编制和审查了大量工艺规程和技术报告。参加“气相清洗”和“氢化松香”等新技术引进工作。负责YE-3磁记录器联调,把精度和可靠性进一步提高,写了分析理论文章,该项工作得到国防科委科研成果三等奖。参加改进弹上运带机构和YE-3老化工装设计(两项均获国防科委成果三等奖)。以上工作对加速任务进展起促进作用,1978年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

从YE-3磁记录系统(用于东风五号……等多种型号的遥测系统)调试和基地出现的故障中,从理论上总结一篇《多路信号传输中,抽样脉冲前后沿对编码精度的影响》。解决了抽样脉冲沿所引起精度下降和故障问题。该文经704研究所审阅后,认为所推导出公式有普遍指导意义,推荐到中国宇航学会遥测委员会;中国自动化学会遥测、遥控、遥感委员会联合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在会上受到好评,经学术委员会评定发表在该学会主办的《遥测技术》1980年No4第四期。

1979年赴25基地发射东风五号导弹,任遥测工作组副组长,解决了弹头遥测和弹体遥测及地面解调设备出现的故障,受基地表扬。

1978年创造“电阻、电感、电容并串联计算盘”。该方法造价便宜,可以很简捷地计算R.L.C并串联。该方法发表于《遥测工艺》1979年No1。七机部《技术工作通讯》

1980No3《电子世界》1980No11。1979年创造“复数阻抗简易算法把二个(或二个以上)并联阻抗的繁杂计算简化到只需几步就可以同时得到实部、虚部、幅模、相角四个参数,该方法发表于七机部《技术工作通讯》1980年No4。

1981年创造“ $\frac{2^k-1}{2^k-1} R$ ,  $R$ 阶梯式加权电阻解码网络”

《宇航学报》1982NO4,该方法提出一种更加普遍的解码网络,目前国内外常用 $1/2R$ ,  $R$ 解码网络只是它的一个特例。该方法精度较高,分层值在一定范围内可任意取值,1982于《宇航学报》发表(No1)“五种A/D转换器权电阻精度分析”指出影响精度最关键元器件和最关键分层值在何处。如何设计和调试产品才能提高精度。

在技术期间,设计了甩胶机电气控制部份和真空烧结炉电气控制部份。1980年设计并制作了331任务(同步通讯卫星)上使用的交流耐压试验台,该设备操作方便,性能稳定,自动过载保护灵敏,经长期使用效果良好。

1982年以来研制成DSW系列多路数字温度计,DSW-3超低温数字温度计和SWS-1数字温湿度计。这些产品已广泛用于331工程,东风五号……等军工型号。同时被部外军工、民用单位广泛使用。其中SWS-1温湿度计在1984年召开的鉴定会上确认该产品测量精度具有国际水平,抗干扰和远距离测量性能优越,该产品获1983年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金龙奖。国防科工委重大科研成果二等奖。(编号832004)。DSW-3超低温温度计在鉴定会上确认具有国内先进水平,是目前国内测量最远的超低温测量产品,获国防科工委重大

科研成果四等奖。1983年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金龙奖。DSW系列产品也获国防科工委重大科研成果四等奖。DSW测温计由于解决了最佳线性和误差补偿问题,使得测量精度高,论文《铂电阻数字测温折线逼近法及误差补偿》(1982遥测、遥控、遥感学术会议论文汇编)《导弹与火箭技术》1983 No 2,推导出计算公式,对设计和产品生产起指导作用。

1983年受总体设计部之托,主持东风三号导弹遥测地面检测系统研制进行方案论证,总体设计,产品经25基地使用性能良好,受基地好评,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获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在三抓任务中(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1982年潜艇水下发射导弹,1984年发射同步卫星)创立功绩荣立一等功,出席航天部1984年10月召开的劳模大会。

1985年来先后研制成LXA-1袖珍式热电偶数字温度计、TC-A数字控温计等七项产品、军民品可共用,受15研究所之托,主持长征三号甲火箭地面动力检测系统的研制,该产品经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后,性能良好。

本人为湿敏器件“国家工作组”八人成员之一,参加湿敏器件、湿度发生器规范和标准制定工作,是中国湿度研究会筹备组副组长,参加工作以来完成论文近40篇。部份论文发表于《宇航学报》、《遥测技术》、《导弹与火箭技术》、《七机工作通讯》、《双革通讯》、《全国传感器论文集》……等刊物,参加大型丛书《航天丛书》“制造篇”的编写工作,是该书的编委兼作者。

1983年来先后任设计科副科长、主任设计师、测控技术研究所所长等职,兼任北京宇航学会理事。多次立功受奖,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模和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本刊辑)

## 政协玉环县第四届文史资料委员会 委员名单

主 任：戴汉节

副 主 任：王克宏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冰舫 叶海燕 刘 铮 陈煜烈

张一芳 林 曦 林楚香 戴擢节

特邀委员：

支超明 张 瑾 余必煜 郑义亮

金新寿 钟 强 傅世扬

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审：邢义兴

总 编：戴汉节

副 总 编：王克宏 王志统

责任编辑：朱仁巴

## 征 稿 启 事

为使玉环文史资料更好地为我县改革开放，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决定征集下列资料：

一、继续征集建国前史料。建国前史料各部门在修史编志中已征集不少有价值资料，但因受专志篇幅所限，尚有大量资料贮存，没有被动用，可供文史资料选用。

二、征集建国后的文史资料。征集和出版建国以来的文史资料，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工商、公安、文化、教育、艺术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事件，社会轶闻逸事等等，征集建国后的文史资料是迫在眉捷的一项重要任务，希望能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

三、继续征集在外地玉环人资料，凡有一技之长，成绩卓著，贡献突出，不限职务职称，都是我们需要征集的对象。

四、广泛开展征集在海外（包括港澳台玉环人资料，不限身份、职业，能反映他们长期涉身海外，艰苦创业，为居住国（地区）作出突出贡献；热爱祖国，关心家乡，为祖国和同胞乡亲分忧解难的，都是我们征集的范围。

撰写上述各类资料，必须以三亲（即亲闻、亲见、亲历）材料为主，欢迎玉环人写玉环事；也欢迎长期在玉环工作或熟悉玉环情况的外籍人写玉环的人和事。欢迎在外地的玉环人，写在外地亲历的重大事件，也欢迎本县的侨眷、港澳台属写自己在海外亲的人情况。

撰写建国后的文史资料，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

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思路、讲求质量，正确评估建国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必须以党的《关于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对事不对人，宜粗不宜细。我们将本着“征集无禁区，出版要慎重”的原则，认真处理各类稿件。竭诚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文体不拘，字数不限，一经刊用，酌致稿酬，不宜刊用的稿子亦酌发一定资料费，稿件不退。

玉环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一九九四年八月

封面题字 郭仲选

封面设计 黄维珠

篆 刻 柯培根

玉环县科技发展公司承印